

目 錄

科学研究是否需要党的領導

- 党能不能够领导科学研究? 陈建功 (1)
- 駁斥右派份子的反动科学綱領 顧翼东 (5)
- 共产党能够领导科学 孙宗彭 (10)
- 斥“教授治校”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謬論 黄綠芳 (12)
- 訪吳斐丹教授斥“教授治校”論 文匯報記者 郭 根 (15)
- 斥“教授治校”的謬論 王欣夫 (19)
- “教授治校”問題的本質 吳征鑣 (22)
- 党不能领导科学文化嗎? 董問樵 (25)
- “教授治校”是一服糖衣毒藥 李振麟 (27)
- 外行可以领导内行嗎? 盛祖嘉 (31)
- 明治維新以后日本为什么站起来了? 苏乾英 (34)
- 党对报纸工作的领导不可动摇 余家宏 (37)

× ×

- 駁“党天下”論 郭紹虞 (41)
- 右派分子“九斗”論 秉 南 (45)
- 駁斥儲安平“党天下”的謬論 李鉄民 (47)
- 总路綫公布以后, 就“人心向背”了嗎? 陈观烈 (50)
- “党天下”論的实質 姚善友 (55)

× × ×

- 右派对积极分子的进攻 伍鑫甫 (57)
- 右派分子为什么要誣蔑非党积极分子? 苏紹智 (64)

陰險的挑撥·····濮之珍 (67)

× × ×

教學改革的成績是不是主要的？·····蘇步青 (69)

高等學校必須有黨的領導·····盧慶駿 (71)

解放以來的英語專業教學·····葛傳棻 (74)

駁斥楊兆龍所說的“法律系辦得最壞”的謬論·····丘日慶 (76)

不准右派分子抹殺我們教學改革的成績·····吳浩青 (82)

外文系的“教學改革一團糟”嗎？·····董亞芬 (85)

× × ×

駁斥右派誣蔑思想改造的謬論·····全增嘏 (91)

駁斥右派分子對思想改造的謬言·····曹國卿 (95)

肅反運動不容污蔑·····朱伯康 (99)

關於所謂“歷次運動，尤其是肅反運動的
合法性”問題·····王式成 (103)

右派分子否定肅反運動的惡毒意圖·····薛應龍 (105)

論專政的必要性和肅反的合法性·····楊峯 (110)

從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來看肅反的成績·····胡裕樹 (119)

× × ×

宗派主義官僚主義是舊社會的產物·····伍丹戈 (123)

為什麼說反右派鬥爭是政治戰綫上和思想戰綫
上的一次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蔣學模 (127)

× × ×

駁斥右派分子楊兆龍對我國立法事業的
醜惡污蔑·····張企泰 (131)

駁斥王造時的“美國民主是虛偽的，但法律是
認真的”謬論·····丘日慶 (137)

- 右派分子王造时、楊兆龙誣蔑人民法治……………向哲浚 (143)
- 从法律的階級性的角度来看右派分子楊兆龙
- 向党进攻的陰謀……………張匯文講 (146)
- 再駁王造时所提倡的欧美式的民主与法治……………楊巩祚 (152)
- 斥右派分子在法治問題上的謬論……………陈华庚 (155)
- 不許开倒車……………胡其安 (158)
- 駁斥王造时宣揚“美国法治精神”的謬論……………刘家驥 (163)
- 駁右派分子王造时……………赵人龙 (166)
- 駁斥王造时的“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
 荒謬言論……………李 瀛 (170)
- 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兩院制”的反动論調……………黃榮釗 (173)
- 駁楊兆龙的“旧法可用論”……………夏鎮江 (179)

科學研究是否需要黨的領導

黨能不能夠領導科學研究？

陳建功

為着要很快地把我國建設成一個富強的社會主義工業國家，黨中央提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要迅速壯大我國的科學技術力量，要把最重要的和急需的部門在十二年內提高到世界先進水平，使在建設中遇着的一切科學問題和技術問題，依靠自己的力量來解決。全國極大多數科學工作者，都感到興奮和鼓舞，決心為這個號召付出最大的力量。

解放以後的幾年當中，由於黨的正確領導，我國科學技術的落後狀態，有了明顯的改變，科學隊伍得到大量的補充，許多部門如機械製造，化學工業，冶金工業，地質探勘，醫藥衛生，地震氣象等等以及基礎科學的研究，青年科學幹部的培養，都結合着國家的實際需要在進行着。但是儘管這樣，我國在目前科學技術還遠遠地落後於最先進的國家，如核子物理，電子學，半導體物理學等學問的技術應用几乎是空白。空白部門必須迅速填補，較有基礎的部門必須加強和提高，務期於十二年內趕上世界先進水平。這是一個非完成不可的歷史任務。

一般地說，任何政策，任何法規，在還沒有公開討論以前，黨中央都已經根據實際有了相當成熟的底稿，憲法的制訂，就是一個實例。科學技術的遠景規劃是不在此例的。於是乎各個科學家，都紛紛作了許多孤立性的研究計劃，數學

應該如何如何發展，物理學應該如何如何發展等等。領導上把這些東西綜合起來一看，有許多好的意見，但發現依照這個式樣是肯定地不能完成十二年內要趕上先進水平的任務的。領導上指出必須以任務為目標，科學研究才有有助於社會主義建設的意義。後來從十多個方面，提出了幾十項科學任務，包括着幾百個中心問題。這些任務的完成，將對我國科學在十二年內提高到先進水平，起決定性的作用，大多數的科學家，都是歡欣鼓舞的。

但是科學家中的別有用心的右派分子們，不惜破壞科技發展遠景規劃的全面性，另外提出一個所謂“科學規劃問題”，寫成“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的文章（見一九五七年六月九日光明日報），其中有“把研究工作去就人，科學家在那裡，研究工作就放在那裡”的話。這不僅僅與上述孤立性的計劃有同樣毛病，並且它是一支毒箭。孤立性計劃的缺點，並不是預先明白的，而右派分子的毒箭，是有意識的，他們想把一件一件的科學工作都孤立起來，來破壞黨對科學研究的領導，反抗社會主義建設，他們想從根本上改變我國科學工作的社會主義性質。是可忍孰不可忍！要知道現代科學中，任何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發見，決不能光是靠個別科學家孤立的研究來完成，而必須依靠若干部門的配合和科學家的合作的。

向科學進軍，是羣眾性的，不但包含個人的科學研究，也包含着集體的科學研究；對社會主義建設來說，後者比前者還要貴重。集體研究需要正確的領導，就是黨的領導。橫沖直撞的科學研究不僅無益於人民，還可能貽害全人類。通過原子核物理學，人們能夠利用鈾、鈾等原子核內所寶藏的

能量來發電，也可以作成原子彈來大量地殺人。何去何從，怎樣利用，要看政治的傾向，要和平利用，必須要有黨的領導。沒有黨的領導來做科學研究，盲人瞎馬，會跌入泥坑。沒有黨的領導，在科學研究機關里，會迷失研究的目的性；在高等學校里，會把教學工作與研究工作對立；在廠礦里，青年人會想考博士而不安於崗位。總的說來，無黨領導的科學研究是脫離人民的利益、迷失向科學進軍的路綫的。科學工作者在自己的工作中，會發現出一些矛盾，會反映出個人主義和主觀主義，會反映出觀點和方法上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此科學工作者必須要有黨的領導和幫助來統一矛盾，克服缺點。科學工作者，一面研究科學，同時必須學習政治，發揮集體力量，貫徹羣眾路綫，才能少走彎路，而這是需要黨的領導的。

右派分子在反動的“科學規劃問題”里狂妄地說：“至於學術領導和科學研究的‘火車頭’，我們認為應在实际工作中逐漸形成，不要主觀地先行規定誰是領導，誰是‘火車頭’。”從表面上看去，他們光是要將科學研究讓它自流，蕩漾無定，其實他們企圖篡奪黨對科學研究的領導，以便取而代之，走反社會主義的路綫。科學家中的右派分子們惡意地說黨不能領導科學研究，是因為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對於這一層，周總理在他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得非常明白：“如果‘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說法，意味着只有本行才能領導本行，這不僅否定了政治對於科學的領導，而且实际上也否定了科學研究工作中的統一領導的任何可能，因為學術上的專業是分門別類的，而世界上同時精通各種科學專業的科學領導幹部是不存在的。這種理論，對科學隊伍只能起瓦解作用，是不利

于科學事業的發展的。”黨是能夠領導科學研究的。科學研究——不論集體和個人——都不可以離開黨的領導。

駁斥右派份子的反動科學綱領

顧 翼 东

在學習反右派斗争的各种文件，先看到郭沫若的“駁斥右派分子的反動科學綱領”，使我大吃一惊。开始了解右派分子非但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向我們党、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进攻，而且也企圖在科學領導上向我們进攻。在他們的反動科學规划中，有很多惡意的，荒謬的言論，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保护科学家及那一个做火車头的問題，也就是党能否領導科學的問題。下面就把我个人在解放前后所接触到的事实，对这二問題加以駁斥。

先說：保护科学家的問題。我們科学工作者是現在条件好呢？还是解放前条件好呢？現在，政府鼓励并关心我們的工作，优待我們的生活，这是众所共見的。至于解放前的情形，我想乘此机会就自己所接触到的来講一講。尤其对青年同志，因为青年同志对解放前的事知道得很少。

解放以前的科学工作者，若是在科学院工作，那就不得不在外面兼职，因为薪水太低了，我当时所碰到的熟人，对科学研究工作都很不安心，时常發牢騷。在教育崗位上教書，情形也是如此，所以解放前有句話是“不如早死，莫做先生”，从这句话就可体会到当时教育工作的辛苦及不被人家重視的情形。

再看到工厂工作，在抗战时期，我在制藥厂內做过工作的，那时是在資本家下面做医藥工作。

我原是一方面为了救人为了人民的福利，另一方面是为

了推进科学研究，培养学生結合实际。可是却被資本家玩弄，可以說是啼笑皆非，我在思想改造时，就說过：“甜酸苦辣”四个字我在資本家手下都是嚐过的。甜就是要你帮他們忙的时候，每天請你吃頓飯，恭維得你無微不至；等到你把實驗室組織起来后，工作人員亦招聘起来了，那时資本家就每天同你講：“什么厂在做什么东西，什么厂做什么东西，你为什么不做，为什么做得慢”。講話尖銳难受正是酸得很；我不甘示弱，拚命的搞，同各工厂竞赛，我們工作虽是辛苦，产品虽是多，对于制造方法，也改进了不少，但資方总是說不賺錢，工作人員要加薪沒有办法，把我夾在中間，真是苦得很；合作不能長久，工作人員跳出去了，工厂漸漸垮台，在分手的时间資方的手段真是辣得很。所以在过去的社会中，怎样会有科学工作者适当的地位呢？哪一个人来保护我們呢？除掉自我欣賞一些工作成果以外，再也沒有旁的安慰了。

我在国民党机关中也做过短时期的工作，那就是鑛矿的分析工作。鑛是我国的主要矿产，我兴致很高，以为大有事情可做了。其他工作人員也很积极，提出了很多的意見，例如鑛矿中含有比鑛更宝贵的元素如銻鉍之类，提醒当局应加重視。結果所受到的是批評，降級处分。这样我才了解，他們只是要我摆摆样，只要我盖章拿錢。所以国民党机关里的“保护科学家”，“提倡科学”是这样一回事！

以上只是說明在旧社会黑暗时代的情形。右派份子的所謂保护科学家，真是欺人之談。是要把时代的巨輪拖向倒退。

我再談談在制藥方面，以往我所碰到的，是互相猜忌。我那时是怎样进行研究，不敢同朋友們講，同时，朋友的研

究情况，也不同我講。甚至我和我的学生也不能談工作的問題。挖人，偷等方法是普遍的情形，是正当的作風，把我搞得头晕眼暗，眼看道德墮落無法挽救。解放以后，尤其是近几年来，大家开誠布公，大家商量討論，分工合作，制造方法相互改进，相互交流經驗，所以制藥工業的發展，近几年来有輝煌的成就。

我現在的研究方向，是在稀有元素方面。以往我曾提出的銻鉍問題，現在政府都加以重視了，我真高兴。今年一月，我参加了科学院召开的稀有元素協調會議。这會議的內容，便是协商和調配有关系稀有元素方面的研究工作，进行相当順利。我就覺得，只有在党的領導之下，才可以有科学規劃，才可以召开協調會議。在協調會議中，各人把以往的工作經驗，全部攤开，然后把今年及明年所要做的工作，大家拟定。重复的用协商方法推定由一个單位負責，其他單位协助。有的問題，大家事先沒有考虑到，便自报公議，分別的認下来，討論好了工作路綫，放手去做。既民主，又集中，不是“右派规划”的个人自由主义作風。經過協調會議后，空白点逐漸地填补了，時間也不浪費了。到了一定時間，还要来个全面檢查。十二年內，向科学进军，在重要部門达到或接近国际水平，逐年用这个方式推进，是很可以成功的。若然依照右派分子的规划，还是各人各做，不用集体合作的方式，同解放前一样，互相猜忌，鉤心斗角，怎样可以达到我們的期望呢？

我們中間沒有一人不希望向科学进军，不希望提高科学水平，只有通力合作，團結互助，用無产階級思想看問題、布置問題、解決問題，那就非有党的領導不可，非有党的政

治思想教育不可。

我再談一談科學隊伍問題。要進軍，必須有堅強的壯大的隊伍。對於培養下一代的科學工作者，我從畢業到現在，可以說沒有脫離過科學工作的崗位，到現在已有三十多年的時間，照理應當已經培養出來很多人才，可是我的學生到現在在科學工作方面，有多少人呢？不要講三十多年中我在課堂中教過的學生，即是同我做畢業論文的学生，那是開始在1935年到現在也有相當的數目了，在解放前也有很多的人數，但到現在在本崗位工作的，卻是寥寥無幾，他們到那裏去了呢！我分析了一下，絕大部份是做生意，做資本家了，那就是經不起考驗。培養了他們，結果却改了行，這就是反動政府統治下很大一部分科學工作者的出路。解放以來特別自院系調整後，化學系學生都有了很好的崗位，留校的助教、研究生都在那兒勤懇的學習，只要他們有時間，有工作條件，他們是絕對不會輕視研究工作的，並且他們對科學研究很熱情，會自覺地去進行。我對於培養下一代，方才有了希望。所以我們對於年輕教師的工作條件，對於他們科學研究的時間，應盡力的為他們爭取，不能放鬆。

新老合作也是政府的方針，沒有黨的領導，老的不管小的，小的不管老的，科學的隊伍怎樣能成長呢？

最後我還要提出一點。最近科學院反右派討論會中，實驗生物學家朱洗先生所提出的意見我完全同意。那就是黨能把科學領導得很好，布置工作很全面，不過對於研究工作預計的結果，還是不夠滿意，在有的地方結果還是相差可能很遠。十二年提高到國際水平的期限，現在時間也過去了一年半。這個問題絕對不應當由黨負責，那是我們科學工作者

有負于党，对不起党。我們还有等待思想，还不能够全面的团结，培养足够的工作人员，和沒有發揮出所有的潜在力量，在这方面我們的思想还需逐步提高，所以在反右派斗争后，我們更要加紧工作，密切联系，刻苦鑽研，努力的搞好科学。我們要把工作的成果来証实党能领导科学，来証实我們必須要党的领导，来証实社会主义对科学发展的优越性。我們要对右派份子夺取科学领导的夢想，用实际行动，来給以有力的回击。

共產黨能够領導科學

孫宗彭教授在七月十三日生物系全系大會上發言的記錄

張孟聞先生是我的老同學，多年的朋友。我對張先生的問題很關心。就現在已揭發的材料已可認為是典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但到現在，張先生仍未老實交代，使我不得不向他說幾句話。

現就他所說黨委不能領導學校一點來看，就意味着不要黨領導，與“教授治校”的實質一樣。我也是從舊社會中過來的，飽嚙了反動社會中“教授治校”的生活，也對共產黨所領導的新社會有些體會，不妨將新舊社會的教書生活來比較一下，就可以說明學校有共產黨領導和沒有共產黨領導的區別。在抗戰前一年，我為什麼從南京到江蘇醫學院你是知道的，當時你還為我說了幾句不平的話。抗戰初期“蘇醫”遷四川，那時我展開了一些戰時營養問題的研究，工作中也得到些初步結果，但“蘇醫”以不能畸形發展為理由而不支持我，我只好去重慶募化一些工作條件，那知等我回校時實驗室已封閉，我和兩個工作人員都被掃地出門。我到貴陽湘雅醫學院，當時國內丙種維生素缺乏，成為醫療上的問題，當即拚湊了一些條件展開工作，亦找到了一些解決問題的材料（用野生茨蕪）。正待繼續展開，又被趕出門。這便是“教授治校”的“好處”。就是只有人與人之間的傾軋，而不能開展真正學術上的合作與論爭。雖然我並未因此而喪失工作的意志，但思想上終因這種流亡生活工作無保障而常自嘆命運多磨，甚至一度打算不教書準備改行了。後來到“浙大”也有過

些風波，幸运的捱到解放。經過院系調整，先到上海醫學院，後來復旦。初期，也有待不長的想法，混混算了，但現在留復旦已四年，在這期間發現事實上復旦并無趕我跑的意思，相反的，工作條件逐漸添備，并鼓勵我工作。這與以往的遭遇完全不同，這是因為有了共產黨的領導，新社會的制度保障了我。并不是黨為了我個人，個人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黨是為了科學，為了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貫徹知識分子的政策。

再從整個社會看，全國解放後，物價穩定，國際地位大大提高，工業建設蓬勃開展。就上海而言，舊時代的流氓危害治安，而現在夜間一兩點鐘在馬路上走我也無所懼。這就是新舊社會有無共產黨領導的對比。我并非來歌頌共產黨的功德，也不是應聲蟲，但客觀事實擺在面前，為什麼你竟看不見？我們舊中國是個爛攤子，社會主義建設中也是有缺點，但你為什麼不從發展上來看問題，而老是找岔子呢？我們作為公民要向黨提意見，但是善意的建設性的意見，不是破壞性的。以前我也認為共產黨不能領導科學，但現在在事實面前，我的觀點也改變了。你一個科學工作者，應當本着科學家實事求是的精神，明辨是非。你若是堅持反黨反社會主義，你是不會同意我的話的。你現在應轉變立場將一切反動言論，與右派集團的關係、陰謀一一進行交代，向人民請罪，回到人民的隊伍里來。

斥“教授治校”和“外行不能領導 內行”的謬論

黃 緯 芳

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反动言論中有“教授治校”和“外行不能領導內行”两个項目，本質上就是否定党的領導的必要性。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文章中，根据宪法的原則，根据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各党派历史宣布的共同的政冶主張，規定辨別香花和毒草的标准的第五条說：“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領導，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領導，”这样算是香花；并且指出“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領導兩条”。的确，建設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为着剷除剝削制度和摆脱国家貧弱的状态；这是六亿人民的意志。要使这願望实现，走资本主义道路行得通嗎？显然是背道而馳的，既然这条道路走不通，那么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了，也就必然地要接受党的領導，貫徹党的政策和方針。周总理在一屆人代第四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里說：“我們今后的教育方針應該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覺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既然我們要求后一代具有社会主义覺悟，教师自身当然更應該有高度的社会主义覺悟了。否定党的領導的分子連起碼的社会主义覺悟都沒有，希望这种人培养出有社会主义覺悟的后一代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必須和右派分子划清界綫。既然我們要貫徹党的政策方針，以孚六亿人民的願望，那末不管那一部門，都得由党来

領導；教育和科學研究工作怎麼可以例外呢？王恆守的“教授治校”和曾昭掄的“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兩個謬論，就是想把教育和科學研究事業從黨的整体領導中分離出來。

王恆守的“教授治校”論，巧妙地先把黨委從負責主動地位降為從屬被動地位，換句話說，他用的手段，是從削弱以達到擺脫黨的領導的目的。我們承認政治教育措施原則的根據，而教育是實現政治思想的一種手段，兩者不能分開的，“教授治校”論就旨在強為分開。這樣做的目的，無非要使教育的方針模糊起來，社會主義覺悟的青年培養不出，而且還供給右派反動的野心家製造宗派，發展陰謀的場所，為資本主義復辟鋪平道路。解放前曾經實施過教授治校的学校，那一個不是給少數人所把持操縱呢？反動派統治時代的局面根本就是爭權奪利，不顧廣大人民利益的。“教授治校”制的坏处也不會引人注意的。現在黨以公正廉明的態度來領導學校，還有什麼可以非議呢？如果還會提出異議，除了別有用心外，還有什麼另外的解釋呢？

曾昭掄的“外行不能領導內行”論，是赤裸裸地拒絕黨的領導，抹殺科學研究服從於政治的原則，想把有組織、有領導、有計劃地來推動學術活動改變成為無政府自由散漫狀態，藉以分散力量，發展派系，以實現野心和陰謀。歪曲領導的本義，是組織力量、總結經驗、制訂計劃、指導方向，而把它說成是具體的局部的操作。正如周總理在一屆人民第四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里指出的：“這不僅否定了政治對於科學的領導，而且實際上也否定了科學研究工作中的統一領導的任何可能……這種理論，對科學隊伍只能起瓦解作用，是不利於科學事業的發展的。”

总之，社会主义是我們唯一要走的道路，共产党是我們唯一可以信賴、依靠、放心跟着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响导者，教育和科学研究是我們教师學生从事的事業。我們要求建設社会主义社会，不願意毀灭所从事的事業，就只有站穩立場，明辨是非，摧毀右派反动的謬論，使它無所立足，然后我們的事業才会有順利的开展。

訪吳斐丹教授斥“教授治校”論

文匯報記者 郭 根

所謂“教授治校”的口號，是右派分子提出來作為向高等學府進攻的一個陰謀，他們的最終目的是要把黨從高等學校趕走，而由民盟右派集團來掌握領導權。

這是一個重大的陰謀。為了揭發這個陰謀，記者訪問了上海的几个教授。下面是復旦教授吳斐丹先生的談話。

“教授治校”的歷史背景

吳先生指出，為了認清這個陰謀的真象，我們首先需要知道“教授治校”的歷史背景和它在當時所起的作用以及它的效果如何。

他說，在歷史上，“教授治校”有過這些事實：蔡元培長北大時代，是為了對付北洋軍閥；東南大學當時是為了對付和軍閥齊燮元勾結的學閥；清華大學是為了反對國民黨的統治；重慶時代的中央大學是為了反對 C. C. 派系。所以，從這些往事看來，“教授治校”的基本目的是反對統治者，反對領導者。在當時反動政府統治之下，“教授治校”是起了一些進步作用的，因為當時反動政府無論它派什麼校長來，只要教授們團結起來，把實權操在教授會手里，一個獨夫的校長就會無能為力的。

但是當時的“教授治校”也有它嚴重的缺點：首先是造成了學閥壟斷的局面，很多好的學者受着排擠，如當時的清華，這種現象最嚴重；其次是造成了教授之間的派系鬥爭，

如当时的中央大学就充滿这种事实。所以，由于有这样严重的缺点，“教授治校”絕非值得重新提倡的办法，除非提倡的人別有用心。

是的，以复旦的王恆守为例，他早就大声疾呼：“教授治校”。他的基本論点是：一、八年来高等学校办得“乱、糟、偏”；二、这是由于外行治校的结果，所以党应该退出学校，由內行来办。“教授治校”在历史上是反领导的，所以王恆守也就搬出这个旧武器来反对新领导来了。因此，王恆守如果不是犯了时代錯誤病，就显然是反党。

高校与教师都需要党

談到这里，吳先生閉目深思一番，然后激奋地說下去：

八年来高等学校办得不好嗎？任何人知道这是胡說。高等学校發展的总方針是正确的，而且假使沒有党的领导，就絕不会有今日这样輝煌的成績。試想，假使今天党真从学校撤退了，真的实行“教授治校”，那首先就必然是惹起学校里的大混乱，教授之間不知道要爆發多么激烈的宗派斗争。（就以孙大雨为例吧，如果他統治了复旦，那他和他所謂的“公館派”的斗争，那还可以收拾嗎？）

正由于党领导了学校，能从全局利益着想，学校才能巩固团结。在旧社会里，文人是习惯于“相輕”的，因此就不免發生妒忌、打击、以及相輕的种种怪像，但是党是大公無私的，它能从各方面衡量一个人，它能發揮每个人的能力和他的积极性。因此，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避免人事糾紛，才能团结一致。現在，虽然經過几度的运动，但一般知識分子的政治水平是不够高的，所以私人之間的斗争还是有的。如

果离开了党，那还可以想像嗎？自然，解放以来，党在学校里的措施，有的也有毛病的，但是党能承認錯誤，能随时总结，所以錯誤就易于糾正。

从高級知識分子个人說来，也只有党的领导下，才能得到發展，一般高級知識分子重視業務，忽視政治。尤其受了出身的影响，立場不穩。如果沒有党的領導，就易入歧途，而在党的领导下，他的工作就不会脫离國家的要求，才能使自己的工作 and 人民的需要緊密地結合起来，走上正路。如果远离了党，就会不自覺地走上为科学而科学的歧途，強調个人兴趣，这样就必然使自己的工作失却应有的作用和效果。一生徒勞，而在思想上亦必終日陷于煩悶和混亂的泥坑。

党对科学絕非外行

最后，吳先生批判了那些以为党对科学是外行的謬論。他說，党絕非外行，而且实际上有很多黨員都是內行，在埋頭工作。而最重要的是：党是真正重視業務好的人；凡是精于業務的，必然会受到党的尊重。所以，今天党对科学，对高等教育的領導是正确的。当然，小毛病是有的，但那也多半出在行政方面。而今天的“教授治校”論者，他們只看到發展途中的一些小缺点，而对于大的成就反而熟視無睹。如教学改革，这是多么偉大的事業！把中國的資本主义教育一下轉变为社会主义的教育。这个大轉变，他們却反而並沒有看到或感覺到。

現在党在文教，特别是在高等教育的領導，它的气魄是多么宏大呵！八年来，高等教育的建設，無論从物質或精神方面講，都是我們这些从旧中国走过来的人所不敢想像的。

而这些都是和党的领导不可分的，今日的“教授治校”論者，他們恰恰是錯用了它当时所产生的优点（如反领导），而要發展它的缺点。为了高教前途，我們必須揭穿他們的陰謀。

斥“教授治校”的謬論

王欣夫

右派分子王恒守提出的“教授治校”口号，是和章罗联盟骨干黃藥眠、費孝通等起草的“我們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議”（草案初稿）互相呼应的。不过章罗联盟骨干是向党正面进攻，目的要取消学校的党委制；而王恒守则从另一方面进攻，目的要党退出学校的领导权，完全是一鼻孔出气。他們企圖篡夺党在学校里的领导权，即就是要破坏社会主义的建設，而重回到資本主义的老路上去。这是一个非常險惡的陰謀，也是右派分子向党放出的一枝毒箭。

“教授治校”在解放以前，如北大、清华、武汉等校，都有一个时期曾实行过。但是它有历史背景，有好的和坏的各面，結果造成了少数人的把持和宗派的罪惡，决不能拿来試行于今天社会主义下的高等学校。倘是硬要提出这个过时的問題来迷惑人們，必然有他的別有用心之处，是無可怀疑的。关于这个問題，報紙上已有不少文章和談話，詳細地分析了它的內容，严肃地駁斥了它的謬論，此地不再重复。

右派分子要使党退出学校的领导权，自然必須無中生有的指出党领导的缺点，于是誣蔑学校办得“乱”、“偏”、“糟”。但是他們沒有想到事实是胜于雄辨，一手是不能掩尽天下耳目的。解放八年以来，学校在蓬蓬勃勃地發展，科学研究有了不少的成績，都是鉄的事实，瞎子也能摸到的，誰也不能否認。难道他們真的沒有看到么？他們有意地抓到了个别的小缺点，就夸大地抹煞一切地說成是“乱”、“偏”、“糟”。可

是人們是有理智的，決不能相信你們的誣蔑，反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你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企圖了。

其次，他們強調“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理由。這句話在表面看來，似乎言之成理，所以思想模糊的人，很容易受它的迷惑。其實黨是不是真的外行呢？不！不但是黨員有不少學者和專家，並且黨是一向虛心學習的，經過八年來，黨員中從不懂而懂，從外行而內行的不在少數。一方面向知識分子敞開了黨的大門，不是這幾年來有許多高級知識分子和老年專家被吸收入黨嗎？另一面黨正在努力培養青年知識分子，連右派分子楊兆龍也知道，他說：“將來紅色科學家培養出來，你們老年科學家就要下台”，雖然這句話是意味着挑撥作用，但也可以知道黨的內行人正在不斷滋長，怎能說黨是外行呢？

再來看一看教授是不是都是內行呢？當然，每個教授對於他的本業是內行，不能說對於一切的學科都是內行。在一門學科中也各有專門的特長，不能說是全面內行。所以說“教授治校”就是內行領導，是不切實際的。例如“萬能科學家”錢偉長吧，前天報紙上有人揭發他“不懂裝懂，外行裝內行”。錢偉長不是曾經有名的教授嗎？假使請他來治校，恰恰正是“外行領導內行”。拆穿了講，他們是要假借教授的名義，來篡奪治校的實權，一切花言巧語，是經不起批駁的。

每個機構，尤其是高等學校，是決不能沒有黨領導的！也只有黨才可以領導！一則因為黨是執行着建設社會主義的政策。政策譬如航海指南針。倘使航海而沒有指南針，就有迷惑方向和觸礁沉沒的危險。所以沒有黨的領導，我們就不可能為社會主義很好地服務，而要陷入斷港絕潢中去。

二則因为党是掌握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器。只有馬列主义，才能正确地改造我們的立場、观点！我們大多数从旧社会来的，旧思想的殘余，不可避免；新思想的建設，不够巩固。所以沒有党的領導，就不能幫助我們进步，甚至于不自覺地誤入歧途。总之，党的領導，就是一个人的灵魂，沒有灵魂，就是一个殭尸。

我們对于党的領導，必須拥护！“教授治校”的謬論，必須粉碎！

“教授治校”問題的本質

吳 征 鎔

右派分子提出“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教授治校”等等謬論，向党大肆進攻，也曾迷惑了不少好心人。這一些問題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呢？

首先，現在提出教授治校，當然意味着現行的制度是有缺點了。我國現行的制度是校委（學委）討論重大問題而由校長全權負責的。現在的高等學校校長中絕大部分是有名的學者擔任的。我校陳校長和蘇副校長都是全國和世界知名的學者，他們也是教授。校委會中的成員更不用說了，他幾乎包括了全部的教研組主任，自然也包括了大多數的教授在內了。那麼現在負責領導學校具體工作的不是都是教授嗎？為什麼右派還要提出什麼教授治校的問題呢？因之這一問題不能單從字面看，要看右派提的辦法，原來右派提出教授治校不過是黨委退出學校或黨委專管思想和行政的另一提法，是騙人的名詞而已。他們提出教授治校不過是想奪取對培養青年知識分子的領導權。

我們知道，任何階級都要培養自己的知識分子。為了要建設社會主義，我們必須要使得我們的高等教育能培養出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知識分子。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黨的領導主要是為了這一點。教學改革也正是如此。我們決不能放棄這一點，因此必須加強黨的領導。教授治校的口號恰恰相反地要削弱和取消黨在學校中的領導。

其次，對教授治校這一口號本身要從階級觀點來看，我

們知道任何人都受了階級的烙印。教授本身是個職業名詞，它沒有階級意義，有無產階級的教授，也有資產階級的教授。在今天必須是無產階級領導，這是憲法中規定的。教授治校中的教授顯然不是指無產階級的教授，因為如此就不會要將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排斥了，因之教授治校只能理解成資產階級的教授治校，也就是說，要在高校中進行資產階級復辟。

第三，教授治校的另一面是意味着科學與政治分開。王恆守和其他主張教授治校的人不是主張黨委退出學校，就是名義上還保留了黨委但是實質上將黨委降低到總務科的地位或者是專管思想工作。對於最後一點好像言之成理，黨委和學委分工，一個管思想一個管業務。實際上脫離了業務談思想還有什麼呢？對學生在校中的最主要的思想工作就是樹立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堅定信念。這一切是和教學內容（即教學計劃和大綱及政治課程）教學方法（樹立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方法）和教師的以身作則絕對分不開。脫離了業務談思想只剩下生活細節了，也就是取消思想工作，培養脫離政治的個人主義者了。

第四，王恆守說蘇聯早已實行教授治校，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筆者去年到過蘇聯對蘇聯高校制度進行考察。蘇聯高等學校現在所行的是和中國現行的學委作為諮詢討論機構的校長負責制一樣，重要計劃如科學研究計劃均先在黨委中討論。雖然最近蘇聯有擴大學委會職權的建議，尚未定實行，但是蘇聯革命已四十年，教授中百分之四十以上是共產黨員。高校培养目标，計劃制度等均已逐步穩定，其情形絕非中國現在可比。以此次反右派鬥爭中各校情況看來，右派分

子在教授中还有相当人数，而或多或少受到右派思想影响者更多，我国在今日絕不能不增强党的领导。因之即使苏联能扩大学委会职权，亦不能結合我国实际。所謂“苏联早已实行教授治校”之言出之于坚决反对学习苏联的王恒守之口，显然是别有用心之無耻謔言。

第五，主張教授治校者往往盛称清华。事实上在解放前的清华虽然培养了不少人才，但清华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实验性的研究，和其他大学一样，未脱离半殖民地性質，年青的学生以考取留学为目的，这显然是不能符合今日的要求的。清华的教授治校更因为評議會一小撮人的权力太大，因而产生了严重的宗派主义。所以清华式的教授治校决不是我們今天所需要的制度。

总之，教授治校提出显然是别有用心。但是他的惡毒之处是在利用了我們过去在教学改革中有少数领导对老教授意見尊重不够，因而使老教授的作用發揮不够，同时老教授中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思想不够这个缺点。这些缺点是可以通过改变工作作风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来克服的，而絕对不是通过基本制度的改变，和取消党的领导来克服。我們和右派斗争已經取得初步的胜利，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从思想中和他們彻底划清界限才能彻底消灭他們的影响。

黨不能領導科學文化嗎？

董 問 樵

中国人民經過几十年的奋斗，牺牲了許多革命先烈的热血和头顱，才選擇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設社会主义社会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果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業化及对农業、手工業和資本主义工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社会主义經濟制度的初步基础。这就是說，短短八年中間我国完成了一百多年所沒有作而且也作不到的事情，实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团结，使全世界的劳动者和爱好和平的人民为我们欢欣鼓舞，使帝国主义者感到惊惶失措。“不飞則已，一飞冲天！不鳴則已，一鳴惊人！”这正是对于屹立在亞洲大陆上的新中国的写照。

正当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划快要胜利完成，第二个五年計划的远景已展佈我們眼前的时候，資产階級右派份子們利用党整風的机会，向党和社会主义事業猖狂进攻。他們佈置各种陰謀，制造各种謠言，玩弄各种手法，其目的是反对共产党的領導和社会主义建設，而夢想实现資本主义的复辟。單以右派份子企圖篡夺党在文化科学教育方面的領導权來說吧。他們說黨員是小知識份子不能領導大知識份子，外行不能領導內行，他們主張教授治校，他們甚而提出了反动的科学綱領。他們四处放火，拉攏人，迷惑人，以为可以从这方面打开一道缺口，来顛复党的領導权。可是，他們的如意算盤畢竟使他們不能如意！我們知道，我們建設社会主义社会

是包括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因此，黨的領導也是全面的。不能說黨可以在軍事、政治、經濟方面領導，而獨不能在文化方面領導。實際上，建國八年以來，我國的文化教育事業在黨的領導下獲得了偉大的成績。通過院系調整與教學改革，使新中國的教育根除了從前舊中國那種奴化的，封建的和資產階級的性質，而為廣大勞動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建設培養人材。在“向科學進軍”的號召下，我國科學事業也有了重要的發展。無論在科學隊伍的擴大，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以及與生產的密切結合上，都是解放以前所夢想不到的。這些鐵的事實，右派份子們能夠一筆抹殺嗎？

再以復旦大學來說吧。解放幾年以來，面目煥然一新：社會主義大學的的體制，逐步建立，為工農子弟開門，學生的數量增加，質量提高，學校的規模擴大，設備改進，圖書充實，教授中不再聽說有什麼留英、留美、留德、留法……以及國內什麼北大、清華、中大、南大……之類的派別林立。難道這些不是事實，不是在黨領導下所獲得的成績嗎？更不用說，解放以前，絕大多數教授所親歷的種種動盪不安，苟且偷生的苦況，以及絕大多數學生在“學校畢業之日，即在社會失業之時”的慘狀了。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設社會主義，這不僅是絕大多數中國人民的堅強信念，而且已成為實際生活的不可動搖的發展軌道。社會主義的建設大業好比是鋼甲車，在共產黨這個火車頭的牽引下轟轟隆隆地前進。右派份子們妄想來阻礙這偉大的歷史車輪的前進，真應了中國那句“螳臂當車”的古話。狂妄的螳螂傲然伸出它的前爪，想抗拒鋼甲車的鐵輪，不讓它前進，我們可以看見，遭到粉碎的不是巨大的車輪，而是這愚妄的可憐蟲！

“教授治校”是一服糖衣毒藥

李振麟

“教授治校”乃是右派分子执行統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綱領在高等学校的一个具体“方針”。它的直接目的是把党的領導趕出高等学校，而由一小撮右派分子来統治高等学校。換言之，也就是由陈仁炳、王恆守、張孟聞、孙大雨来統治復旦，以錢偉長、曾昭掄、潘光旦、吳景超、費孝通等統治清華、北大等。这么一来，新復旦將倒退为旧復旦，新清華將倒退为旧清華，新北大也將倒退为旧北大，总之，資本主义教育將在高等学校借屍还魂。于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學習苏联、反对教育計劃、教学大綱、反对政治課（馬列主义）等一系列右派分子的計劃，就可以在高教貫徹执行。思想改造、院系調整、教学改革、肃反等社会主义革命將被倒算。

右派分子首先造謠污蔑我們，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等学校办得“乱”、“偏”、“糟”，然后把这种捏造的罪名加之于党，提出党委退出学校，“教授治校”的狂妄反动主張。

“教授治校”是右派分子的糖衣毒藥，这个口号对于一些資產階級思想濃厚的人有不少的迷惑作用，誤以为这样是“民主”的办校方式。其实，王恆守等所主張的“教授治校”，它的實質是“右派治校”，即王恆守、張孟聞、孙大雨、陈仁炳、錢偉長、費孝通治校。因此，我們一定要指出，“教授治校”就是資本主义在高等学校的复辟。这是每一个中国人民所不

能容忍的。

王恆守之流把“教授治校”說得天花亂墜，似乎這是一種制度，而且說這是解放前有，而在今天已經失去的一種“民主”教育制度。動輒舉出清華大學的“教授評議會”制度作為他的事實根據。這完全是謊話。

首先，我們可以看看清華的“教授治校”是怎麼回事，我在清華大學、清華研究院都讀過書，也在清華教過書，對於清華所謂“教授評議會”有些了解。我們在学校時把“評議會”看成是一小撮教授組成的宗派統治集團。其中的核心人物有蔣廷黻、顧毓琇、潘光旦、陳福田、錢端升等，這些人物不是反動派，就是美帝的走狗，還有一些多半是右派。我記得很清楚，清華大學“教授評議會”里的進步分子可以說是絕無僅有。有人說“教授治校”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有進步意義，其實清華的“教授評議會”固然在某些問題上（主要在人事、經費問題上）和國民黨反動政府有矛盾，可是它和美帝無矛盾，清華的“教授評議會”是直接為美帝服務的民主個人主義者的宗派集團。這個宗派集團又和設在紐約的管理清華500萬美元基金的基金保管委員會聯繫。因此，清華的“教授評議會”可以說是美帝設在中國國立大學里的一個反動統治工具。評議會掌握了經濟、人事、基建、科學方向等方向的大權，幾乎一切校內大事都由少數人來決定，一般教授根本沒有發言權，因此清華的“教授治校”完全是把頭集團的壟斷、專制，那里有什麼民主。比方說：清華教師過去有五年休假制，教書滿五年可以出國休假研究，事實上把頭集團的人或是跟把頭們關係深的人，可以五年出洋一次，一般的教師十年也難輪到一次；有的助教干了十幾年，因為跟這些人關係不好，

也輪不到出国进修机会。又如，清华研究院有这样一条规定，研究生得了硕士学位，口試、論文成績均在80分以上的可以享到公費出国留学待遇。但是你如果得罪了把头，80分的碩士也不一定能出国。我知道1934年有一位姓朱的历史系研究生，因为得罪了蔣廷黻，成績80分以上而被取消了出国权利，后来这人却自己考取了美庚款出国。1937年外文系有一位專門研究莎士比亚的研究生叫蔡文显，碩士學位考試成績也在80分以上，因为得罪了美国特务陈福田，也遭受了同样命运，現在蔡先生是中山大学英国文学教研組主任，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按照清华人事制度，助教做滿四年可以升“教員”（約当現在的講師），可是1939年在我工作的那个系里，有一个原来成績最坏的，研究院入学考試成績是倒数第一的助教，因为跟“治校”的“教授”有关系，一年就由助教升为教員。可是另外比他成績好，年資長的却升不了，不少饱学之士，干上十年八年还是助教。这种情形在清华不是个别的例子，那时大家敢怒而不敢言，因为每年一度的买卖合同制，对于教师是一种生活的威胁，除了少数人之外，解放前又有那一位大学教师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呢？有人說到“教授治校”时还要說这是“民主”“法制”，咱們看看这是什么“民主”，什么“法制”？

我們还應該揭穿，提倡“教授治校”論者，一方面把解放前的高教界的不民主、假民主說成是“民主”，另外又把解放以来大学教师們所享受到的空前未有的民主权利一笔抹杀，硬說教授不是高等学校的主人。为了駁斥这个謊言，举几个事实就够了。复旦大学从校長、教務長、系主任到教研組主任，絕大部分教学科学研究工作的具体領導都是由教授担任的，在党政統一領導下，还有校務委員會、系学术委員會、工会

委員會、民主黨派統戰會議等幾條綫來貫徹民主辦校的精神，這些委員會的成員也多半都是教授。去年搞一次工資改革，幾乎征求、考慮了每一位教師的意見，試問解放前，教員的薪金標準除了校長之外誰能過問呢？其它事無大小，黨和行政都要征求教師的意見，連分配幾所房子都不例外。這次“鳴放”當中更是空前地發揚了民主，教師們提出的意見在記錄上就有上百萬字，有很多意見已經及時做出改進處理，一句話，解放以來黨在高等學校里是貫徹了依靠教師、办好學校的原則的，唯其如此，教學改革以來，教師們才發揮了空前的積極性，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我們認為今天教授已經做了大學里的主人。

為什麼右派分子要提出“教授治校”呢？上面講到“教授治校”是右派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總綱領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可以進一步揭露，有這麼一個規律，凡是大聲叫囂“教授治校”的一般都是在舊大學里當過把頭，享過特權的人，比方叫喊最力的右派分子王恆守過去在山東大學就是和反動派站在一起的把頭之一。這些人喊出的“教授治校”，實質上是表示沒落階級對於過去統治地位的一種懷念，一種反動的復辟思想的露骨表現。他們說的“教授治校”就是要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打翻，把我們全體教師已經享有的民主權利剝奪，而由他們這一撮右派分子再統治宰割我們，因此我們必須大聲疾呼：“教授治校”是一服糖衣毒藥，不要上王恆守之流的當，我們要堅決反對王恆守、張孟聞、孫大雨、陳仁炳、王造時這批右派分子重新騎在我們頭上。

從這次鬥爭中，我們找出一條真理，想要爭取民主權利，咱們就必須加強黨的領導。

外行可以領導內行嗎？

戚祖嘉

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最后目的便是要在各种建設事業中篡夺党的領導权，在高教科技方面当然他們也不会放松的。这表现在曾昭榆的反动科学綱領，王恆守、錢偉長的“教授治校”謬論以及張孟聞在学校在系在教研組中企圖排斥党的領導的种种言行。这說明右派分子是一脈相承，一鼻孔出气的，他們有着共同的綱領，各人利用一切时机在各自的崗位上向着同一目标进攻。按照他們的說法那么全国的科学研究，全国的高等学校中，上至办校方針，下至系和授研組的活动中党都將退出領導地位。右派分子如此篡夺了高教科技方面的領導权，以后要把我国的文化教育事業引上什么道路呢？这是很清楚的了，不必再加討論。不过他們要党退讓領導地位不是明說的，他們有一套所謂“理論”根据，我們每一个人对于他們取消党的領導的結論是不会同意的，可是往往容易被他們的論点所迷惑，因此只有充分駁斥他們的論点以后，才能使我們每一个人更坚信党的領導。

右派分子取消高教科技方面党的領導的主要論点是什么呢？这就是他們的所謂“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年輕助教不能領導系主任、教研組主任”等等的一套似是而非的議論。現在讓我們分析一下“外行”是否果真不能領導“內行”。

讓我們先問什么是內行？發这种議論的人当然都是自命為專家的，可是試問你是這一行的專家，別人是那一行的專家，誰是一切學問的內行呢？那么誰可以領導呢？要說能領

導一切的內行那應該是通曉馬列主義的內行，因為馬列主義固然不研究每一個具體的自然現象，可是它概括各種科學的成果，指出科學研究的方向，分析各種科學之間，各種事物之間的关系（當然也包括了進行具體科學研究的人）。科學發展到了今天，這樣一個錯綜複雜的高度水平，在一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国家中是必須有計劃地進行而不能是手工業式的無組織的發展的，必須有領導是肯定的。誰是領導的內行呢？共產黨是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的黨，因此黨來領導科學研究，教育事業也正是內行的領導。右派分子也常說黨的領導他是擁護的，可是工農幹部年輕助教懂得什麼可以來領導我？這說明他們對於領導兩字的曲解。黨的政策是必須由黨員來推行貫徹，年輕助教及工農幹部的黨員不是單憑他自己的學問，見識來領導的。借反對年輕助教工農幹部的黨員來領導，在實質上也就是反對黨的領導。

再問究竟什麼是領導兩個字的真正含義呢？“領導”是黨的方針政策的貫徹和督促。至於如何得到貫徹，則必須要有被領導者的勞動創造才行。黨是領導的內行可是並不是每一行的專家，因此領導不等於指揮命令，在事實上黨的領導也永遠是走羣眾路線的。這在科學研究，高等教育的領導中是再清楚也沒有了，例如黨領導了科學研究的十二年遠景規劃，具體的規劃內容還不是集中許多非黨的專家的意見？某一個專家進行那一項研究工作也不是由黨命令決定，而是由各個專家自由選擇的。又例如在學習蘇聯方面，黨只是督促大家學習。至於學習什麼？怎樣學習？則黨不可能，也從沒有作過具體的指示。然而有人由於個別事物學習蘇聯不當而認為學習蘇聯便是教條，這不是曲解學習？曲解領導是什麼？這不

是右派分子言論是什么？党的領導非但不是指揮命令，而且党还号召黨員向專家請教學習，在領導中克服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了社会主义建設，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作为一个領導，党是非常謙虛的，然而也正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設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作为領導，党也是决不迁就的。这也正好說明为什么一般人这样欢迎党的領導而右派分子如何厭惡党的領導。

总而言之，这样的“內行”，这样的“領導”在科学研究教育事業中是完全必要，完全合理的。右派分子歪曲了“內行”的意义，歪曲了“領導”的意义，別有用心地制造出一派謬論来混淆是非，迷惑羣众，以求最后达到篡夺領導权的目的，我們是决不能允許的，我們坚决要求党在科技教育事業中的領導。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爲什麼站起來了？

蘇乾英

——斥右派分子王恒守所說清末張之

洞辦工廠的失敗，生產關係落后的原因小，
沒有重視科學研究的關係大的謬論。

右派分子王恒守一向披着民主教授、進步人士的外衣，到處散佈反動言論。自從今年四月二十五日他在上海文匯報發表了一篇題爲“我看高等教育工作”的文章以後，他的猙獰面目更加暴露無餘。在這篇文章裏面：他捏造事實，諷刺馬列主義，狂妄地要把馬列主義的真理“校訂”一番；把我們的教學改革說成“亂”、“糟”、“偏”，主張“教授治校”，企圖取消黨的領導。同時，他還毫無根據地把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比之清末張之洞的辦工廠，並指出張之洞辦工廠失敗的原因，“生產關係落后的原因小，沒有重視科學研究的關係大”。為了夸耀他的博學多才，他更引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的辦工廠爲証說：“兩邊（中國和日本）的生產關係都是同樣落后的，但日本的工廠沒有那樣慘敗，足見當時日本人的科學研究精神比我們強，就站起來了。”王恒守的謬論，大部分已經有人駁斥過，在這裡，我想把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站起來的原因說一說，使大家更加明了這個自命爲博學多才的右派分子完全是信口開河，胡說八道。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的生產關係是不是同中國一樣都是落后的呢？事實上完全不是這樣，日本自從經過一八六八年（明治元年）的資產階級革命以後，封建的幕府制度已經消滅，

代之而起的是适合于資本主义發展的天皇制度，随着封建制的崩潰，封建的生产关系也开始改变，生产資料大部份为地主資產階級所佔有，資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逐渐佔着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和清朝末年的中国是完全不相同的，清朝末年的中国腐朽透頂的封建統治制度仍旧存在，阻碍生产力發展的封建生产关系还没有改变，在那种情况之下，縱然有几个受着西洋資產階級思想影响的地主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出来办工厂是無济于事的，張之洞的失败主要原因便在于此。右派分子王恆守所說的張之洞的失败，“生产关系落后的原因小，沒有重視科学研究的关系大”，完全沒有根据。事实上，在清朝政府的那种腐朽的封建統治之下是不可能提倡科学研究，縱然提倡亦是無益的。

明治維新以后，日本人办工厂之所以成功，除了内部封建生产关系的改变，天皇政府对于新式企業的大力扶植之外，国际环境的关系亦是很大的，大家知道，十九世紀后半期的英国，为了防止帝俄的东进，巩固和扩大它在远东的商業利益，它必須在远东找一个得力的伙伴，日本就是它心目中最理想的一个，明治維新以后，英国除了大量借款給日本，以安定日本的国家財政之外，在工業建設方面亦給予以很大的帮助，日本有了很多的工厂，如：紡織厂、制鉄厂、兵工厂以及煤矿、鉄矿、銅矿、金矿、銀矿等都是采用英国机器設備，在英国技术人員的指导之下进行生产的。英国为了扶植日本势力，它还不顧世界輿論的指責，联合美国支持日本来侵略朝鮮和中国。一八九四年（明治二十七年）七月，它更帶头宣佈廢除对日不平等条約，解去了日本的束縛，使日本資本主义的發展更加迅速。由于这些事实，我們可以看出

明治維新以后日本之所以能够站起来，主要原因是由于内部生产关系的改变，其次是由于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并不是像右派分子王恒守所说的那样，因为当时日本人的科学研究精神比我们强。

于此尚须特别指出的是張之洞办工厂的失败，除了当时中国内部封建生产关系没有改变之外，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亦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以英国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者为了巩固它们在中国的掠夺利益，必然不愿意看见中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它们想尽种种办法来打击中国的民族工业，使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无法发展起来。事实上，到了十九世纪的末年，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已不可能有由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家能够摆脱原来被压迫的地位而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清朝末年張之洞办工厂的失败，乃至后来張季直办工厂的失败都是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有不可分离的关系的。

历史证明，中国今日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可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欲把中国拉上资本主义的死路是全体中国人民所共同反对的。柯庆施同志在这次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特别指出：“社会主义的道路是百年来中国人民找到的最正确的道路。解放以来，祖国面貌日新月异的变化，证实了这一真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清醒吧，请把中国近百年的历史重温一下，及早回头，不要一误再误，自绝于人民。（此文发表于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文汇报）

黨對報紙工作的領導不可動搖

余 家 宏

右派新聞“理論家”王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綱領，除了他的五六萬言的“新聞學原理大綱”外，還提出了一個妄想取消黨報的口號，就是：黨委不懂得報紙的特點，沒有通過報紙的特點來辦報。

王中所謂的特點是什麼呢？王中所謂我們不懂得的特點又是什麼呢？

王中認為目前的黨報不能滿足讀者的需要，沒有“生活氣息”，太強調了工作的指導性，而缺乏對生活的服務性。因此，他主張黨報不要宣傳黨的政策，不要介紹工作經驗，不要刊載指導性的文章；報紙要以“服務”為主，興趣為主，才是讀者所需要，羣眾所歡迎的。

這裡，王中根本否定了黨報的任務、全黨辦報的路線，而代之以他的資產階級的辦報路線。我們知道，黨報最大特點，就在於它的指導性。黨報的任務是宣傳黨的政策，指導黨的工作，反映在黨的領導下，人民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部生活面貌。黨報是給羣眾以共產主義教育的思想武器，教育羣眾認識和理解黨的政策措施，鼓舞羣眾的熱情，在他們各自的崗位貫徹黨的政策措施，做好他們的工作。我們認為，報紙對羣眾進行共產主義教育，指導羣眾工作、學習，就是最有意義的“服務”。我們的服務與王中所理解的資產階級報紙的服務的性質是根本不同的，王中的所謂“服務”是買賣新產品，指導遊覽，影劇廣告等等純粹為滿足某些有錢的

个人的享受的“服务”——买商品、游覽、看戏，在資本主义社会，难道是劳动人民可以普遍享受的吗？王中妄想把我們的报纸也变成资产阶级报纸那样，專門去迎合讀者的低級趣味，引导讀者到極端个人主义和墮落的道路上去。这就是王中所热中的“服务性”，这就是王中的所謂报纸的“特点”。王中说，我們的报纸強調了指导性，忽視了“服务性”，就是沒有懂得报纸的特点；我們說，指导性正是無产阶级报纸的特点，我們重視报纸的指导性，通过报纸指导工作，正是充分地了解和掌握了無产阶级报纸的特点的表现。

党报的指导性，也表现在党运用自己的报纸及时地反映和推动党在每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党通过自己的报纸宣傳中心工作，了解羣众的动向，檢查工作在各地进行的情况。报纸这一战斗武器的作用就在此。王中——这个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場看問題的右派分子，他自己最討厭中心工作，看到报上宣傳中心工作最头痛。当然不足为奇。可是他竟厚顏無恥地認為中心工作的宣傳，也不是羣众所关心，不是有普遍兴趣的。我們知道，党的中心工作正是集中了羣众的需要，从羣众生活中最重大的問題提出、又为了羣众的利益而推行的。解放以来，党领导的各項运动，都是羣众最关心与羣众的利益最密切的大事；就是每一个时期所提出的工农业生产，劳动竞赛，增产节约——等等問題，也都是劳动人民最感兴趣的生活中的問題。报纸上的这些宣傳，正是符合和满足了最大多数羣众的需要的。王中認為报道工农业生产和各項工作的新聞都是枯燥無味的。他怕“机器声”，怕工作指导，怕經驗介紹，怕听“大道理”（他認為我們报上的新聞文章都是如此），而我們却需要并且重視这样的新聞。资产阶级右

派分子的興趣和需要，和我們完全是兩樣的，他要的是資產階級腐朽墮落的、滿足個人生活享受的新聞。他仇恨社會主義，不愛自己的工作，他不願看自己本行的新聞，竟硬說各行各業的讀者都是不愛看本行本業的新聞的。因此得出結論：報紙的內容不應有生產方面的報道，應該都是“生活”方面的新聞，報紙不應該為工作服務，應該為“生活”服務。

我們認為，報紙要擴大報道面，反映羣眾生活的各方面，是絕對必要的——也是當前報紙工作亟需改進和正在改進的地方，但是這絕不等於取消報紙對生產、工作方面的反映和指導，相反的，擴大報導面正是為了加強對羣眾生活各方面的指導，更好地為羣眾服務。這與右派分子所說的那種資產階級的“生活氣息”，是完全不同的。

根據這種“本行人不愛看本行新聞”和“為生活服務”的謬論，王中就主張取消各地的以報道工農生產為主和以工農羣眾（幹部）為主要對象的省級報，以報道農業生產和以農民（幹部）為主要對象的專區報和縣報，以及各機關和羣眾團體所領導的專業報紙（如工人報、青年報），而代之以經濟區域為範圍，以城市為中心的報道有“興趣”的“服務”性的新聞為主的所謂“全民性”報紙。這樣，就是把各級行政區域和各機關團體黨委所領導的報紙都一律取消了。王中這個計劃乃是企圖從政治上來改變我們報紙的內容，從組織上來改變我們辦報的路線。王中的所謂“通過報紙的特點”的口號，實質上是向我們黨報進攻，妄圖取消我們黨對報紙工作的領導的毒辣陰謀。

王中不僅要改變我們報紙的性質和組織（報紙規劃），而且反對報社編輯部按照黨的每一時期的工作，制訂報道計

划，企圖从报社内部的工作上来取消党的領導。王中說，新聞不能預知，所以不能先訂計劃。他故意抓住我們計劃中某些靈活部分，或实施过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缺点，硬說訂計劃是不可能和不必要的。因为从他的根本反对党的領導的反動观点出發，报纸按照党的工作計劃进行宣傳，動員羣众積極地完成党的每一时期的中心任务，全都認為不必要了。王中反对社会主义的計劃原則，主張資本主义無政府状态的竞赛，反对宣傳的計劃性，喜欢資產階級报纸那样“有聞必录”（他認為这才是报纸的特点）。我們的社会主义的計劃原則，体現在我們党的工作的任何方面，包括报纸工作的計劃性，宣傳內容的計劃性。这也正是我們党的工作——包括报纸工作——的特点，也正說明我們党是善于运用和掌握了自己的宣傳工具的特点的。

事情不是很明白嗎？王中所說的我們不懂的特点，正是我們党报的特点；王中自己所提出的特点，却是資產階級的一套，如果我們按照他的办法去办报，那我們的报纸会走上什么道路呢？不是很明白嗎？我們要揭穿他的詭計，堅持無產階級的办报原則，保衛社会主义新聞事業！

駁“黨天下”論

郭紹虞

“擒賊先擒王”。右派分子言論中最惡毒而又最容易混淆是非的莫過於儲安平之“黨天下”論。“黨天下”的說法是章羅集團中骨幹分子共同商討的集體創作，同時也得到譚惕吾之流的共鳴，所以首先要駁斥“黨天下”論。

儲安平說：“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他要取消黨的領導，但在表面上又不敢否認黨的領導，於是把黨領導說成把這個國家看作黨的所有，好像黨的領導和以前專制君主之家天下沒有什麼分別。這用意的惡毒，真像他自己“檢討”時所說：“想用黨天下這頂帽子來反對黨的領導，企圖分裂黨和人民的关系”。（見十四日解放日報）所以不能不加以嚴厲的駁斥。

譚惕吾說：“現在政府有一套機構，黨內又有一套機構，這是雙軌制度。”就實質講，這正是“黨天下”論的翻版。不僅如此，即王恆守的教授治校之說，譚惕吾的司法檢察等部門不應該受黨委領導之說，以及藝術界的同人刊物的主張都和“黨天下”說有息息相通的关系，所以我說它最容易混淆是非。

但是，怎樣駁斥呢？“擒賊先擒王”，也必須指出它中心論點的錯誤，才能使這種謬論不會起混淆是非的作用。

第一，他有意混淆宗派和階級的分別，而是把宗派代替了階級，所以認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陳新桂的反動謬論也是這樣講：“無產階級專政是個根，如果不

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將越反越多’。他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錯誤論点呢？即因他們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所以用資本主义社会中对政党的看法来看待共产党，于是把党和非党的矛盾看作是宗派主义的根源。假使站在無产階級的立場，那么党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队，党和非党的关系只有多走一步和少走一步的分別，大家都是同伴者，怎会形成宗派呢？不仅如此，資本主义社会的政党是为它的小集团謀利益的，所以不能也不敢反对宗派主义，共产党是为广大的人民羣众服务的，所以必須要反对宗派主义。这是很簡單的事理，可是由于他們站在另一个立場，于是对这簡單事理也看不清楚了。周总理在最近的报告中說：“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反对宗派主义的，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共产党都坚持团結一切可以团結的力量，因而才形成了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結”。这是很明显的事实，但是他們也看不到。他們在民主革命时期，是处在可以团結的范围之中的，但在过社会主义一关的时候，他們階級的原形畢露了，自居于可以团結的范围之外了，于是把党和非党的矛盾，看作是宗派主义的根源。我們必須提出，这种混淆是階級立場的关系。

第二，他又有意混淆領導和管理的分別，而把領導代替了管理，所以會說“事無巨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点了头才算数”这种惡毒挑撥的話。我們为明辨是非，必須指出他錯誤論点的根源，那么所謂“以党代政”，所謂“有职无权”等等的說法也就可以获得解决。周总理說得好：“共产党必須領導一切的原則主要是从政治上来說的，并不等于一切具体工作都要共产党直接管理。”在这一节話里，領導和管理的區別是分得很清楚的。正因这样，所以有些機構

部門的領導者並不是黨員而這些非黨人士也和黨員合作得很好，彼此之間無牆無溝的。至于有時個別部門發生一些問題，那是另外兩種原因：一是由于正待克服的個別黨員的宗派主義作風，二是由于非黨人士的盡責不夠，這却和黨的領導制度沒有關係。我們只須回顧一下：假使沒有黨的領導是不是可以進行三大改造和五大運動？假使不經過三大改造和五大運動，又是不是能像今天這樣有步驟有計劃地進入社會主義社會？這都是不可想像的事，所以周總理說，“黨對於人民羣眾直接發出政治上的號召和政策性的決定，對於政府工作不但沒有妨礙，而且有很大的幫助”。因此，他們故意把領導說成管理，企圖取消黨的領導，又是立場的關係，因為他們根本不要走社會主義的道路。

第三，他有意混淆組織和人事安排的分別，而以安排代替了組織，所以又說，“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實是不是如此呢？他在自己的“檢討”中已經承認這是不符合事實的。不符合事實而他故意要這樣講法，除了挑撥黨羣關係而外，就是由於他資產階級的个人主義思想，只注意名譽地位，所以看不到黨的組織，只看作是黨的安排，也就以安排代替了組織。我們要知道：共產黨員是有個共同的理想的，是為這共同的理想，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鬥的，所以共產黨員可以不顧名譽地位，只顧國家需要，把個人利益服從黨的利益，而到黨，國家和人民羣眾所需要的任何工作崗位上去。所以在社會主義社會里黨和非黨人士的區別，除上文所講多走一步和少走一步之外，就是“認真地執行黨的政策和決議，積極地完成黨分配給自己的任務。”當然，許多積

極分子也可以做到这一步。但是在斤斤計較个人利害的，就絕對不会体会到这一点。就这一点講，对右派分子而言，共產黨員真可說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周总理在报告中說：“要保證政府各方面政策的正确执行，就必须机关、学校、企業和团体中都有共產黨員的坚强的核心领导”，所以这是党的领导作用，也即是党的組織力量，而右派分子从个人主义的观点出發，当然要看作是安排問題了。

从这样看，右派分子和我們沒有共同的思想，共同的語言，当然在紧要关头，更不会有共同的步伐。称他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一些也只不过火。

右派分子“九斗”論

兼 南

当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他們在問題的提出上，在詞令上，都裝扮出是在严肃地向党“提意見”；但他們反党的居心和他們資產階級的“本質”却也不自覺地暴露了。

南史上載着謝灵运的一段談話說：

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奇才博識，安足繼之！

謝灵运的这一番話，一方面表見了他对曹子建的欽服的感情，一方面也表見了他对天下人才的輕視。想不到这段話被今天的右派分子看上，利用它来反党了。在七月間党委召集的帮助党整風的座談会上，右派分子王恆守說：“天下才共一石，子建占八斗；今天共产党占天下九斗，剩下一斗大家分，所以矛盾多了”。（大意如此）这样来看矛盾問題，真真比謝灵运本来的話尤其可佩服了！他是如何看党，和他的如何看待国家事業，以及他是站在什么階級立場上来講話，也都是十分明显的了。

党的領導，和党的宏偉的社会主义建設，都建立在馬列主义改造社会的偉大理想上。这是人所共喻的。右派分子却从爭奪名位上看問題，却从腐朽的“利益均霑”的思想上来看問題，这就無怪他們虽泰山在前而熟視無所睹了。也就显然共产党所占九斗太多，而右派分子所占不过滄海一粟，所以因而不滿，而来“代表”人民講話了。別的不說，八年来，誰領導着把瘡痍滿目、穷困不堪的中国挽救起来的？突飞猛进

的全国性的偉大建設，是什么人在組織着領導着？連帝國主義者都在惊奇的一日千里的發展，是些什么人發揮着他們的作用和勞力？這些，右派分子却都視而不見，獨斥于“九斗”“一斗”，這真是除了名利之外，一無所見了。

右派分子常裝作先進，和敢于向党講話的態態來表示他們自夸的公正和強項，却有時把他們資產階級的而目也表露了。他們總是在“一斗”“一粟”之中翻來翻去的。

駁斥儲安平“黨天下”的謬論

李 維 民

右派骨幹分子儲安平發表了“黨天下”的謬論以後，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與駁斥。但是其他右派分子或者某些具有右傾情緒的人們，却對這種謬論表示欣賞與同情。聽說在我們學校就有人發表過這樣的謬論，大意是說：“如果中央能以適當的地位去安置儲安平，是為上策；不然一棍子將他打死，則為下策”，這種論調毫無疑問是“黨天下”論的衷心擁護者，不管說話者的動機如何，我認為他的骨子裡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儲安平認為“黨羣關係不好的問題的關鍵在於‘黨天下’這個思想問題上，形成現在這樣一個家天下的一色局面，‘黨天下’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儲安平的這種講法，顯然不但是歪曲了現實，並且也歪曲了歷史。中國自辛亥革命後至解放前，各個時期的反動統治者，無論是北洋軍閥政府，或者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政權，都是宗派主義盛行，各種政治派系林立，特別是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時期，宗派主義發展到了頂點。在國民黨內部就存在着許多政治派系，例如 CC 派、政學系、朱家驊派、三青團派、太子派、軍統、中統及其他等等，在國民黨以外是不許其他政治派別合法存在的。在抗日戰爭時期，蔣管區內的共產黨組織，根據國共合作的協定，應該是無條件的合法存在的，可是國民黨竟以“異黨”相看，想盡了各種辦法進行破壞與摧殘。當時國民黨

政府換了一個部長就要更換部內的整個班底，換了一個校長也要調換大批的教職員，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所以當時人民恨透了國民黨政權，罵它們是“蔣家天下陳家黨”。

儲安平由於痛恨社會主義，痛恨共產黨，企圖把解放以前中國人民咒罵國民黨政權的這句話加以簡化用來辱罵中國共產黨，其用心誠狠毒也！然而儲安平沒有把自己的眼睛睜開來看看，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它是大公無私的和堅決反對宗派主義的政黨，它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真正為人民服務而為人民羣眾所愛戴的政黨。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建立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人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制度，凡是國家一切重要措施都是根據人民的意志，特別是勞動人民的意志，同一切愛國人士和所有民主黨派共同商量決定的。各級政權和行政管理機關都有很多非黨的負責人參加領導工作，這在我們學校里也不是例外的。同時中國共產黨自始至終是重視統一戰綫工作的，解放後，人民民主統一戰綫不是縮小了，而是更加擴大了。就以上海為例吧，第一屆市人民代表大會中，黨員代表占百分之四十六，而本屆只佔百分之四十；各區人民代表大會中，黨員代表佔的比例，也比以前降低很多了，一般只佔到三分之一左右，其餘均為非黨的勞動人民和民主人士（包括非黨的高級知識分子）；過去全市當副區長的只有三名非黨人士，而現在有的區就有三名，很多區至少有兩名；上海市副市長共八名；其中非黨人士就佔了四名；現在市內許多機關還安排了許多非黨的局長和副局長。在全國人代和政協中，非黨的勞動人民和民主人士更多。從以上的事實看來，這是共產黨“黨天下”的作法麼？這是共產黨的“清一色”麼？可見儲安平

所講的那些話，完全是對共產黨的造謠污蔑。儲安平企圖利用“黨天下”這個惡毒的名詞來反對黨的領導，挑撥黨和人民的关系，從而替章羅聯盟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杜撰荒謬絕倫的理論根據。

總路綫公布以後， 就“人心向背”了嗎？

陳 觀 烈

右派分子有一種說說的本領：把謊言和真話混在一起來說，為的是以偽亂真，以真飾偽，弄得真偽難分，使人容易上當。

×××就曾耍過這個花招。他說：“共產黨在解放之初頗得人心，總路綫頒布以後就人心向背了。”

這話有無道理？說這話的人用意何在？讓我們來分析一下。

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初期深得人民擁護，這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右派分子在他們的言詞中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雖然他們並不是以這一點來歌頌共產黨，而是以這一點來襯托出後半句的“人心向背”，借以污蔑共產黨，咀咒共產黨，彷彿共產黨正在走下坡路，必須請右派先生們來“收拾殘局”。

問題在於總路綫頒布以後人民是否就背向共產黨？要說的話，那一定是因為出現了這麼兩種情況：第一，總路綫和共產黨在人民解放事業中所提出的綱領大相逕庭，就像一般資產階級政黨在上台後的所作所為遠離它們的競選口號那樣；第二，總路綫所指引的奮鬥目標和到達這個目標的途徑，違背了中國人民的意志，損害了中國人民的利益，因此，人民對共產黨失去好感，反生惡感。

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就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这个总路线的提出，虽然是在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终结的时候，但它的基本内容，却屡见于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旧的文献之中。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过：“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因此，1945年6月中共七大所通过的党章规定：“……中国革命在日前阶段是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在将来阶段，在中国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得到彻底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中国人民的意愿，经过必要步骤，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制度而奋斗。”1949年三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也指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已经巩固、社会主义成份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已经确立、国家的经济恢复工作已经基本上完成而且人民群众的觉悟已经普遍有所提高的历史时期来宣布这个总路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是实践它对人民的

諾言的适时举动，而非“言之不預”，更不是“出尔反尔”。因此，如果承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張在解放初期已經深得人心，那又有什么理由說，总路綫的頒布，会导致人心的一百八十度轉變呢？右派分子拿这一点来污蔑共产党，适足以說明他們自己是利令智昏、思想錯乱而已。

不錯，总路綫是否得人心，归根到底还得看总路綫是否符合于人民的利益。現在，讓我們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一下。

总路綫对广大的劳动人民來說，無疑地是福音。因为实现总路綫，就会实现我国人民百年来的一个大願望——国家工業化，就会使我国的生产力从資本主义的束縛和小生产的限制下面解放出来，从而就会使亿万劳动人民永远摆脱貧困的境地。大家都記得，在我国經濟恢复时期結束的时候（1952年），工業生产还只是超过战前（1936年）水平的22.3%，各种主要消费品还远不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年产量：棉布是每人7.33公尺；食糖是每人0.79公斤；机制紙是每人0.66公斤，远不及苏联1928年的水平），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农村人口中还有60%—70%的貧农和下中农，城乡中还有几百万的手工业者，他們在个体經營条件下無法过富裕的生活；在私营工商業中，三百多万职工还在受資本家的剝削，不能充分發揮他們的生产積極性，不少資本主义企業要扩大生产有困难，甚且生产下降，有些企業則陷于癱瘓状态。对于这一切有关的人們，总路綫不就是光明的“奔头”么？

也許有人不能在总路綫一頒布时就預見上述的美妙前途，那么，讓我們根据总路綫的初步执行結果，来做個“事後諸葛亮”吧！第一个五年計劃的头四个年头中，我国的工

業总产值一共增加1.05倍，其中某些重要的工業品（如噴气式飞机、載重汽車、大型發電設備），在我国还是破題兒第一遭設厂生产；某些重要工業品（如鋼鐵、煤炭、机器）四年的产量，就抵得上解放前几十年。農業的生产，在这几年中，虽然遭遇到两个大的災荒年，但1956年的总产值还是比1952年增加26%，粮食和棉花还是大大地增产。由于工農業生产的迅速增長，所以广大人民的生活，便有了显著的改善：1952年，全国职工的年平均工資是每人446元，而在1956年，便增至616元；1950年，全国农民的購買力是81亿元，而在1956年，即增至191亿元。这一切惊天动地的变化，难道不是推行社会主义工業化政策和实现国民經济社会主义改造的結果么？（1956年底，全国96.3%的农户和92%的手工業者分別参加了農業和手工業生产合作社；占全国資本主义工業企業职工总数99%的工業企業轉变为公私合营企業；占全国資本主义商業从业人員85.1%的商業企業，轉变为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和合作商店、合作小组）难道不是总路綫給人民帶來的幸福么？右派分子如果說广大劳动人民因总路綫的頒布而背向共产党，那就是睁着眼睛說瞎話！

是的，在国内和国外，是有一些人不喜欢总路綫的。帝国主义、蔣介石集团、和不甘心灭亡的地主階級分子、官僚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是不喜欢总路綫的，因为总路綫的實現，就是意味着強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建成，这样，他們就更加沒有指望可以卷土重来了。資本家和富农，由于他們的狹隘的階級利益和社会主义相冲突，他們之中有些人不明大势所趋，夢想把我国革命停頓下来，好讓他們繼續过着剝削寄生的生活，因而对总路綫不滿，对共产党有貳心，这也

是不足为奇的。右派分子所指的人心向背，大概就是指这些人的思想感情吧！? 既是这样，那么，右派分子究竟是站在誰的立場說話，还不清楚嗎？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面目，也就昭然若揭了。

其实，資本主义要讓位于社会主义，这是客观的历史規律。广大的中国人民既尝到社会主义的甜蜜果实，也决不会走回头路。資产階級右派分子的复辟陰謀，不过是螳臂擋車罢了。

“黨天下”論的實質

姚善友

儲安平“黨天下”論，對像我這樣政治嗅覺不很靈敏的人，乍聽之下，似乎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他不是還舉了些事實么？他不是說“願意在黨的領導下盡其一得之愚，期對黨有所貢獻”么？事實上，在這種糖衣炮彈里，儲安平卻販賣着毒藥，其用心是十分陰險毒辣的。

首先，“黨天下”論的目的是在爭奪領導權。雖然在口頭上，儲安平承認，“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使自己經常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事實上，儲安平對這一切都看不順眼，他竭盡其污蔑之能事地說“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鉅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後來儲安平自己也說，這是與事實完全不符的。但是他偏要用誇張的手法，惡毒地丑化黨的領導。他的目的就是要推翻黨的領導，要民主黨派和黨分庭抗禮。他說：“只要有黨和非黨的存在，就有黨和非黨的矛盾”。意思是說，只要取消了黨和非黨的界限，就萬事大吉了。話雖然說得很隱諱，目的就是要推翻黨的領導。

儲安平的用意是很深的，手法是巧妙的，但是請他不要打錯了主意罷，我們的國家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是憲法所規定的，我們人民決不允許儲安平之流用偷天換日的手法來篡奪領導權。再說解放八年來各方面的成績

是惊人地巨大的，这一点連我們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認。在党的正确領導之下，我国已經进入了社会主义。我們的建設事業已經有了突飞猛晉。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一切都和党的領導分不开的。儲安平之流卻妄想推翻党的領導，把我們拉回到資本主义的老路上去，这一条老路的滋味，我們已經嘗够了，我們决不允許任何人再把我們拖回去。再說，即使就儲安平所舉的例子来看，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全是黨員，我認为从时局的發展来看，这一措施正証明党的英明負責，假如在十二位副总理中出了一兩個像儲安平之流的右派分子，这对人民事業的損失將是多么巨大呀！

其次，我認为儲安平的“党天下”論在挑撥党羣关系，他自己在檢討中也說，他“企圖分裂党和人民的关系”，他說党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他把現在的局勢說成了“一家天下”。他極力企圖把党羣关系說成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不但把党羣关系說成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而且把兩者隱約說成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兩方面。我們决不允許儲安平之流歪曲我們的党羣关系，党和人民是血肉相連，休戚相关的，党为实现人民的愿望而奋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自己的愿望而努力。兩者是領導与被領導的关系，兩者間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的矛盾，决不能歪曲成为外部敌我矛盾。

儲安平企圖用“党天下”的論調来篡夺領導权，挑撥党和人民的关系，从而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陰謀，替章罗罪惡集团打下理論基础，他的用心是十分陰險毒辣的。

右派對積極分子的進攻

伍 鑫 甫

(一)

中国共产党帮助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头上的反革命势力，使中国人民把自己的历史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在党的领导下，向着富裕而又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迈进。中国共产党不只是中国人民的最好的朋友，而且是最好的老师。像这样的良师益友，中国人民以前从来不曾有过。那么，中国的广大人民衷心拥护共产党，高高兴兴地跟着共产党走，也就成为十分自然的事了。中国人民中间有不少的一部分，在他们工作中比其余的人表现更靠近党，更坚决地接受党的领导，更热忱地响应党的号召，更迅速地跟着党走，给整个国家和人民做了更多的事情，而却不考虑到自己的名利得失，因此获得一个光荣的称号——积极分子。党有了积极分子在周围，不仅能够更好地贯彻党的领导、方针、政策；在各项工作中，而且也通过积极分子的中介作用，能把党和群众的关系搞得更好，这样就可以替人民办更多的事，办更多的好事。正因为如此，所以新中国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运动，才能取得辉煌的成就，而在这些改造和建设过程中，党的领导和积极分子的首先拥护党的领导，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有人问：积极分子是怎样的人？我们可以回答说，请看他们在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便明白了。如果又有人问：积极分子与一般人民有何不同？我们可以回答

許多話，不過最重要的恐怕是這一點：積極分子比一般人民有着更高的政治覺悟，表現在他們對不斷改造自己提高自己的那種主動的要求上；他們不把改造當作空話，而是通過工作中的不斷進步來作自我改造的具體表現，尤其是他們具體認識到只有在工作中擁護貫徹黨的領導，才能改進工作，也才能改造自己。在這一點上，積極分子比一般人表現得更加突出一些。此所以他們的積極性比一般人也來得更加鞏固，更能持久。換言之，積極分子的可貴，首先在於他們的道德品質，政治品質。我們說過知識分子是國家的寶貝，但是由於人們的政治道德在社會主義事業中起着決定作用，所以我們就更應該說，積極分子尤其是國家的寶貝。因為知識分子並非全部要求改造自己，裡面可能會暗藏着右派分子，而積極分子如上所述，是主動要求改造提高的，裡面不會有右派分子。否則的話，那便是偽裝積極的壞分子了。

（二）

積極分子既然在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事業中佔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反對黨領導，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右派集團分子，也必然要反對積極分子了。他們不惜採取種種方式來污蔑積極分子，比較典型的有下面三種。

一、北京右派分子的做法：污蔑積極分子為“歌德派”、“但丁派”，這類名詞是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右派分子黃萬里在新清華 182 期所發表的“花叢小語”中所創造出來的。黃萬里的理由是：有些積極分子對黨歌功頌德，可以稱為“歌德派”；又有些積極分子但知丁住領導黨員，隨聲附和，自命立場穩定，可以稱為“但丁派”。

二、上海右派分子的做法：污蔑積極分子為黨羣之間的

“护城河”、“桥头堡”，首先提出这种謬論来的是右派分子魯莽、韓鳴等十二人于五月份上海市政协第四次会上所作的联合發言，題目叫做“填滿护城河，削平桥头堡”。

三、还有一种对積極分子極尽污蔑之能的办法，也出现在上海，那就是右派分子孙大雨所干的，把“反革命”的帽子加在積極分子的头上。

以上这些污蔑，其方法虽不相同，其目的則只有一个，那就是陰謀反党：为了向党进攻，同时就須向党周圍的積極分子进攻，从而孤立党。右派分子所打的如意算盤是这样的：四处造謠，把積極分子說成如何的糟，如何要不得，使他們在人民羣众中站不住脚，于是乎羣众將由于厭惡積極分子而怀疑以至反对積極分子所靠攏的党了。正是这么一方如意算盤，使魯莽說出極其惡毒的話：積極分子是“只身过海”，是一个子向領導跟前迈进，同时又用兩手去擋住羣众的去路，而大喊羣众“落后”。魯莽在这番話里，妄圖把積極分子从党的周圍拉开之外，更要使广大羣众也远远离开党。魯莽言外之意是：羣众看啊！党有多么糊涂，只相信積極分子，而積極分子却在党的面前說羣众落后，只有他們进步；党既然給積極分子这类坏話蒙蔽住了，那么你們羣众为什么还要跟着党走呢？党一向走羣众路綫，以人民利益为党的利益，这一点右派分子倒認識得很清楚，因此右派就想运用“一箭双鵰”的陰謀，就須得在污蔑積極分子的同时，切断党的羣众路綫了。但是解放八年来，由于党的啓發教育，人民的政治水平不断提高，眼睛越擦越亮，再也不会受右派这种陰謀的欺騙了。許多說不完的事实，都在証明人民因为爱党而爱那些最能坚决拥护党的領導、貫徹党的方針政策、而把工作做得特別好的积

極分子。試看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之中，在党委领导下，由羣众評选出来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許許多多積極分子，是如何受到羣众的欢迎，敬愛，他們在會場上被羣众高高举起，他們的先进經驗被广泛的介紹。我們只須举出一兩件这样鉄的事实，便足够反击右派謬論了。如果積極分子真像魯莽所說，是什么“只身过海”，“兩手擋住羣众去路”，那么，試問他們怎么还会受到羣众如此热烈的欢迎呢？可見像魯莽这样的毒計，是經不起事实的反击的。

下面談談右派分子孙大雨多年来在复旦里污讒積極分子，其用心也是十分險惡的。他身为罗隆基右派小集团骨干之一，遵照集团綱領，須要在高等学校中进行反对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陰謀活动，而反对校中積極分子既是这陰謀活动的一部分，孙大雨也就把它当做自己的專業了，其做法則是污讒复旦各級党的领导同志和許許多多教授为“反革命分子”。这里我們必須指出：被他污讒为“反革命分子”的許許多多教授都是教授中間的積極分子。然而复旦的積極分子平时不仅靠攏党，还在羣众中有很好的基础，所以复旦这一部分起着中介作用的積極分子虽被孙大雨所污讒，但复旦的党羣关系依旧很好，並沒有受到什么影响。因此，孙大雨在复旦里进攻積極分子从而进攻党的陰謀，被全部粉碎了。若就外文系而論，孙大雨攻击積極分子的陰謀还夾雜着許許多多挑撥离間的花样，所以对系內的团結起过一定的影响。这是指的肃反前后的一段时期。然而我們在反右派斗争中，把孙大雨的反动的丑惡嘴臉画得清清楚楚，跟孙大雨的右派言行，也划清了界限，于是系內小小的不团結也就不复存在了。

(三)

以上揭發右派进攻積極分子所抱的陰險目的。此外还可以看看右派这样做时，如何暴露了他們自己的反动本質。

黃万里在那篇謬論中談到所謂歌德派，但丁派的積極分子对党只能随声附和，不敢提意見，接着就惡意地說：一个政府不可能沒有缺点与錯誤，却一味掩盖缺点，只求表面一致，这就是現政制的特点。我們知道党和政府从未掩盖缺点，从未拒絕批評，此所以党才会有兩次的整風。然而黃万里却偏偏說这样毫無根据的話，尤其是提出了所謂“現政制的特点”。这里，我們听到了黃万里的弦外之音：他对中国現在的政治制度是不滿的，認為須得換一个政治制度。那么，換什么呢？黃万里在这文章里也流露出来了，就是美国的臭不可聞的壟断資產階級假民主的政治制度。他写道：尽管美国政治腐敗，但如果美国政府的措施有缺点，納稅人民要起来叫喊，局長和工程师就当不成，市長下度竞选就有困难。他接着又来这末一句：我国人民总是最好說話的。他說的这一大串，是什么鬼話？原来是在歌頌美帝的政治制度，認為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人階級領導、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專政好；是在說新中国的政治制度太坏了，把一切都搞糟了，中国人民不起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进行所謂資產階級民主的复辟，这真是太好說話了。这里我們看得很清楚：黃万里从罵新中国的積極分子起，一口气罵到新中国的政治制度，煽动羣众起来反对这个制度，这和另一右派分子王造时并無兩样，要在各个基層放火；說复旦办糟了，学生再不罢課鬧事，未免太好說話了；說美国民主虽然不好，美国的法治却很好等等。这里我們看到了黃万里和王造时一样，有着如何反动的政治立場。

再看孙大雨在复旦进攻积极分子的同时，也完全暴露了自已的反动立场。他竭力反对学习苏联，反对教改的一切措施，竟认为这一改把鸦片战争百余年来的外语教学成就都改掉，再有廿年都无法恢复。他言外之意，要向被他污蔑为“反革命”的系内几位积极分子，大兴问罪之师。这里说明了孙大雨还念念不忘于那一去不复返的帝国主义侵华时间给予我们的殖民地的奴化的外语教学，希望用它来代替今天适合于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外语教学。

黄万里骂积极分子，要抬出美帝的反动政治制度，向群众“夸耀”一番，孙大雨骂积极分子，也要抬出帝国主义给中国的奴化的外语教学，向群众“夸耀”一番，他们不仅是“异曲同工”，而且都是在谩骂之余，把他们的认为好得了不得，也就是我们所认为坏得了不得了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看。他们的思想和立场，真是反动透顶了。在这里，我们还可找出右派言论行动的一条规律：骂积极分子和给反动制度或反动文化捧场，是分不开的。

(四)

我们分析到此，在对于积极分子的看法上，跟右派分子划清了界限。我们肯定地说，积极分子是宝贝，是党、政府和人民所普遍欢迎的好人；但右派集团分子反党反人民，自然把党、政府、人民所认为的好人，硬说成是坏人。我们由于爱党爱社会主义，所以也爱那许多人，他们在接受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上表现得十分积极；但右派集团分子由于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所以必然要反对积极分子。右派分子自己坚持反动，不愿意改造自己的立场，看见别人进步，心里就恨，孙大雨那样恨复旦的积极分子，并非由于什么私人

恩怨，而是決定于他的反動立場的。我們今天站在進步的革命的立場，要把積極分子也引為良師益友，相互之間進行學習批評，如果發現個別積極分子有些缺點和錯誤，也只是善意地提出意見，決不會對積極分子破口謾罵，肆意污蔑。然而孫大雨、黃萬里等並不像我們這樣來對待積極分子，正是因為孫大雨、黃萬里等是右派分子。

積極分子是個光榮的稱號，我們不允許右派分子對這稱號肆行曲解和污蔑。而且我們每一中國人民都可以取得這個光榮稱號，成為積極分子，只要他（她）站在革命的進步的立場，肯在工作中虛心學習馬列主義，學習工農兵，接受黨的領導和教育，不斷改造自己，提高自己，為社會主義事業的勝利而努力，向黨的、人民的、社會主義的敵人作鬥爭。這個稱號就會屬於這樣做的人。這樣做也就是對右派的一個有效反擊。

右派分子爲什麼要

誣蔑非黨積極分子

蘇紹智

右派分子用以向党进攻的策略之一就是攻击非党積極分子。右派分子对非党積極分子極尽誣蔑之能事，辱罵他們，威脅他們、丑化他們，非要把他們搞臭、見不得人才甘心。

右派分子数了非党積極分子几个大“罪狀”，实际上这些罪狀正是對他們自己的描繪，右派分子誣蔑非党積極分子为“桥头堡”、“护城河”，說他們是脱离羣众的老祖宗，把党和羣众隔离起来的人。实际上不难看出，企圖把党和羣众隔离起来的究竟是什么人？正是在工作中的个别偏差上大作文章的右派分子。王恆守不是企圖用教学改革上的“偏、乱、糟”的謬言来造成教师羣众和党的隔閡嗎？非党積極分子都是来自羣众，和羣众有着密切的联系，懂得羣众的脈搏，同时又靠攏党。了解党的政策的同志，他們正是党与千百万人民羣众中間的橋樑，他們善于引导羣众積極地参加政治运动和社会生活。远的不說，就拿这次反右派斗争來說，广泛参加各种座談会、报告会，揭穿右派分子的面目，批判他們，帮助羣众擦亮眼睛，引导羣众参加斗争的，不正是这些非党積極分子嗎？請看，究竟是誰脱离羣众，是誰企圖在党和羣众中間造牆挖溝？

右派分子誣蔑非党積極分子是投机分子，假裝積極，为了升官發財、不擇手段。实际上不难看出，不擇手段、虛偽

撞騙，兩面三刀，企圖升官發財的究竟是什麼人？王造時不是抬着“君子”的招牌，暗中企圖與黨對立，要求與黨分庭抗禮，篡奪領導的野心家嗎？廣大的積極分子正是為了工作、為了社會主義，具有自我犧牲精神，不計個人得失的好同志，有誰看到真正的積極分子平日工作懶散，而在評級評薪中爭權奪利？

右派分子誣蔑非黨積極分子是奉承拍馬、唯唯諾諾，頭腦簡單，是非不分的臉上擦白鼻頭的人物。實際上不难看出，臉上擦白鼻頭的究竟是什麼人？在反動統治時代，為特務頭子陳雪屏之母當孝子的不是自稱“硬骨頭”的孫大雨嗎？認為羣眾可以欺騙，把革命看作反革命的不正是孫大雨嗎？廣大的非黨積極分子正是接受了思想改造，提高了認識，一心擁護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在大是大非前能劃清界線，真正能幫助黨提出正確批評，作黨真正的諍友的好同志。

右派分子誣蔑非黨積極分子是“馬路科學家”，不會踏踏實實的工作，只會說說話。實際不难看出消極怠工、拒絕工作、挑撥離間、到處放火、奔走四方的究竟是什麼人？不學無術、講課連抄書都抄不好，挂着“大學教授”的招牌，四面放火的不正是陳仁炳嗎？廣大的非黨積極分子正是作風踏實，工作負責的好同志。很多積極分子都是優秀的工作者，不僅自己工作得好，而且還能帶動其他羣眾。他們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一種最積極的因素。

右派分子對非黨積極分子的誣蔑全非事實，非黨積極分子正是忠心耿耿擁護社會主義、擁護黨的領導，誠誠懇懇地幫助共產黨的同志，他們正是當今社會中的左派。毛主席曾經說過，勞動模範有三種作用：即帶頭作用、骨幹作用和

橋樑作用，非黨積極分子也有三種作用，是黨的好助手，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中堅。從相反的立場來看，我們可以說非黨積極分子好得很，右派分子說非黨積極分子糟得很，那麼有沒有糟得很的假積極分子呢？有的，就是那些平時耍兩面派的手段、用兩面三刀的手法欺騙黨和羣眾，企圖靠着積極分子之名爭取羣眾，而在緊要關頭卻露出狐狸尾巴的右派分子。

非黨積極分子既然與右派分子所描繪的正好相反，那麼右派分子之所以要盡情地攻擊非黨積極分子的心是昭然若揭了。他們企圖把擁護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能夠秉公執言，實事求是的非黨積極分子搞臭，使得他們在羣眾中孤立，使得黨孤立，便可以到處放火，箝制人們的言論，“只談缺點、不談優點”，便可以上下其手，打亂整風步驟，進行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陰謀。

但是，右派分子的老爺們，正像在許多其他問題上一樣，你們的如意算盤又打錯了，積極分子是孤立不了的，黨是孤立不了的，因為黨和積極分子是與羣眾有着血肉聯系的，是任何人所不能離間的。結果真正孤立的正是你們右派分子自己，你們正處在“老鼠過街”的窘境。正告你們，趕快投降是你們唯一的出路。

陰險的挑撥

濮之珍

資產階級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手段之一，就是陰險毒辣的挑撥。右派分子楊兆龍說：党不要老教師了；又說：青年教師打擊老年教師。他的這些無恥的謊言，是妄想挑撥知識分子與黨的團結，挑撥老年教師與青年教師的團結，製造分裂，以達到它不可告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目的。

那麼，事實是怎樣呢？，事實是和右派分子所說的恰恰相反。記得解放前我讀大學的時候，老師們的情況是這樣的：他們的工作沒有保障，一年一度換發聘書，失業隨時在威脅着他們。他們的科學研究得不到支持。他們的生活非常困苦，有時為了生活，不得不賣去較好的衣服，甚至較好的書籍。記得有一位老師，冬天床上只鋪着稻草，身上穿了件破棉袍，他曾經自嘲的寫了兩句打油詩：“褥墊黃金草，袍開白玉花”。但是，解放以後，他們的情況就大不相同了，他們在各大學安心、努力、愉快的工作着。有一位老師，不久前害了一場極危險的病，黨指派了最好的醫生替他醫治，病終於醫好了，這位滿頭白髮的老教師曾經怀着激動而感激的心情對我說：我現在的生命是黨給的，我一定要更好的為黨為人民工作。

就拿我們復旦大學來說，黨委正確地執行着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組織我們學習馬列主義，提高政治認識。大量添置圖書設備，支持我們的科學研究。在生活上那更是比過去提高得多了。很多老教師積極靠攏黨，有的參加了黨。

我們再看青年教師與老年教師的關係。解放後，由於大

家經過學習，認識提高了，知道人民的科學教育事業，需要有很多同志共同努力。因此，老教師是那樣熱心的，毫無保留的教導青年教師；青年教師也是十分誠懇、虛心的接受老年教師的指導。就拿我自己來說，我擔任的“語言學引論”是一門新課，我所以能較快的掌握這門課程，是與吳文祺教授無私的幫助分不開的。記得我初開這門課時，我主動的去請吳文祺教授，張世祿教授來聽課，請他們提意見，他們聽課以後，指出缺點，幫助我進步。不僅如此，我們中文系老年教師較多，青年教師也不少，我只看到老教師們是那樣熱心無私的指導青年教師，青年教師們是那樣虛心努力的向老教師學習。像右派分子楊兆龍所說的“青年教師打擊老年教師”是沒有的事。總之，想想過去，比比現在，右派分子的謊言就會不攻自破；右派分子的陰險挑撥也就無能為力了。這次反右派鬥爭，我個人體會比過去土改鬥地主，肅反鬥反革命來得更複雜，更尖銳。右派分子很大部分是高級知識分子，他們是知道知識分子的弱點的，他們就是利用知識分子的弱點，進行陰險的挑撥，來向党進攻。記得右派分子猖狂向党進攻開始的時候，他們的謠言，不是曾經使我們迷惑過么？他們的挑撥不是曾經使我們相信過么？而光榮正確偉大的黨又一次向我們敲起了警鐘，使我們清醒過來。

總之，反右派的鬥爭，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我們知識分子，必須繼續學習馬列主義，改造自己的思想，站穩立場。只有黨才是真正愛護知識分子的，而知識分子也只有跟着共產黨走才有出路。

教學改革的成績是不是主要的？

苏步青教授在反右派斗争講演会上發言

我們說教学改革成績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但右派分子却說：教学改革缺点是主要的，成績是次要的，甚至沒有。王恆守說：解放后的高等教育工作办得是偏、乱、糟，至多只能打五十分。王造时說：从北京到上海，办大学的都在混，大学办成这个样子，学生早該起来罢課鬧事。

好，我現在就来講几个数字，看一看教学改革成績是不是主要的。讓右派分子，在这些数字面前低头發愁吧！

1954年担任开課的青年教师有30位，現在能开課的有131位。教研組1952年剛成立时有28个，現在有47个，增加了80%。开課的科目，1953年是150門，現在是273門，增加了90%。这些課有不少是由培养出来的青年教师担任开課的。科学研究的題目1953年有176題，而1957年有345題，增加了一倍。还有小型科学討論会，1952年时只有数学系两个教研組举行；1956年全校各教研組就举行了460多次，除了像孙大雨这样的人不参加，其他人都来了。党委还保証我們有5%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可是孙大雨他体重178斤，做了些什么科学研究工作？他研究的只是如何顛复社会主义事業，在中国制造第二个匈牙利事件。

再拿学校的圖書、設備、經費等条件的發展来看；1952年时合併了十几个高等学校的圖書只有四十余万册，到1956年就增加了二十万册。1952年时学校經費总額是137万余元，1956年时就达到415万余元，是四年前的三倍。其中，教学費用

1952年时是13万余元，1956年增加到109万余元，是前者的七倍多；圖書費1952年时是3万多元，1956年增加到32万余元，是前者的十倍多，如果同1950年相比，更是增加了34.2倍；基本建設費，1952年时是6千多元，1956年增加到145万余元。

教學質量也有很大的提高。我們過去是沒有教學計劃的。我過去教了二十幾年書，也沒有個教學大綱，就是一本講義，我講你抄，上完課就走。解放前，還有位數學教授從德國回來，一回來就夸耀自己，在教務處門口貼了一張紙，上面寫道：“老子幾何學”。這位先生教微分幾何學，一年只教了二十多頁。現在還有沒有這樣的人，這樣的現象？要有，那就是這幾個右派分子的工作最蹩腳。孫大雨兩年不教書。陳炳仁講的課，原來選的學生有56人，後來只贖下了16人。王恆守是個冒牌的科學家，拿了講義，對物理系學生說自己數學好，對數學系學生說自己物理好。張孟聞這個“動物學家”，晚上卻把一條帶子當作蛇，不敢捉。

教學改革成績是主要的，還是辦糟了？這個問題已經很清楚了。教學改革的成績是主要的、肯定的，很大的。教學改革有缺點，我們要努力糾正這些缺點。但是右派分子想做的是根本抹煞一切成績，這些都是他們有計劃、有組織，想來製造一個第二次匈牙利事件的陰謀。

高等學校必須有黨的領導

虞 慶 駿

右派分子是这样的一羣人：他們借“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这个口号來散放毒草的；他們又是借幫助黨的整風為名，想在根本上取消黨的領導的。由於他們始終站在資產階級右派立場，所以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成就視若無睹，更談不到熱情。所以他們對黨或者是破口大罵，或者是惡意的詆毀，或者更惡毒一些，用花言巧語做隱蔽，實際上是有計劃有準備的向黨進攻的。

反右派鬥爭進行了一個多月了，參加了一些大小型的學習和批判的會。總的說來，右派分子的氣焰的確是被打了下去，但是要在羣眾中徹底消除他們的毒素，並且要使他們徹底向社會主義投降，這還是進一步的事。

小組會上有人這樣講，除了葛佩琦的言論和華東師大的一部分反動牆報，一看就知道是反黨的、反社會主義而外，其餘的例如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儲安平的“黨天下”……一直到王恆守的“偏、亂、糟”，他們在提出意見時候夾什一些歪理，乍看一下，却不能立刻辨別。就是一棵毒草，通過這一次反右派的學習，不但打垮了右派分子的氣焰，更使得廣大的人民提高辨別香花和毒草的能力。

大小會上批判過的事很多了，現在再來談談王恆守提出的“偏、亂、糟”。他說：學校中的思想教育是“偏”，行政工作是“亂”，教學改革工作是“糟”的，現在的教學成績至多打50分。我以為：王首先提出了“偏、亂、糟”，似乎為他的

后一个口号“教授治校”做理論根据的，而后一个口号就是要来否定党在学校的领导作用的。

要看教学改革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首先应当对解放前后的畢業生的質和量作个对比，才能下正确的結論。解放后專門人才大量的增加远超过解放前，这是有目共睹的。至于畢業生的質方面也是普遍的提高了，解放后的畢業生都有一定的規格，拿大的生产做比喻，就是說廢品極少。不像解放前一样，各校的規格不同，因此造成了質的悬殊情况。由于在教学改革中規定了总的教学計劃和教学大綱，建立了教研組，介紹了先进的教学方法，这一系列的措施，就一扫以往的無組織的、無紀律的、自由散漫的教学作風。解放前，有些教員在上課前不充分备課，在上課时乱講，在課后則夾着皮包回家，这种現象在解放后絕跡了。加以对知識分子的思想教育，使人人懂得集体的智慧远超过个人的智慧，使人人懂得有組織、有领导的做事，要比自由散漫仅有一得之見所起的作用大。我想，这些因素就是使解放后畢業生質的提高的主要因素。至于教学改革中，是有一些偏差的，但从效果来看，缺点只能看做是次要的了。

我以为教授在具体的教学工作以及研究工作中已經处于领导的地位了。这就是教授的实际地位和主要責任，又何必特別提出“教授治校”这个口号呢？党对科学家所須圖書設備是在不遺余力的支持的，这是有目共睹的。在党委领导下的学校減少了許多人事的傾軋，使得各个教学成員都能沿着正确的途徑，一心一意地去搞教学和研究。一个教授既然有了这些基本条件了，又何必提出“教授治校”。說到思想改造吧，总不能說極大多數的教学干部都已經擺脫了資产階級思想

吧。这一种思想会不自觉的抬起头来，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是互不相容的。这种思想的逐步改造，没有党的领导和教育是不能实现的。总的说来，一切思想领导和物质的支持，离开了党就是不行的。更深一步来看吧，如果党因退出学校了，“教授治校”实现了。由于右派分子也是治校成员之一，势必掀风作浪，企图把教育事業轉到资产阶级方向上去，并且人事的倾軋必扰扰不休，且使大部分想安心教学的人不能安于教学，恐怕还要有些忠诚为人民服务的教员将被指控为反革命分子（假如孙大雨为治校的成员之一的話），其禍害自不待言。学校中党的领导地位是肯定的，如果曾經有过某些偏差的話，例如：“管得太多”“倾听羣众意見不够”等等，都是可以用向党提出意見来解决的，而不是根本否定党在学校领导的地位的問題。

党經過曲折而艰苦的斗争，终于领导着全中国人民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而独立自主地站了起来。剝削制度將一去不复返了。解放八年以来，經過一系列的運動，人民的政权已經如磐石般的巩固下来。科学文化事業有着長足的进展，各方面的建設突飞猛进，都是使人十分鼓舞的。我們每一个人应当在党的正确的领导下，各展所長，以圖对国家有所貢獻，并应当站稳立場、划清界綫和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解放以來的英語專業教學

葛傳槩

一般右派分子把解放前后的一切事物比較起来，几乎都要說一声“今不如昔”。孙大雨对于英語教學的說法也不能例外。据他看来，解放前的英語教學成績，解放后就不再有了，非二十年不能恢復。

不能說解放前大學英語專業學生的英語水平全都比不上現在大學英語專業學生的英語水平，也不能說解放前大學英語專業學生沒有英語水平特別高，甚至于超过現在的許多大學英語專業學生的英語水平的。可是把極个别的例子来証明“今不如昔”，就犯了以偏蓋全的毛病。問題在于那个“全”是怎样。

解放前的大學英語專業教學怎样呢？虽然那时候也有所謂“課程标准”，姑且不問那“标准”本身的好坏，一般教师未必把它放在心上，或竟上課“随心所欲”地講一陣，無所謂目的性或計劃性。少数学生自己鑽研，可能有很好的成就；多数学生成績平平；那原来水平太低的学生們竟然不可能有进步。那少数靠自己鑽研而得到很好的成就的学生們，与其說因为那教學方法好，不如說幸而不曾受到那教學方法的大影响。那沒有进步的学生們，与其說他們不肯用功，不如說他們無法用功；那时的教材一般偏高，每班人数一般偏多，学生既感到所学跟原有基础脫节，教师又無暇照顧全部学生。

解放后的英語專業教學，有目的性，也有計劃性。教师们認真教，学生們認真学。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还有在解

放前办不到而现在已经办到的两件事：（1）教材不偏高；（2）每班人数少。（这两点我在大同大学在解放前曾经好几次提出过；在当时的环境下当然不能实现。）由于这种改革，现在的水平普遍提高。特别好的也有；特别坏的竟可以说绝无仅有。要是把大学英语专业学生在入大学后才从头学起这一个因素计算在内，现在英语专业教学的效率跟解放前比起来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了。

顺便提一提，右派分子对于任何事几乎都反对学习苏联。对于英语教学也不例外。从表面看来，好像只有俄语教学学习苏联才对；英语教学学习英、美才对。其实不然。俄语是一回事，英语教学是另一回事。我们并不说我们该学习苏联的英语，事实上苏联也没有另一种英语。可是关于英语教学（也可以说外语教学）苏联有不少英、美所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的先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駁斥楊兆龍所說的“法律系辦得最壞”的謬論

丘 日 慶

一、楊兆龍為什麼說法律系辦得最壞？

有言論，有行動的右派分子楊兆龍說：“法律系是本校辦得最壞的系”。他為什麼說辦得最壞呢？照他的話來說，是因為過去路子不對，是學“人大”。他要“不惜犧牲茅草棚的基礎，重建鋼骨水泥的高樓大廈！”另外，最壞的理由是“法律系是公安機關，法院作風。”

楊兆龍站在反動的立場，戴了有色的眼鏡，在他看來法律系當然辦得最壞。毛主席不是在“湖南農民考察運動報告”一文中講道：當時（1927年）鄉中的土豪、劣紳、惡霸、地主說農村中的農民運動搞得最糟，但我們革命派卻說農民運動搞得好得很嗎？由於我們階級立場不同，當然所見就不同，得出的結論也不同。

我們的“路子”搞錯了嗎？我們的“路子”一點也沒有搞錯。我們只嫌我們的系是否已十足地、不折不扣地按照我們黨和政府所規定的“路子”來辦沒有。我們辦系的“路子”是遵照1954年全國政法教育會議規定的教育方針來辦的。我們系的目標和任務是為國家培養忠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熱愛祖國、體格健全、具有堅定的工人階級立場和社會主義的政法觀點、掌握先進政法科學，熟悉專門政法業務的工作幹部和

法学科学研究工作者。

曾經在東吳畢業并曾經當過東吳法學院長的楊兆龍看來，當然說“路子”搞錯了，因為我們的法律系，沒有像過去的東吳一樣，為資產階級、買辦、官僚、帝國主義分子、地主和加強國民黨反動統治而培養“人材”，這當然使楊兆龍很失望，“路子”搞“錯”了，辦得“最壞”。

楊兆龍又說我們辦系是學“人大”。我們說，我們辦系學“人大”、學兄弟的政法院校有什麼不好呢？蘇聯是我們的的老大哥，無論在經濟建設、文化教育建設、政權建設等各方面都有足夠的豐富經驗。“人大”是在蘇聯專家直接指導下所創辦的新型大學，對於我們全國各大學起了很多示范和推動的作用，有重大的成就。絕不是如某些右派分子所污蔑說：人大是教條主義的大蜂窩。老實說，我們如果沒有人大的經驗，我們的法律系則不知怎麼樣辦呢？至少要走更多摸索的、更彎曲的路呢！因此我們說學人大沒有什麼不好。華東政法學院也是根據全國政法教育會議所規定的任務來辦法律系的，也是吸收人大的經驗來辦法律系，他們先辦，我們向哥哥學習，學習他們的先進經驗，又有什麼不好呢！

楊兆龍又說：“法律系是公安機關、法院作風”。我們的系當然不會有國民黨的公安機關、法院的作風的。因為我們是要摧毀，而且已經摧毀了國民黨反動的国家機器，連它的作風也在內。就是在我們政權機關里也絕不允許有國民黨反動的公安機關作風和法院作風，何況在我們的文教部門里面。我們的憲法規定：我們國家機關，必須依靠人民羣眾，經常保持同羣眾的密切聯繫，傾聽羣眾的意見，接受羣眾的監督。又說一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從

宪法和法律，努力为人民服务。

因此，我們系的作風，絕不会有过去国民党反动法院、司法机关的作風。退一万步說如果有的話，楊兆龙則不会这样說，同时也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了。因为楊兆龙曾久任国民党的大官，特別曾当了国民党最高法院的檢察長，他正是“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了。

那么我們的系的作風，如果是人民公安机关、法院作風那又有什么不好呢？我們的学生畢業后主要是在人民公安、司法机关服务，現在他們就学会了勤勤懇懇、联系羣众、調查研究、实事求是等作風。有了这样的优良作風，对于將來工作还有很大的帮助。我們欢迎之不暇？又有什么不好呢？所以他所指的当然不是人民司法机关公安机关的作風。由于楊兆龙站在反动的立場，一切都看不順眼，因此他階級本能地發出了法律系路子搞錯了，作風也不对，办得最坏。一系列反动的結論，那是很自然的，很可以理解的。

从上面看来，我們認為楊兆龙說法律系办得最坏，并不是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来下結論的，从而他的話当然不能作为标准的。

二、法律系办得怎么样？

現在我們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观点来看看法律系办得怎么样？法律系是新办的系，是从無到有的系。从今天的情形看来，我們可以說成績是基本的，缺点是次要的。現在从下面五点来看：

（一）学生的人数和政治品質 1954年开始招生，現在有学生 264 人，絕大多數为党团员（約佔四分之三），这就

保證了我們培養出來的政法人材能具有堅定的工人階級立場和社會主義的政法觀點。

(二) 教學機構和教學人員的設立和加強 1954年開辦之初，只有兩門課程的教學小組，現在設立了四個教研組，即民法教研組，刑法教研組，國家與法的理論和歷史教研組，國家法教研組，下有12個課程教學小組，並設立“犯罪對策”實驗室，里面配備了很多實驗用的器材，如照相機，圖片、模型等等。

1954年開辦之初，我們只有教師21人，其中教授6人，教員5人，助教10人，現在則有教師52人，(其中教授14人，副教授1人，講師6人，教員2人，助教29人。)大家都分配了教學任務，老教師也沒有例外，沒有投閒置散的情形。就是右派分子楊兆龍也分配了兩門課：資產階級刑法，資產階級刑法專題講授。不過這裡順便要指出的是在他沒有徹底改變反動的右派立場以前是沒有可能擔任上述兩門課程的。

(三) 課程講授質量的逐步提高 過去建系之初的第一、二年，由於客觀條件，課程講授內容多偏重介紹蘇聯方面，這是必要的，而且也應該如此的，現在經過同志們的不斷努力，克服困難，已完全改變過來，幾乎完全講授中國法律，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其次由於1954年建系之初，事前準備又比較偏促，為了把課開出，因此採取一門課由好幾個人準備、教課的方法，這樣就出現了某些課程，寫講稿的是一位同志，講的是另外一位同志。(講的人並不是不會寫，而是時間來不及)現在這種用別人的講稿的個別課程，已從去年起基本消滅。並且對所有專業課我們基本上都向同學發了我們自編的講義(不是將人大講義照搬)。(例如有8門課

發了講義，一門課發了提綱只有兩門課還是口授筆記）。這樣對於學生的學習，和教學質量的提高，就有大大的幫助。再次，由於教師們的 effort，所有各門專業課，都能依照教學大綱完成，沒有前松後緊現象，也沒有“偷工減料”現象。

（四）系內的專業圖書 1954年建系之初，我們的圖書是很可憐的，老的沒有，它們都在1952年跟學生合併到華東政法學院去了。故當時的圖書，寥寥可數，據說只有900余冊，現在有古今中外圖書約一萬二千余冊，中外雜誌141種（中外圖書雜誌，均包括蘇聯、資本主義國家的）。去年全國人大代表，北京政法學院教務長雷潔瓊來系參觀時說：復旦法律系里專業圖書比政法學院還多，我們有了這些圖書雜誌，對於科學進軍和教學就有很大的幫助和便利。當然我們還希望購置更多的圖書，我們並沒有因此而自滿。

（五）學生學習成績和效果 我們以為法律系辦得好不好，從上面各點看來已知其大概。現在我來談談最後一點，也是最主要的一點，更足以証實法律系的成績。我們知道一個系辦得好不好，歸根結底，最後要看看它的成品（畢業生）好不好，合不合乎國家規格要求，是不是廢品多，合乎規格的成品少。現在法律系還沒有畢業生，只有三年級學生，因此只能談談1956—1957年第一學期專業課學習成績和三年級學生最近實習情況。1956—1957年第一期學習成績是不錯的，例如國家與法的歷史學生中：優等的46人，良好的29人，及格的10人；中國國家法，優等的41人，良好的31人，及格的11人；中國民法優等的37人，良好的22人，及格的32人，無一人不及格，其他各課為考查全部及格。由此可見成績是不壞的。

三年級学生此次在法院和檢察院實習，机关对他們反映都很好，認為法律系三年級實習学生交給他們的任務一般的都能很好的完成，办理案件能实事求是，并能作到有分析、有批判、有綜合，可說已經达到国家培养政法干部的要求。特别是上海市楊浦区人民檢察院曾为我們的實習学生做了小結，并將它抄送最高人民檢察院、市政法部、市人民法院、市公安局、各区檢察院作为参考。其中指出“我們認為复旦大学的同志們實習時間虽短，但对我們今后的偵查工作，对每一个偵查程序的研究和实践是有很大益处的”。因为我們的同学，曾为檢察院提供了建設性的意見。

从上面看来法律系办得最坏的謬言就可不攻自破了！我們还能說法律系办得不好嗎？

不准右派分子抹殺我們教學 改革的成績

吳浩青

院系調整，實行教學改革，把舊中國的教學內容和制度改變成為新型的、為社會主義服務的高等教學。成績很顯著，好處很多，使我們高等學校獲得很快的發展。但是右派分子說我們的高等教學改得“偏了”、“糟了”、“亂了”。現在我們根據親身經歷的，擺在面前的事實看一看，是不是像右派分子那樣說的“偏了”、“亂了”、“糟了”？鐵的事實回答了右派分子的荒謬言論！

首先，我們來看一看解放以來，我們高等學校、學生數量和質量發展得怎樣了？我們還記得在舊大學里整個化學系的学生至多不過一百人，現在呢？發展到七、八百人了，學生質量也有着顯著提高。這表現在幾個方面：一、學生的知識比舊大學要廣得多。譬如，拿基礎課物理化學來講，以前是三小時一學年的功課，現在分為結晶學、物質結構、膠體化學和以熱力學為骨干的物化四門功課來講授，內容自然豐富而深入，系統性也加強了。每門功課都有教學大綱，它起着保證作用。以前，我知道一些教師，他們把自己有興趣的部分講得過多，把生疏的部分就略去不講或者少講，這種做法無論如何對基礎課是不妥當的。現在有了教學大綱，既照顧到應有的廣度，也保證了一定的深度。它很好地限制了教師在教課中的自由主義，同時保證了教師對教學負責的態度，

因此，學生的學習質量得到提高。二、新型大學的學生有正確的人生觀，對國家負責、對人民負責。絕大多數的青年有着這種良好的品德。我想除掉右派分子以外，我們所有的教師們都有同樣的覺得的。三、新型大學的學生重視體質鍛煉，他們的健康水平比以前提高了。從同學培養上來看，有着這些好處，能說高等教學“偏”、“亂”、“糟”嗎？不能。我說一點不偏、不亂、不糟。而且比以前好了，好得多了。好得夠不夠呢？好得還不夠。因為我們向蘇聯學習得還不夠。我們還要加強向蘇聯學習，教學會更好成績更多。

其次，我們比較一下，現在的圖書儀器和實驗室情況比以前又是怎麼樣了？化學系的圖書從院系調整到今天，由零零落落的百把本已增加到了4500余冊了，期刊還不在其內。以期刊來講，原來只有殘缺不全的一二部雜誌，現在已增加到250余种了，這裡包括中、蘇、捷、匈和德、英、法、日、美等國家的，這是圖書方面。實驗室呢，大家看到，在院系調整以前，（600）號一幢樓房要容納幾個系。調整之初，生物、化學、物理各有獨立樓房，（600）號整個一幢做了化學實驗室，現在已擴充到那麼大的新化學樓。實驗室設備也在陸續運到，已接近現代化水平了，要不是黨的領導，誰都不會想像會有今天的情景。拿出良心來講句公道話，我們的學校發展得那麼快，要是離開了黨的領導是萬萬不可能辦到的。這些事實，有目共睹，難道右派分子看不到嗎？

最後，我們談一下教學改革中教研組的作用。教研組的組織形式是教學改革中的重要環節，作用很大。它加速了師資的培養。到目前為止，化學系四個教研組已有了九個專門化，在研究工作方面，也已有着良好的開端。這方面的進展

是旧大学所不能相比拟的。

总之所講的，無論是在学生数量和質量的發展，圖書設備的添購，專業的設置；各方面都获得很多成績。这些成績有力的駁斥了右派分子对高等教学的歪曲。右派分子！你們說高等教学“偏”、“乱”、“糟”，事实不是如此。我們說高等教学有成績有进步。高等教学既不偏又不乱也不糟。偏的乱的糟的不是高等教育，偏的、乱的、糟的是右派分子的漆黑一团！警告右派分子們：我們教師們包括老年的、中年的都在教学改革里付出了自己的辛勤劳动，付出了各人的智慧，誰說沒有成績？我們的成績不准右派分子来抹杀！我們的許多成績是依靠了党的正确领导才获得的，我們不許右派分子来削弱党的领导！我們讀了毛主席的指示，懂得了六項标准，已能辨别香花和毒草，右派分子們，別想再来进攻了。

外文系的“教學改革一團糟”嗎？

董亞芬

右派分子孫大雨幾年來一直到處叫嚷着說：教學改革搞得一團糟，特別是外語教學改革，把鴉片戰爭以來一百年的英語教學成績都改掉了，今後20年還不能恢復以往水平。他這樣說不但完全否定了同志們這幾年辛勤勞動的成果，而且還企圖在積極為教學改革努力的教師們身上潑上一盆冷水，有個別的人的確曾被她拉住過後腿，認為系內有宗派，認為一切新的措施都是教條，因此對教學改革抱了消極的態度，但大多數的同志始終在黨與政府的領導下，在全國各地外語工作者的互助下積極地工作着，並且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為了要駁斥孫大雨的完全顛倒是非的謬論，我們必須把解放前後英語教學的情況作一對比，首先解放前後的英語教學目的就有根本的區別：周總理在他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地指出：“舊中國的教育主要是推行奴化教育，封建教育和資產階級教育，是為帝國主義和國內少數統治階級服務的”。我們知道解放前的英語教學更是直接為帝國主義的文化經濟侵略服務的，帝國主義者根本不想在中國培養出英國語言文學的研究工作者，只要能為他們利用，達到奴化中國的目的。即使你們學到的是洋涇浜英語也無所不可。過去有一部分中學十分重視英語，其目的就在為直接受帝國主義控制的郵局海關培養忠心的幹部。教會大學的外文系無明確的培養目標，但畢業生除了失業之外大多數為買辦階級服務，千速記打字工作，一部分畢業生以高等華人自屬，以能在交際場合中談

談莎士比亞狄根斯而感到自滿，也有少數具有較強的寫作能力，帝國主義分子就利用他們寫一些文章向美國報導中國的落後情況。試問他們為祖國的文化事業做了什麼？為勞動人民做了什麼？國立大學從表面上看來似乎有一些學術空氣，實質上也只是為統治階級培養一批資產階級學者而已，畢業生除了少數所謂有門路的以外大多數非失業即改行。今天的英語教學目的有了本質上的改變。我們要培養獨立的外語研究人才，要培養出保衛世界和平的外語幹部。我們學習外語是為了更好地與世界各國進行文化交流，為了向科學進軍，總之，是為了社會主義為了廣大人民的幸福。

從教學工作的計劃性來看：過去與今天也完全不同。解放前雖然也有計劃卻完全是抄襲英美的一套，可以幾十年沒有任何改變。國立學校的計劃往往是由系主任一人憑主觀搞出來的。不像今天每年都要根據需要及同學實際水平舉行全國性的討論會，作出修改以保證培養出合格的人才。過去即使有計劃也無法保證教學質量。因為教師各自為政，愛講什麼就講什麼，進度也不一定完成。孫大雨在解放前教莎士比亞一課時半年只不過把“威尼斯商人”從頭唸了一遍，每次上課必遲到十五分早退幾分鐘，刮風下雨請假，投機失敗也要請假。很多教師在上課時沒有什麼可講就隨便談談在英美時所見所聞，把時間鬼混過去。今天有教研組保證課程的配合與各課的質量，例如英國文學史教學大綱就是集中了全國各校專家的智慧，經過幾周的反復討論才擬定出來的。由於這門課的內容較廣，講授這門課時也根據教師的特長分工進行。這完全體現了今天我們對教學工作的高度負責精神。

關於英語的教學法我們可以從語言和文學二個方面來說

在語言教學方面過去理論與實踐完全脫節，語言語法的理論知識與實際運用語言無關，強調鸚鵡式的模仿，學習中往往得走許多彎路，今天語言的理論知識是用來直接指導實踐的。我們把語言作為一門科學來教，使同學在自覺的基礎上進行模仿，教師隨時注意同學的學習情況，考慮各種方法幫助同學消化鞏固。

在文學方面過去只講講情節傳授為藝術而藝術的資產階級觀點，今天教師們用馬列主義觀點分析作品使同學對作品的時代背景，作品的主題，人物的形象，作家的風格等有全面系統的了解。去年暑假有一批香港大學的學生來上海與我校外語系畢業生開座談會，當他們聽到我校同學深刻地批判了一些文學作品，表示非常欽佩與羨慕。他們說：“我們以前看書只看一個故事，不知文學作品中有這許多寶貴的知識，以後一定要設法學習馬列主義”

解放後教師們不但經常用輔導答疑等方法幫助同學學習並且還運用畢業論文，學年論文，課堂討論等方式培養同學獨立思考能力，過去學生只是被動地記筆記，沒有發表自己意見的機會，畢業論文也大多只是東抄西抄根本談不上什麼獨立思考。過去教師之間相互傾軋是常見之事。右派分子孫大雨在解放後還經常運用他過去的手法，在學生面前打擊其他教師的威信以抬高他自己，今天有了教研組不但能保證教學質量，組織與推動科學研究的力量，並且在教研組的領導下還能使教師們感到教學工作是一個整體必須彼此取長補短，相互幫助，提出問題，進行研究展開善意的批評，以求不斷改進工作。

從教學效果來看。過去固然有些成績特殊優良的學生，

但这完全由于个人努力，不能归功于学校，也有一些人从小生长在英語环境中，因此自然地掌握了語言技巧的一方面，他們付出了極痛心的代价，那就是对祖国語言文化完全無知，但他們所掌握的較熟練的技巧也只不过能为买办階級及帝国主义服务而已。絕大多数完全靠学校培养出来的英語人才，水平低得可憐。畢業論文內容空虛，語法錯誤百出，初进大学时与四年后英語水平相差無几。今天为了教好所有的学生，为祖国培养合格的干部，有教学大綱保証每年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使畢業生具有初步科学研究的能力。畢業生中一般水平比解放前有了提高。这些学生在畢業后都参加了保衛世界和平，团结国际友人，进行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工作。他們在工作崗上繼續受到爱护与培养，业务水平也不断地提高。

我們再从圖書、師資与設備方面来看看解放前后的不同。过去一般人認為滬江与聖約翰是十分重視英語的，但这二个学校的英語圖書大部分是宗教方面的，二校的圖書合起来，在文学研究方面的参考書，还是寥寥無几，殘缺不齐。今天虽然我們向国外訂購圖書有时还有困难，但学校每年有一大笔的圖書經費設法为教师向国外訂購有价值的書籍，并鼓励教师們尽量根据他們在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中的需要开出書單。过去外文系根本没有什么設備可談。但現在我們每年有一定的經費为外文系添置各种語音設備，如播音机和文学語言方面的唱片等，并已訂出計劃准备設置一个語音實驗室帮助同学更好地學習英語。至于師資，过去教会大学里的所謂“英語教授”大部分是傳教士，不懂文学也不懂語言，教学是过一天算一天根本不負責。国立大学師資缺乏常常有唱獨脚戏的現象。今天師資也大大的增加了。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

特長開課，一方面也有時間根據國家的需要與自己的喜愛從事科學研究，培養青年教師，在過去是很少聽到的。過去除極少數的教授因為對個別幾個得意門徒特別感興趣而進行培養之外，老教師大多是不關心青年教師的，因為他們害怕青年教師會青出于藍使他們站不住腳。但今天老教師與青年教師的關係完全不同了。他們把年輕人看作自己的傳代人，系與教研組也作出了培養計劃希望將來青年教師不但能接上自己的班，而且還能超過自己把社會主義的教學事業擔負起來。

根據以上的對比來看，今天的條件，方法，效果以及教師們對教學的熱情都比以往有了十分顯明的提高。為什麼右派分子偏說今後20年還不能恢復解放前的水平呢？到底什麼是外語水平呢？外語水平主要表現在對外語的獨立科學研究能力上。過去在這一方面根本是個空白。因此今天要開設詞彙學，語言史等課還須要幾年的準備，帝國主義不願意我們有獨立研究的能力就好像不願意我們自己搞重工業一樣。其次外語水平表現在對外國文學作品的介紹與翻譯工作上，過去翻譯出來的文學作品數量少質量也差。某些文學名著的翻譯工作比較艱巨，但翻譯時得不到鼓勵，譯後無銷路。今天就大不相同了。國家訂出了長遠的規劃，鼓勵翻譯工作者，有系統地介紹外國文學名著。為了保證質量，譯文也往往要經過幾次的研究及校對。總之，解放前在翻譯上，對文學語言的研究工作上，在字典的編纂工作上，我們都遠遠的落在日本之後，對這種落後的現象也從來無人過問。今天我們擺脫了帝國主義的壓迫，再加上運用了馬列主義的科學方法與蘇聯的先進經驗，外語水平不但能超過解放之前，而且一定

能迅速地赶上日本。那么孙大雨为什么看不见目前已有的显著的成绩和令人兴奋的前景呢？这充分说明他不願意看到成绩而企圖借反教条主义之名来反对党对教学工作的领导。他在政治上想由美帝支持走第三条路綫，在外語教学上当然也希望走半殖民地的老路，讓帝国主义来搞。如果孙大雨認為只有用这种可恥的卖国行为才能恢复英語水平，那末全国人民就会告訴孙大雨我們宁願不学英語也不願亡国亡民。但事实并非像他所想像的那样，我們在向苏联学习不断結合中国实际情况中，虽然走了些弯路，但已摸索出一条道路，有缺点我們將不断發現不断改正，我們并不是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搞得一团糟，相反的有了他所不願意听的肯定的成绩。我們对英語教学的前途很乐观，很有信心，英語一定能很好地为祖国的文化事業为劳动人民服务。英語一定能成为保衛世界和平成为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有效工具。

駁斥右派誣蔑思想改造的謬論

全 增 嘏

所有右派分子总是把好事說成坏事；因为我們所喜欢的就是他們所憎恨的，我們認為好得很的东西他們总認為是“糟得很”的东西。很多右派分子就把思想改造說成“糟得很”。孙大雨說思想改造把思想改“精”了；王恒守說思想改造是“鎮压”知識分子；徐中玉說思想改造中利用学生和助教正像利用貧农斗争地主那样来打击老教师；臭名昭著的六大教授之一的右派分子曾昭掄也說思想改造运动是不合乎知識分子的思想發展規律的。我們必須把这些对思想改造加以誣蔑的右派言論加以駁斥。

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他說：“思想改造运动批判了許多反动思想，初步解决了大多数知識分子为谁服务的問題。”他并且指出：显而易见，沒有这个运动以及其它如土改、肃反、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等运动的胜利，便不能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短短時間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同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与肃反一样，思想改造也为社会主义事業鋪平了道路。沒有这五大运动，就不能保証三大改造的順利进行。因此对思想改造的成績是絕對不能怀疑的。

通过思想改造，我們同三大敌人划清了界綫，和資本主义与資本主义思想也初步划清了界綫，換句話說，分清了劳动与剝削的界綫。很多人都暴露了自己的或檢舉了別人的貪污行为。以复旦大学而論，繳出的贓款就有三亿(旧幣)多。

不但如此，在思想改造的同时还进行了忠诚老实运动，繳出了反动的証件等等。拿复旦來說，自动繳出的武器就有六十一件之多，很多人并把隱瞞的政治或历史問題都老老实实交了出来。通过了思想改造，学校内部的团結也加強了。宗派主义、本位主义、山头主义也初步受到了批判。正因为如此，院系調整这个偉大措施才能实现。教員們的工作态度与劳动态度通过思想改造也有了改进，为以后的教学改革創造了很好的条件。

思想改造主要是改变我們的立場，叫我們走到为人民服务的立場上来。立場的改变主要是靠自己，这当然是要經過一番思想斗争的，而思想斗争是个痛苦的事。但是經過斗争，放下思想包袱以后，就感到轻松愉快了。同时思想改造也得有外力的推动。他人的帮助是不可少的。一方面要有自我批評，另一方面也要別人批評和提意見。我自己深深体会到別人的批評尖銳有好处。因为意見提出得不够尖銳，就不能刺痛自己打中要害，也就不容易促起反省和檢查，使自己有所覺悟，把錯誤的思想扭轉过来。

右派分子对于思想改造的成績一笔抹杀，完全加以否定，难道是他们真正瞎了眼睛看不见上面所說的这些成績么？不是的，他們的眼睛并没有瞎，而是他們看見这些成績根本就不高兴。思想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建設鋪平道路，但右派根本就反对社会主义。他們坚持他們的反动立場，他們要走的不是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資本主义的道路。因此，他們必然会抗拒所有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包括思想改造运动在內。他們是从根本上，从本質上否定了思想改造这个运动，因为他们就不願意改变自己的反动立場。他們

坚决要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甚至帝国主义服务，而不为工人与农民、不为人民、不为社会主义服务。

右派分子常说思想改造太粗暴，言下之意他们只是对于这个运动进行的形式或方式有些不满。这也是他们的一种障眼法。事实上他们不只是从形式上而更主要的是从本质上、从根本上来否定思想改造这个运动。在思想改造中，正如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说，做法或许往往有些“粗糙”，但“粗暴”二字可用不上。譬如，在思想改造时，有些工农干部对知识分子提出意见时往往是很坦率的，但决不能把这种坦率说成是粗暴。这也正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应当向工农学习之处。我们这些人提意见时往往是转弯抹角，吞吞吐吐的，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只有用思想见面的办法最能接触思想，只有用坦率的提意见的办法最能考验我们，使真正愿意改造自己的人也能以同样的坦率的态度来对待提意见者的坦率的态度，把自己的问题无保留地完全摊开出来，进行分析批判，这样才能够收到真正思想改造的效果。

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有的五大运动都起了思想改造的作用。党平时也在关怀我们，教育我们，所以就是不在运动的期间，真正愿意改造自己的人在工作中学习中，也时时刻刻不在党的帮助下进行自我改造的工作，也时时刻刻不深深体会到“教育者本身必须受教育”这句话的深刻的意义。总的说，思想改造运动的成就是肯定的，思想改造必须不断地进行也是肯定的。人民决不容右派分子否定思想改造的成就，污蔑思想改造以及三反、肃反等运动或企图进行倒算。

在我校整風运动开始时，有一位教授向党委書記楊西光同志提出这样一个問題：“將來会不会再来一个思想改造运动，再来整我們一下？”这里是“整”字，意味着是对知識分子的打击报复，这种提法根本上是錯誤的，同时这位教授也沒体会到我們应不断地进行思想改造，不是說經過一次思想改造运动，过了关，就算完事。

拿这次反右派的斗争來說，这对我們每个人都應該起一个思想改造的作用，使我們每个人都能明辨是非，分清敌我，克服小資产階級温情主义，在斗争中提高認識。这次的运动使我們在党的教育之下又一次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大課。从这次运动来看，更加說明了知識分子必須不断地改造自己。

对右派分子來說，这次斗争也是一場思想改造，但首先他們也必須認識这也是一場严重的政治斗争。他們的思想必須改造，这是十分明显的了，但在接受改造之前，他們首先必須徹底交代自己的問題，向人民投降，低头認罪。我們不能允許他們把他們的問題說成只是一个思想問題。他們現在最主要的是首先拿毛主席的六項标准来衡量一下自己的言行，好好地老老实实地交代。这样才能取得人民的寬恕，然后再老老实实的改造自己。

駁斥右派分子對思想改造的謬言

曹 國 卿

我們知道，右派分子對思想改造是很不滿意的，他們認為思想改造是對知識分子的迫害，並否定了思想改造的成績。現在我就對他們關於這方面的謬言加以駁斥。

首先，談談思想改造的必要性。1949年我國革命取得偉大的勝利後，推翻了三大敵人，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接着就有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等運動。這種翻天覆地的客觀事實的變化，不能不影響每個人的思想變化，但思想變化常落在客觀事實的後面，所以必須主動地，積極地改造思想。我們的思想不但要隨客觀情況的變化而變化，而且還要預先看到客觀事實的發展方向，使思想能指導和推進客觀事實的發展。所以思想改造是客觀的必要，不是誰強迫誰的。

毛主席說過：“思想改造，特別是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們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這即是說，要建設社會主義不能沒有知識分子，工人階級如果沒有自己的知識分子，要打算建設強大的工業化的國家是困難的。這種知識分子不是舊的知識分子，因為舊的知識分子大多數均具有資產階級的思想，如自由散漫，自高自大，投機取巧，自私自利，和極端的個人主義等，這種思想品質是不能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是與工人階級的思想完全對立的。工人階級思想是大公無私，有組織性，紀律性，以及互助團結性。只有工人階級的思想品質，才能為建設社會主義服務。

我們知道社会主义須要計劃性，而未經改造的旧知識分子多是自私自利，自由散漫，不服从組織分配，不按計劃办事，怎能為建設社会主义服务呢？所以，旧的知識分子必須經過思想改造，才能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思想改造是思想斗争，也是階級斗争，就是以工人階級的思想克服資產階級的思想。

其次，談談思想改造的成績和效果，我个人的体会，認為成績是很大的，主要的有以下三点：

第一，思想改造后，我們划清了資產階級与無產階級的思想界綫，并知道了要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就必須克服資產階級思想，树立無產階級思想。同时，还解决了為誰服务的問題，知道过去知識分子是為資產階級服务的，現在要為社会主义，即為工人階級服务。

第二，認識了小資產階級的“超政治”，“超階級”的謬論。經過思想改造，我們明白了在階級社会里，任何人均有階級立場，非無產階級的立場，即資產階級的立場，沒有一個人是“超階級”与“超政治”的，通过这种認識，解决了中間路綫問題，不是資產階級就是無產階級，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資本主义，第三條路綫是沒有的。

第三，肅清了崇美反苏的思想。尤其是在教会大学，受美国教育，中毒很深，認為美国一切都好，崇美思想很濃厚，經過思想改造，才了解了美国办学校不是为中国，而是为美国服务。例如过去金陵大学，設英語系，培养学生能說能写就行了，并不研究什么高深文学，考其用意，是在培养买办階級。又如設化学系与植物系配合起来，美国打算种桐树，叫植物系研究桐树生長的情况，同时化学系研究如何榨油，

將这种研究的成果，送往美国国务院，此后美国即有桐树的种植和桐油生产，这是金陵大学为美国服务的实例。經過思想改造对美国的文化侵略的揭露，从而肃清了崇美的思想。

过去許多知識分子認為苏联也是侵略的，是紅色帝国主义。思想改造后知道苏联是無产階級專政，生产資料公有制，不会侵略別人的，而且它具有国际主义精神，对中国革命給了很多的援助。这样才肃清了反苏思想。

在这种思想改造的基础上，以后的院系調整，教学改革与學習苏联經驗，都进行得很順利。在院系調整时，我們都具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組織上叫我們到那里去，就到那里去，毫無顧慮，如果無思想改造，院系調整不会如此順利的。而右派分子抹煞思想改造的成績，是不合事实的。

最后，談談思想改造的方式和方法的問題。思想改造的方針，是与人为善，治病救人，是对事不对人的，所有的旧知識分子，都是要爭取，團結改造的，一般是用很緩和的和風細雨的方式，沒有激烈的斗争，自己暴露思想，別人帮助批評，頂多二次小組会即通过了。除非頑固的反动帝国主义思想，法西斯思想，就要用冰雹式方法加以震动，然后再用和風細雨式的別人帮助，这是必要的，沒有什么不好。

右派分子又說，思想改造沒有照顧知識分子的面子。这个面子是資產階級腐朽的臭面子，这旧面子非撕破不可，否則不能很好地交代思想，建立新面子，所謂“不破不立”，即是这种道理。又有人說，發動学生对老师提意見不好，这也不对。学生是青年，对新事物容易接受和敏感，学生帮助老师除掉毛病，有什么不好呢？这种錯誤的看法，还是出發于愛面子的原故。

由上看来，一九五二年的思想改造运动是必要的，而成绩是肯定的，右派分子对这方面的说法是荒谬的，他们是别有用心。

（附註：这篇东西是根据張銘芳同志的记录修改而成。）

肅反運動不容污蔑

朱伯康

經濟系副教授李清明，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樣，站在同人民相反的立場上，從根本上否定肅反運動。人民認為肅反很必要，他們認為肅反本身就是錯誤。人民因為肅反的結果，得到社會秩序的安定，正氣的抬頭，而歡欣鼓舞，感謝共產黨和人民政府；而右派分子則因為自己階級的本能，在思想感情上總覺得把反革命分子搞得太狠了，或故意歪曲事實，把成績說成缺點或故意誇大缺點，而對於肅反運動，和對於參加肅反運動的人，以及對於領導肅反運動的黨和政府，心懷怨恨。李清明說：“肅反是受了一次地主資產階級教育，是對人身的威脅和人格的侮辱；參加肅反工作的人，是被統治階級利用和分化了”。這些話，完全是反話，是站在同人民相反立場上的話，是發洩了一種相反的階級仇恨。

事實豈是如李清明所說的一樣嗎？完全不是。

肅反運動，特別是1955年的肅反運動，是全國性的在黨領導下的羣眾運動，凡參加過運動的人都覺得受到一次很深刻的社會主義革命教育，鍛鍊了階級立場，擦亮了眼睛，分清了我，劃清了界限，更熱愛新社會，熱愛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工作更有勁頭了。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肅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的五大運動，……顯而易見，如果沒有這些運動的勝利，便不可能在新中國成立不久短短時間內，就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這些運動都是在黨的領導下以羣眾性的鬥爭形

式进行的，因为不采取这种形式，便不可能把广大群众动员起来取得运动的胜利，同时也不能使群众在运动中得到锻炼，提高觉悟，为三大改造，铺平道路。由此可知，对于五大运动无论就其成绩来说，也无论就其进行的形式来说，都是不应该怀疑的。”由此可见，肃清反革命运动，既相当彻底地打击了各种反革命分子，同时也使群众在运动中得到锻炼，提高了觉悟。很明显，在肃反运动中所受的教育，是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是全国人民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下，贯彻人民民主专政的一次阶级教育，是锻炼人民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的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教育。怎么李清明会说成反面，说成是“受了一次地主资产阶级教育，是人身的威胁和人格的侮辱”呢？这只是暴露了李清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情绪。

也许李清明曾说：“在全国范围内是不如像我所说的那样，在复旦经济系的肃反运动中，我所受的教育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教育。”如果李清明说话的意思果真是这样，那好办，因为很具体，就可以进行调查，研究和核对。有具体的事实，是很容易明辩是非的。

复旦经济系1955年的肃反运动，也和全国一样，是从学习胡风反革命文件开始的，同时也阅读了许多有关文件，逐步深入，眼睛逐渐擦亮起来，革命警觉性逐渐提高起来，对于堵塞漏洞的工作，也逐渐认真起来。根据全系同志的揭发，李清明的思想，言论，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工作态度和纪律，都是有严重的问题的，都不是人民的态度和立场，而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而且含有深刻的阶级仇恨。当时就对李清明进行教育，要他检查，要他改正，始终没有下过

結論說他是反革命分子，也沒有把他当作現行反革命分子来处理，只是說他思想上言論上的反革命，影响工作，要他改正，大家的批評都是根据他的言行、階級立場、階級感情、工作态度等具体事实發言的。結果要李清明写成書面的檢討，一式兩份，一份上交，一份留在自己身边，以为朝夕改正自己錯誤，改造自己的备忘录或座右銘。實事具在，記錄和他自己写的書面檢討俱在，不容隨便乱說。为什么李清明不顧事实，說“肃反是受了一次地主資產階級的教育，是对人身的威胁和人格的侮辱”呢？事实正相反，事实指出：根据李清明的無数反动言論和恶劣的行为，李清明是十足的站在地主資產階級的立場，对新社会有深刻的階級仇恨，在学校中不但不好好工作，而且起了破坏作用。对这样具体的人，进行具体的批評，要求他改正，难道不應該嗎？

至于李清明說：“参加肃反工作的人，是被統治階級利用和分化了”，那更是反面的話。誰都知道，旧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十分强大而殘酷的，近百年来多少志士仁人，为爭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的自由幸福都失败了，只有工人階級先鋒隊——中国共产党，領導人民终于推翻了三大大敌人，取得人民民主革命的徹底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同时共产党还領導我們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要建成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凡是爱国的人民，那个不热爱新社会，那个不热爱共产党。正因为热爱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幸福生活，所以对于破坏我們美好生活的反革命分子有無限仇恨。参加肃反工作，是每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自己的权利，也是自己的义务，怎么能說“参加肃反工作的人是被統治階級利用和分化了，

呢？

工人階級對自己人民來說，是領導階級，不是統治階級；對人民外部的敵人來說，是統治階級，就要實行專政。李清明把領導中國人民取得革命的勝利的工人階級和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說成是統治階級，這是什麼話，是站在什麼立場上說的？這不是明顯的站在與人民相反的立場上說話，成了反革命的代言人嗎？

很可惜，李清明在肅反運動中以及在以後的相當長的時間內，沒有誠意的改造自己，以致一誤再誤。希望通過這次反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鬥爭，李清明要誠意地改造自己，一刻也不能放鬆自我的思想改造；更不要自絕於人民。

關於所謂“歷次運動，尤其是肅反運動的合法性”問題

王 式 成

在此次鳴放中，一些右派分子，借口幫助黨整風，發表了各式各樣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謬論。其中之一是根本否定建國以來各項運動的主要成績，提出了所謂“合法性”問題，來攻擊黨和政府所領導的各次運動，特別集中在肅反運動上面。關於一九五五年肅反運動的必要性，成績的有無和大小，人民日報七月十八號的社論，根據事實，作了深刻而透闢的分析。對於一些運動中產生的錯誤和缺點，也做了實事求是的說明。這裡均不再重復。現僅從法律角度來談談各次運動，特別是肅反運動的所謂“合法性”問題。

首先，我們談談什麼是法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對法律的本質，就作了一個科學的說明。所謂法，無非是上升為規範的統治階級的意志。我國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我國的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推翻了舊政權，建立了新國家。人民已真正當家作主，因而我們的法律，必然地反映和體現了人民的意志。人民清楚地知道，我們要打擊的是什麼、保護的是什麼、摧毀的是什麼、建立的是什麼、毫無疑問，我們應打擊敵人，以保護革命勝利的果實。要摧毀舊的生產關係來建立新的生產關係，我們根據這樣的要求而採取的行動和措施，就是人民意志的體現，也就是法律的最根本的依據。這是從馬

列主义关于法的理論，應該得出的必然結論。

其次，从历次运动来看，我們每次都有方針、政策和各項指示。这都是规范性的法律文件。而且在运动过程中，都頒布了具体的条例。例如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等，人民法院不但是“有法可依”，而且是“有法必依”。有的右派分子誣衊法院“無法可依，有法不依”。純粹是捏造的謬言。

現在特別就肃反运动来談談。我們都知道，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切法律效力的根据。無論是1949年具有临时宪法性質的共同綱領，或是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前者的第七条和后者的第19条第一款都明文規定了国家鎮压反革命的任务。惩治反革命条例就是依据宪法的規定而制訂的。鎮压反革命是全国人民的要求，肃反是根据宪法的規定，这是十分合法的運動。稍具常識的人，都不会有疑問。当然，右派分子提出的“合法性”，根本不是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問題。

肃反运动，不但有法可依，而且是由司法机关执行的。从土地改革，鎮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等运动来看，其犯罪分子，从来就是由人民法庭或軍法机关依法处理的。而肃反中所揭發的反革命分子，其逮捕要經過檢察院批准。由檢察人員偵查起訴，由人民法院审理判处。所以从認識程序上看，我們也是“依法办事”的。根本不存在合法性的問題。肃反問題，始終是我国刑法上一个首要的問題。虽然反革命分子已不多了，但还是有的。“有反必肃，有錯必糾”，（包括錯漏）仍然是肃反問題上我們長期的指导方針。

右派分子否定肅反運動的惡毒意圖

薛 應 龍

在这次轟轟烈烈的反右派鬥爭中，我們看到全國各地的右派分子有着許多共同之處，其中極重要的一點就是否定肅反運動，他們不但用各種各樣的謊言來污蔑肅反運動，而且右派集團的大頭子羅隆基還主張成立平反委員會，要為反革命分子撐腰翻案。我們學校里的資產階級右派骨幹分子對肅反運動也採取了同樣的態度，對肅反極盡污蔑之能事。例如楊兆龍說肅反是違反憲法的；孫大雨污蔑肅反是“肅革”、是“反肅”；張孟聞也聲稱肅反是違法的，還說肅反是“人身報復”，是“毛骨悚然”，並且主張成立“平反冤獄委員會”與羅隆基的主張形成南北呼應；還有些右派分子說什麼肅反是“兩代的仇恨”，是對“人類尊嚴的侮辱”等等。

難道我們取得偉大成績的肅反運動真像右派分子們所說的那樣是違反憲法和法律的嗎？不！完全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章總綱第十九條寫得很清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衛人民民主制度，鎮壓一切叛國的和反革命的活動，懲辦一切賣國賊和反革命分子。”對於反革命分子的具体處理則有詳細的法律條文規定。右派分子說肅反違反憲法、違反法律謊言，完全是污蔑。

那麼，肅反是不是像右派分子們所說的那樣是“肅革”，是“人身報復”呢？不！肯定不是。1955年黨和政府號召全國人民要堅決徹底乾淨地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完全是正確的和必要的，這個運動鞏固了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掃清了社

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暗石头，提高了人民的觉悟，取得了偉大的成績。正如人民日报7月18日在肃反問題上駁斥右派的社論中所指出的：‘它清查出大批反革命分子，已經定案的就有八万一千多名；它使反革命分子内部日益趋于分化和瓦解，一年多来有十九万多名反革命分子投案；它使一百三十多万人弄清楚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問題，因而使他們去掉了精神負担，便于积极工作；同时这个运动使广大羣众提高了对隱蔽敌人的警惕性，对以后識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起了很大的作用。右派分子对这些偉大的成績視而不見，反而污蔑肃反說什么是“肃革”，是“人身报复”，真是昧着良心說話。事实上就拿复旦大学來說，他們也未曾沒有看到有十几个反革命分子被依法逮捕，而且就在張孟聞所在的教研組里，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周惠生也被清查逮捕。就拿張孟聞自己來說，当时对他的批判审查也完全是必要和正确的，他自己的檢查也說：“我已經站在人民的邊緣上。幸亏这次运动挽救了我……”。当然我們說肃反运动取得了偉大的成績，并不是說在运动中就一点錯誤也沒有發生。但党是实事求是的，一旦發現在肃反斗争中斗錯了一些好人时，就立刻糾正錯誤，并誠懇地向一切受了伤害的好人公开承認錯誤，賠礼道歉，恢复他們的名譽，貫徹了“有反必肃，有錯必糾”的方針。因此獲得了人民的拥护，同时也基本上取得了許多被斗錯的人的諒解。可是少数右派分子硬要坚持說：“肃反是兩代的仇恨”，不但自己坚决站在反动立場上仇恨党，而且还要影响第二代对党仇視，他們的心腸是多么狠毒！

至于右派分子們污蔑肃反是“毛骨悚然”，是“对人类尊嚴的侮辱”，事实是否如此呢？不！絕對不是。我們知道在

一个羣众性的偉大运动中，由于羣众的激昂情緒，也由于反革命分子的凶惡狡猾面目，个别地方在斗争方式上可能犯些錯誤，如打人罵人等，但党在很短時間內就發現了这些錯誤，并采取措施加以糾正；所以右派分子把肃反描繪成“毛骨悚然”，或污衊是“对人类尊严的侮辱”是完全沒有根据的，党和政府即使对待反革命分子也是根据人道主义的原則的。这种情况与解放前反动派对待革命者的殘暴慘酷来对比，真是天堂地獄，但是右派分子們从来不说反动统治是“毛骨悚然”，是“对人类尊严的侮辱”，可見他們污衊肃反是完全別有用心。

右派分子除了上述这些否定肃反运动的謬論外，还对参加肃反的人加以污衊，丑化和挑撥离間，说什么党员是为了完成任务，积极分子积极整别人是为了入党等等，实际上右派分子們这些謬言的真正目的是反对羣众性运动，因为他们害怕羣众性运动。而党和政府在各项运动中一向就是依靠广大羣众的积极参加的特别是肃反运动，如果不是有广大羣众的积极参加，仅仅依靠国家的公安部門来进行工作，就不可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績。因为从解放以来，通过清匪反霸，土地改革，鎮反等一系列运动后，一些明目張胆，众所共知的反革命分子都已被鎮压或逮捕了。因此剩下的反革命分子也就学得更警觉了，活动得更隐蔽了；他們伪装成各种各样的人，混进我們国家的各級机关、学校、厂矿等等中去潛伏下来，伺机而动，現在我們了解，在肃反以前，那里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那里就有造謠生非，鬧不团结，挑撥离間，甚而至于陰謀破坏，搞得鷄犬不宁。

右派分子这种別有用心挑撥、污衊，是徒勞無益的。

因为党重视群众，积极分子和干部，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得好：“凡是站在革命的、人民的立场上的人，凡是坚决主张肃清反革命的人，决不能给肃反运动泼冷水，决不能给参加肃反运动的群众，积极分子和干部泼冷水。群众，积极分子，干部的革命积极性，这是一切财富中最宝贵的财富。”

右派分子们要在肃反问题上大做文章决不是偶然的，他们不是为了个人受过一些委屈而借机发泄，而是有着极其恶毒的企图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由于他们一贯站在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立场上，因此他们是根本反对肃反运动的。他们借党整风的机会，一方面利用知识分子的温情主义，对肃错了的人抱有同情心，利用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思想改造，肃反运动的不满情绪，提出肃反运动的合法性问题，以图在知识分子中贩卖“肃反运动是违法的”私货，从而根本否定肃反运动。一方面他们极力为反革命分子撑腰，要替反革命分子翻案；他们作反革命分子的代言人的目的是想借以取得政治资本，而尤其恶毒的企图，是想削弱我们国家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从而根本上排斥党的领导，来达到资产阶级的复辟。

如果右派分子的阴谋得逞，资产阶级复辟，反革命分子再骑到我们头上的话，那就意味着将要出现更多的“千人坑”大惨案。陆定一同志在“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的根本分歧”中指出：同右派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右派的主张，就是要我们亡国，就是要我们的人头落地。

右派分子们否定肃反运动，要为反革命分子反案，他们的企图是十分阴险恶毒的，因为站在他们后面的是吸血的魔

鬼，杀人的劊子手。为了保衛我們的革命果实，也为了我們子子孫孫的幸福生活，我們要堅決粉碎右派分子的陰謀，我們堅決不允許反革命分子翻案；相反地，我們還要進一步地把極少數隱藏的反革命分子肅清得更加徹底，更加干淨。

論專政的必要性和肅反的合法性

——駁楊兆龍否定肅反成績、攻击人民民主專政的謬論

楊 峯

右派分子兆楊龍最近提出了令人憤慨、荒謬透頂的論調，說我們國家“許多事情長期沒有法規可以遵循，因而造成某些混亂現象”。“發生一些無根據的控告，和不應該有的錯捕，錯押，錯判的情況。”“使壞人感到無所顧忌，好人感到缺乏保障，因而引起不必要的矛盾。”①楊兆龍并在一次座談會上對肅反運動提出了責難。他挺胸昂首，攢拳怒目，咆哮如雷，氣勢兇兇地責問：解放以來歷次運動的成績到底如何？“希望檢查一下歷次運動的合法性，尤其是肅反運動。”②對人民民主專政和肅反運動進行了惡毒的攻擊。對楊兆龍的這些觀點，我表示堅決的反對，現提出以下幾點看法。

（一）加強專政的必要性

列寧說：“一切革命底根本問題，就是國家政權問題。不認清這個問題，便談不到什麼自覺地參加革命，更說不上領導革命了。”③在國民黨反動派統治時期，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為了求得澈底解放，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了長期、曲折、艱苦的鬥爭，推翻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專政，把政權奪取過來，實現了自己的統治。把原來是少數壓迫者的國

① 見1957年5月9日新聞日報。

② 見1957年6月6日“復旦”第66期。

③ 列寧文選第2卷第23頁。

家政权，变成最大多数人民压迫少数压迫者的人民民主專政的革命政权。但夺取政权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最終目的。取得政权仅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更重要的任务，是要“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来組織社会主义制度，消灭阶级，保证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无国家的社会。”^④

但垂死的阶级是不会甘心于自己的死亡的。消灭阶级和剝削，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这在劳动人民看来是天堂，在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人们看来则是地狱。他们对社会主义存有刻骨的仇恨。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會議上的開幕詞中說：“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們的失敗，他們还要作最后的爭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們也还会以各种方式进行破坏和搗乱，他們將每日每时企圖在中国复辟。”无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掌握政权以后，基于以下原因，必須加强人民民主專政的威力。

第一，“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在台湾蒋介石集团和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曾妄圖在中国人民的胜利还没有巩固下来的时候，实行里应外合，使反动統治复辟。”^⑤以恢复旧政权，旧秩序，重新騎在人民头上为所欲为。

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残余，在台湾、香港、日本、菲律宾等地，搜罗一切亡命之徒，訓練成大批特务間諜分子，積極地向我大陆内地派遭。这些潛入大陆的特务間諜分子，与敌人在内地預为佈置和残余流散的反革命分子，互相結合，进行种种的罪恶破坏活动。破坏铁路、桥樑、工厂、矿山，燒毀倉庫資財，公开搶劫，殘害人民和刺殺干部。

^④斯大林：論列宁主义底几个問題。

^⑤罗瑞卿：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的發言。

在解放之初仅西南一个地区，就有蒋匪帮留下来的特务八万人，土匪数十万人。有若干地方在一个时候，特务猖獗，土匪横行，简直成了反革命的天下。在一九五〇年一年中，西南一个地区，干部和羣众被反革命杀害的就有一万余名。广西一省，人民政府的干部被杀害者有三千余人。在一九五〇年六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同时侵犯我国，威胁着我国安全。当时潜藏在大陆的反革命分子，配合着美帝对中国的进攻，活动更加猖獗、明目张胆地向人民进攻。“所有这些反革命活动，都有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背后策动。这些土匪、特务和间谍，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⑥他们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的内应。

第二，长时间存在着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和富农，以及属于剥削分子和其他分子中，有一些反抗和破坏社会主义革命的分子。

第三，社会上还有一些“盗窃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分子。”^⑦

第四，帝国主义站在我们的面前，经常企图进行颠覆活动和发动侵略战争。

而前述三类分子，又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羣众基础和柱石。国内外情况清楚地告诉劳动人民，在取得政权以后，必须要保持政权，巩固政权，使他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要巩固和发展革命的胜利，建设我们的国家，就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反革命残余势力。

一九四九年七月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教导

^⑥毛主席：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

^⑦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說：“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們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保护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

胜利了的中国人民，不仅要努力保卫和巩固人民革命已获得的利益，还要在生产、国防、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进行建设。党和国家的任务就是要为这些大规模建设事业的进行创设良好条件。但许多条件中，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消灭破坏人民建设事业的反革命分子。因而镇压反革命不是什么一种权宜的措施，乃是我們国家迫不及待的、必须负责完成的根本政治任务。必须“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兇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为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大家很清楚，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论人民民主专政）所以必须加强镇反工作，要抱以除恶务尽的决心，把反革命分子澈底肃清。

（二）肃反运动的合法性

为了有效的打击反革命，我们的国家根据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先进的革命经验，与中国无产阶级切身的革命经验，和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学说，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指示、通令和条例。于1949年9月29日，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七条，对关于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问题，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为了保障土地改

革政策法令的貫徹實施，1950年7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公佈了“人民法庭組織通則”。同年同月23日，政務院與最高人民法院呈經毛主席批准，發佈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聯合指示，對於重要反革命分子的處理，作了原則的指示。1951年2月20日，經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批准公佈了“懲治反革命條例”。對處理反革命罪犯的量刑標準進一步作了較具體的規定。1954年9月20日，又在第一屆全國人大大會通過的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了：“鎮壓一切叛國的反革命的活動，懲辦一切賣國賊和反革命分子。”同年12月20日，經全國人大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過公佈了“逮捕拘留條例”。上述法律、通則和條例中有關鎮壓反革命的規定，近八年來已經成為幹部和羣眾在平時和每次肅反運動中與反革命作鬥爭的有力武器，也成為審判人員處理反革命罪犯的量刑准繩。在懲治反革命分子、維護社會秩序、保護公共財產和人民權利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這些鎮壓反革命的法律根據，是全國人民所家喻戶曉的，而自稱為法律專家的楊兆龍卻指責肅反運動的合法性，除了別有用心以外，還有什麼理由呢！

用運動的形式開展肅反鬥爭，是為我們國家的本質所決定的。我們的國家是真正代表廣大勞動人民利益的國家。“一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從憲法和法律，努力為人民服務”。（憲法第十八條）為了鞏固人民民主制度，確實地保障人民利益，各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貫徹鎮反的政策法令中緊密地依靠了人民羣眾，發動大家起來共同對付反革命。由於有關鎮壓反革命的政策法令，反映着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廣大人民的意志。肅反鬥爭代表了人民

的切身利益，反映了他們的正義要求。他們密切地關心着肅反問題，視此項任務是每個人又不容辭的責任。黨和政府關於肅反的號召，取得了廣大人民的積極支持。羣眾的偉大力量，構成了防止反革命破壞的銅牆鐵壁，使反革命分子陷于極端孤立。近八年來的“肅反鬥爭，無數生動的事實，充分地說明了廣大羣眾的政治覺悟和革命警惕性，是我們戰勝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力量中最可寶貴的力量。”（羅瑞卿同志語）

這是任何剝削者國家，在貫徹自己的刑事法令時所不能也不可能做到的。因為任何反動的統治階級本身就害怕人民，因而也就不要人民。他們的法，本身就是鎮壓被剝削階級的工具。它只能引起勞動人民的堅決反抗，絕不可能取得他們的真正支持。

“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堅決、徹底、干淨、全部地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羅瑞卿同志語）對於人民利益給予確實保障，此是我們國家既定的路綫和方針。在一定時期內，發動羣眾運動開展肅反鬥爭，是貫徹鎮反政策法令的重要方式。這也為我國法律所允許。憲法第四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依靠國家機關和社會力量，通過社會主義工業化 and 社會主義改造，保證逐步消滅剝削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我們的肅反鬥爭就是依靠了國家機關由上而下的正確領導和公安保衛機關的專門工作，與廣大人民羣眾的積極參加防奸反特鬥爭，形成了由下而上的支持相結合來完成的。在國家政策的正確指導下，通過人民羣眾的檢舉鬥爭，對於凡確有實據的反革命，再經由司法機關依法進行偵查起訴、判處，這又有什么不依法辦事呢？而楊兆龍卻大呼“錯捕、錯判，除了根本反對鎮壓反革命外，他又有什么用意呢！”

(三) 肅反成績不容否定

在1950年冬開始，至1952年下半年基本結束的第一次鎮反動運中，給予當時還壓在人民羣眾頭上的土匪、惡霸、特務、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和反動會道門頭子等五個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以毀滅性的打擊。其中對祖國和人民犯有嚴重罪行的首惡分子，受到了嚴厲的懲辦。國民黨和地主的公開武裝土匪二百萬被肅清了。

隨著鎮壓反革命措施的深入貫徹，反革命分子採取了新的活動方式。由有形轉到無形，由公開轉向秘密，由集中轉向分散，由非法轉到合法，由外部轉到內部。我們的公安工作適應了這一新的情況，在轉入經常性的對敵鬥爭中也獲得了很大勝利。僅在1954年內破獲的特務間諜案件即達619起。

在1955年第二次的肅反運動中，從國家機關、人民團體和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內部，清查出來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對純潔革命組織，鞏固人民政權，保衛社會主義事業有很重要的意義。此次運動被清查出來的反革命分子，現在已經定案的就有八萬一千多名（經政府寬大處理不以反革命論處的沒有統計在內）。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竊據了黨和國家的重要部門（如內務部，公安部，省委宣傳部等）的重要職位。1955至1956年清查出來的反革命分子中，現行犯有三千八百餘名之多，其中還有相當數目的重要特務間諜。

由於肅反運動，反革命分子內部日益分化和瓦解。一年多來，全國有十九萬餘名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1956年全國的反革命案件，比1955年減少了42.7%，其他刑事案件下降了52.8%。

兩次的鎮反運動，取得了肅清反革命殘余勢力的決定性勝利，幫助了社會秩序的安定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順利進展。

通過肅反運動，對廣大羣眾進行了更深刻的、提高革命警惕性的教育。使他們學會了識別暗藏反革命的能力。這對在今後一個較長的時間內與隱藏的敵人作鬥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

如果沒有轟轟烈烈的肅反鬥爭，便不可能順利的完成土地改革和經濟恢復工作的任務。便不可能有穩固的後方去對付帝國主義和勝利的進行了抗美援朝。沒有在肅反戰綫上取得的決定性勝利，便不可能順利的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便不可能有穩定的秩序進行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總之，沒有肅反方面的決定性勝利，政權就不可能鞏固，沒有鞏固的政權，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就失去了保障。無論從實際情況的需要，或從理論上法律上來看肅反運動都是絕對正確的。“我們在肅清反革命方面的成功，無疑是我們國家鞏固的重要原因之一。”①

這些鐵一般的事實，就是我們的敵人也好嘆息地承認。只要具有起碼良心的中國人都不會發生懷疑。可是楊兆龍却有另外的看法。他竟捏造和歪曲事實，混淆是非，顛倒黑白地提出問題，企圖抹煞肅反鬥爭的偉大成績，矢口否認肅反運動的合法性。很明顯他是站在了反動階級的立場，以國民黨偽六法的觀點來看肅反問題。實際上是在為反革命分子喊“冤枉”，成為反革命的代言人。“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列寧語）站在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立場來看肅反鬥爭，既合理又合法，是天經地義的好事。站在反動階級立場的人們，如曾任過國民黨反動政府總檢察長要

职的楊兆龙之类的人看来，則是“无法无天”，“混乱不堪”，“暗无天日”。楊兆龙所說的“混乱”只能是敌人内部的混乱，决不会是劳动人民。敌人被打的混乱不堪，直至彻底消灭，对人民來說就是最大的安定，这正是广大人民所希望的秩序。他所說的“好人感到缺乏保障”，恰好是把事情顛倒了过来。在我們国家內只有敌人才不給予保障，“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乱說乱动”。（毛主席語）高度發揮專政威力，坚决的鎮压反革命，使敌人的破坏活动范围縮小到最低限度，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各种权利就是最大的保障。毛主席教导說：“軍隊，警察，法庭等項国家机器，是階級压迫階級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階級，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我們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我們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階級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論人民民主專政）楊兆龙对反革命体贴备至，甚至勇敢地挺身而出为反革命打抱不平，也并不奇怪。此是他的反动的階級立場所决定了的。这就是楊兆龙惡毒地詆毀肃反运动的階級本質。如果他的观点能够成立，就似乎“确实需要”成立一个罗隆基式的“平反委员会”，对已处理的反革命罪犯来个大翻案。这样實質上就等于否定了人民民主專政，对劳动人民來說是不堪設想的。楊兆龙也和其他一些右派分子一样，“想翻过去的案，想否定过去肃反工作的巨大成績，这是完全錯誤的，这是人民羣众所不允許的。”②

本文刊載于一九五七年“法学”第四期，作者对原文在文字上有个別修改，內容上略有补充。

①②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

從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來看 肅反的成績

胡 裕 樹

一

在这次反右派分子斗争的过程中，人們都很清楚地看出右派分子的丑惡面貌和反动本質。这些野心家們喪心病狂地进行陰謀活动，企圖否定党的領導，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妄想倒轉历史的巨輪，恢复人剝削人的社会，重演历史的悲剧。这些野心家們活动的領域是广泛的，散發的謬論也涉及各个方面。而“否定成績”則是他們共同的主要策略之一。解放后短短的八年之中，党領導全国人民，在各个战綫上所取得的輝煌成就，連資本主义国家也不得不感到惊奇和佩服，可是右派分子却給一笔抹煞了。他們特別攻击1955年开始的在机关学校进行的肅反运动，認為这个运动搞得“糟糕透頂”，根本談不到成績。这种歪曲事实的荒謬言論是惡毒的，有加以駁斥的必要。我想就这个問題作簡短的發言。

二

肅反是一个極其偉大的运动。通过了这个运动，加強了我国国防和建設的安全，帮助了社会秩序的安定，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順利进行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保證。毫無疑义，肅

反运动是我們国家巩固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巨大的成績是不可能抹煞的。拿我們中文系来看，由于在肃反运动中清除了反革命分子賈植芳并清洗了他所遗留的恶劣影响，才使我們的系有可能很好地在党的领导下担当起为祖国培养合格的語文干部的任务，才使我們全系同人辛辛苦苦的劳动不致于打了折扣，才使我們系內的团结能够逐步地加强，呈现出一派新兴的气象。

請大家回想一下，肃反前两年复旦中文系是一种什么局面呢？我們的系几乎成为胡風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据点之一。賈植芳，作为胡風反革命集团的一个骨干分子，他利用一切的机会，鑽尽一切空子来进行一系列的反革命的罪恶活动：他利用了大学的講壇，大量散布反动的文艺思想，煽动青年学生的个人主义情緒，培养学生的名利思想以及与社会社会主义集体事業不相容的思想感情。他用最卑鄙的手段把青年学生拖下泥坑，組成反革命小集团来配合胡風大集团猖狂地向党进攻。举例來說，当胡風提出了二十万言的“对文艺問題的意見”这个反动綱領之后，賈植芳就發动了小集团分子，打着“反宗派主义”的旗帜，向我們党的文艺工作领导人周揚同志进攻了。胡風反革命集团分子所指的“宗派”是什么呢？他們把我們的党当作宗派，把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教条，把我們的組織领导当作官僚主义。我們試想一想，这不是要顛复我們的党，夺取我們党的領導权又是什么呢？賈植芳，这个反革命分子，又利用解放日报召开座談会的机会，抬出“反对压制新生力量”的招牌，又一次攻击党和党的领导人，这些罪行都是令人髮指的。另一方面，賈植芳在中文系內也做了不少細致的工作；他挑撥同学与同学之間的关系，打击了

積極分子；他挑撥了同學和教師之間的關係，打擊了若干作風正派的教師；他也挑撥教師與教師之間的關係，拼命製造矛盾，然後利用兩面派的手法進行罪惡活動。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損失，今天想起來還使我們感到十分痛心。

必須指出，賈植芳的反革命活動不是自發地孤立地進行的，而是受胡風的統一指揮，統一部署，作為胡風集團整個活動的一個方面來進行的。在“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胡風給賈植芳的指示中就可以証實這一點。應該說，這些事實，在每個復旦人的心中記憶猶新，可是在這次放鳴之中，居然有人說過“胡風集團是學派不是反革命”這樣極端荒謬的話。我們要問：難道有這樣的學派，長期地有組織地進行政治活動嗎？難道有這樣的學派，派遭嘍囉們打入我們一切機關團體甚至混入黨內偷竊文件，探聽情況嗎？難道有這樣的學派，要磨他們的劍，窺測方面，割下頭顱來擊碎我們黨的領導嗎？難道有這樣的學派，他們的主要成員都是跟國民黨的各种特務機構發生過關係的人物嗎？難道有這樣的學派，要鑽到我們肝臟里來挖我們的心并用橡皮包着鋼絲的鞭子抽打我們的人嗎？依我看，說這種話或者隨聲附和的人，不是別有用心心的右派分子，就是階級本能支配着他使他產生這種敵我不分的想法。除了這兩個可能之外，我們還能夠找到什麼別的解釋嗎？

三

偉大的黨及時地揭露了這個反革命集團，領導全國人民向一切反革命集團進行了一場艱苦的、複雜的鬥爭，教育廣大羣眾擦亮了眼睛，堵塞了漏洞，提高了革命的警惕性，使

我們的國家基本上解決了摧毀反革命勢力的歷史任務，走上了鞏固發展的階段。如果不通過肅反，我們能不能像今天這樣安心地順利地從事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呢？能不能提出并貫徹繁榮文藝和科學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呢？能不能在今天順利地進行反右派鬥爭并取得偉大成績呢？拿我們中文系說，如果沒有通過肅反，沒有清除賈植芳等反革命分子并清洗了他們遺留的壞影響，我們中文系今天是個什麼局面呢？這是用不着解釋我們就可以想得到的。

同志們！肅反的成績是巨大的，它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這些成績絕對不容許抹煞。每一個有良心的人都在歌唱肅反的偉大勝利。然而，右派分子就不是這樣了。他們企圖通過“胡風不是反革命”來否定肅反運動，再通過否定肅反來否定全盤的成績，從而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事業。這是一種惡毒的陰謀，凶狠的策略，是向黨進行的一次猖狂的進攻。這些陰謀當然吓不住在鬥爭中擦亮了眼睛的廣大人民，因此，全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向右派分子進行了堅決的反擊，他們可恥的意圖已經是粉碎了。目前，反右派鬥爭已經取得初步的勝利，但是整個鬥爭並沒有結束，我們必須繼續提高警惕，戰鬥到底。我們決不讓一個右派分子漏網，我們也決不讓任何右派言論不受到批判。我們告訴所有的右派分子，我們的決心是堅強的。右派分子要同我們打三十個回合，我們就同他打三十個回合，要同我們打三百個回合，我們就同他打三百個回合。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宗派主義 官僚主義是舊社會的產物

伍 丹 戈

我對於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認為人民民主專政和黨的領導是產生宗派主義、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根源的謬論，發表一些個人的不成熟的意見。

右派分子是反對社會主義，企圖資本主義復辟的。但是他們也知道社會主義已經深入人心，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已經成為今天中國六億人民的共同願望。因此右派分子不敢從正面來反對社會主義，却妄想從側面來打擊社會主義，因而達到他們否定社會主義的目的。他們的一個最重要的策略就是誣蔑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他們把一切罪過都推在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黨領導的頭上，他們說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都是人民民主專政制度以及共產黨的領導的產物。他們的意圖很明顯，就是借着反三個主義作幌子，來推翻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因為推翻了这个之後，就可以推翻社會主義了。他們這種手法固然很巧妙，可是終究逃不了人民的眼晴。現在他們的陰謀是完全揭穿了。

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是不是由於人民民主專政制度和共產黨領導而產生的呢？換一句話說，是不是由於社會主義制度產生的呢？很明顯，事實完全不是這樣，事實完全是和右派分子的說法相反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不但不是社會主義制度之下產生的，不是在人民民主專政制度之下產生的，而且是和新的社會制度完全不相容的。它們是在階級社會里產生的，它們是舊社會的產物，它

們是剝削制度之下的必然的現象。所以他們說，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是在人民民主專政制度之下的產物，完全是信口雌黃的胡說八道。現在我們看一看事實。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我們都或多或少的有一些舊社會的經驗。我們都知道，這些東西——宗派主義、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在舊社會是最深的。舊社會所有各種單位，無論是企業、機關、學校，到處都布滿着這三個大害，這是人所共知，用不着多說的。

在舊社會里，所有的企業、機關、學校都是當做領導人圖謀自己私人利益的私產來看待的。因此在這些單位里就必然會形成許多圖謀私利的小宗派。一個商店如果有幾個老板，那麼張老板派來的人，就是張派，王老板派來的人就是王派。機關、學校也是這樣。一個學校里各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來歷和自己所依附的靠山而形成各種不同的、互相排擠的小宗派。“宗派”是舊社會里的各種單位的必然現象。至於宗派主義就更不必說了。舊社會里的各種單位既然都是作為領導人追求個人私人利益的工具，他們當然就不會顧到人民的利益和羣眾的利益，他們必然是脫離羣眾，壓制羣眾，並且是自作主張，獨斷獨行的。

這些機構的領導人當然不願、不肯、也不敢接受羣眾的意見。因此在這些機構里，如果不發生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那倒是希奇的事情。如果羣眾在這些機構當權，那麼這些機構的領導人就要垮台。我們不能設想，一個私營企業的老板可以讓職工在他的企業里真正的當家作主，因為這樣一來，他還能剝削職工么？恐怕連他的資本家地位也要被否定了。

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工厂、机关、学校都是属于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所有，并不是领导人的私产。这些事业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事业，而不是为领导人私人利益服务的事业。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的各种机构里，无论用人或行政，都不是单凭领导人个人私意可以决定的。领导人只是体现着党和国家制定的政策并且执行着党和国家交给他们的任务。我想，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学校里所有的员工，同人，恐怕没有一个人是由领导人私人决定使用的，是靠某个校长吃饭的。我们这里决计不会有什么陈派、杨派、苏派或盛派。但是我们经济系里的右派分子却硬说我们经济系里有小宗派，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又是什么呢？在旧社会里衙门的官吏，只要有强硬的靠山，可以任意压制群众，陷害群众，胡作非为，可以使自己成为擅作威福的官僚。试问，这种官僚可以在我们新社会里产生吗？然而，右派分子们却把我们的领导人说成是官僚，这不是别有用心又是什么呢？

虽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在新社会里不能产生宗派和官僚，但这并不是说，旧社会里的旧作风、旧思想就可以在新社会里立刻消灭。因此在我们的社会里还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存在。不过这些东西是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相抵触的，是新社会不能容许的。因此我们的党要整风，要下决心去掉他们。我想，我们也一定能够去掉这些旧社会里骯髒的东西。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愈发展，就愈要排斥这些东西，愈加不能容忍它们。

右派分子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显然只是一个借口，他们只是想要推翻人民的政权，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从而达到他们使旧社会复辟，使--

切旧的腐朽力量（包括官僚宗派等东西在内）重新统治中国的目的。可是他們的这种妄想是完全不能实现的，徒見他們的“不自量力”。

爲什麼說反右派鬥爭是政治戰綫上 和思想戰綫上的一次偉大的社會 主義革命運動？

蔣學模

七月廿八日的人民日報社論說：“反右派鬥爭正在向全國各階層、各地方發展。這是政治戰綫上和思想戰綫上的一次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有些同志對於這個問題的提法覺得還不容易領會。現在我來談談個人對於這個問題的體會，來同大家一起討論。

我覺得，要領會人民日報社論的上述提法，首先要明白反右派鬥爭的目的和反右派鬥爭勝利的標志。

反右派鬥爭的目的，當然是爲了要擊潰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鞏固我國的人民民主專政和民主集中制，保衛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文化制度和社會主義建設，加強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但是，反右派鬥爭的勝利，並不以右派分子的低頭認罪作爲唯一的標志。當然，我們必須充分揭發右派分子的反動活動，徹底擊垮右派分子的反動謬論，使右派分子原形畢露、體無完膚，使他們在事實和真理的面前不得不低頭認罪。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勝利的主要標志，不在於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几的右派分子的低頭認罪，而在於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几的廣大人民羣衆的政治思想覺悟的普遍提高。假如全國廣大人民羣衆的政治思想覺

悟普遍提高了，右派分子的反动活动的本質已为广大人民羣众看穿，他們的反动謬論已不可能在广大的人民羣众中間找到銷售市場，則即使还有少数几个右派分子頑固到底，他們也只能在我們这座牢固万分的社会主义大厦里做几只向隅而泣的可憐虫，休想再能搖撼我們这座社会主义大厦的基础，这样，我們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真正胜利了，我們的社会主义制度才是真正巩固了。

所謂广大人民羣众政治思想觉悟的普遍提高，就是要在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解决“誰战胜誰”的問題。

1955年下半年和1956年上半年，我国出現了一个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胜利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我国的經濟制度，已从多样性的經濟成分轉变为社会主义經濟占到绝对統治地位。这就是說，我們在經濟战綫上打了一个大胜仗，社会主义經濟已經战胜了资本主义經濟，在經濟領域里“誰战胜誰”的問題已經基本上解决了，經濟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經基本上实现了。

在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能不能这样說呢？显然还不能。

在政治战綫上，應該說，我国的人民民主專政是巩固的。証据是：历年来党和政府的每一項重大措施，都获得了广大人民羣众的拥护，党和政府在广大人民羣众中間享有極大的威信。但是，像这样的一些問題，例如：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究竟走得对不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究竟有沒有成績？成績究竟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像这一类的問題，都还没有在人民羣众中展开过广泛的討論。許多人对这些問題

还没有得出異常明确的、肯定的答案。而只要这些問題在羣众的头腦中还没有徹底解决，那就还不能說我国的人民民主專政已完全巩固，就还不能說我們已取得了政治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証据是：在这次鳴放期間，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謬論居然迷惑了許多人，不少高級知識分子被那些右派政治野心家所利用，这难道还不值得引起我們的警惕嗎？

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我們在徹底揭發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陰謀活动、徹底批判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爛調的时候，要广泛地發动羣众来参加揭發和批判，以求通过这次反右派斗争，使得广大的人民羣众、特别是使得那些在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有不同程度搖擺的知識分子，明辨是非，堅定地站到社会主义这一方面来，使他們心悅誠服地相信：我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我們的社会主义建設虽然不可能沒有缺点，但成績畢竟是主要的，社会主义同資本主义比較起来，貨真价实地是优越万倍。我們能够使广大的人民羣众堅定地站到社会主义的立場上来，那就徹底孤立了右派，那就是在政治战綫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偉大胜利。

在思想战綫上，这几年来，我們对于正面宣揚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做了不少，但对于資產階級思想体系的批判却做得不够多。对資產階級思想理論体系的系統的批判，可說是还没有开始。在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深入过程中，我們不仅要取得政治战綫上的胜利，而且也应取得思想战綫上的胜利，对資產階級的經濟、政治、法律、文艺等思想理論体系进行有系統的徹底的批判，使在思想战綫上击潰資本主义，树立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統治地位，在思想領域中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偉大轉變。

當我們在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都达到了“破資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偉大变革的时候，右派分子想使資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陰謀活动就最終地破产了。我們的反右派斗争也就可以說是获得了各条战綫上的全胜。既然反右派斗争的最終目的是要在政治上、思想上解决“誰战胜誰”的問題，因此，把反右派斗争說成是“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的一次偉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完全正确的。

駁斥右派分子楊兆龍對我國立法 事業的詆毀污蔑

張 企 泰

右派分子楊兆龍在右派集團的分工合作上，是向國家立法司法部門開刀的。現在只就他對人民政府立法工作所發表的謬論，扼要駁斥如下：

第一點楊兆龍在新聞日報所發表的一篇文章里說：“……在過去的七、八年中……沒有及時地頒布過一部完整的法典……使許多事情長期沒有法規可以遵循。”又說國家機關做事，“無法可依”或“無完備精確的法可依”，這“已經在人民中間造成了相當的不安以及對政府的懷疑。”首先應當肯定，建國之初，公布了共同綱領，隨後在1954年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因此在解放以後的任何一個時期，我們沒有缺少過國家的根本大法。

其次我要對楊兆龍提出下列事實。

北京政法學院編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資料彙編”，到1956年止，出了第一冊和第二冊的上下兩卷。其中搜集了解放以來到1956年為止一切有關民法的法律、法令、條例、決議、決定、辦法、指示、規章等規範性行為。這些規範性行為關於權利主體的將近60種，關於權利客體的十餘種，關於所有權的將近40種，關於一般的債和合同的三四十種，關於個別合同，如供應、買賣、基本建設承攬、運送等等，計共二百餘種。此外還有很重要的眾所周知的婚姻法。國家機

关公布了这么多的法規，楊兆龙怎末还能說，是“無法可依”呢？又关于結算合同，曾經公布了“国营企業、供銷合作社、国家机关、部队、团体間非現金結算暫行办法”，都凡十章，386条，約計十萬言。这样一种规范性行为，难道还說不上完备精確嗎？

楊兆龙是搞刑法的，那末我們来看看刑事法規。北京政法学院編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參考資料到1956年为止，出了第一輯和第二輯的上下兩卷。其中搜集各种單行法規，將近一百种。此外还有中央負責同志的报告、講話等。三册全長約三千頁，可見其內容的丰富。另外还編了刑法实例彙編一册，也是極重要的參考資料。

又关于訴訟法的，北京政法学院1956年的編纂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判法參考資料彙編，計共五輯。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組織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之外，还搜集了有关法規、指示、通报、解釋等，將近二百种，分別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各成一册。另外还有訴訟实例彙編。

我們有了这么許多民事法規、刑事法規、和民刑訴訟法規，而楊兆龙究竟是何居心，說我們“無法可依”，这不是蓄意詆毀污蔑人民民主政权嗎？

楊兆龙口口声声要法典。法典是屬於同一法律部門許多規范的有系統的綜合。我們有着这么多的單行法規，把它們有系統地組織起来編成法典，說难并不难。不过国家立法机关慎重將事，除了广泛搜集各地实际材料之外，还参考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立法。法典草案初稿既成，又广泛征求意见，一改再改。据我所知，民法的某几部分，初稿已經修改了

五次之多，現在還在繼續努力修訂，這正是充分表示國家立法機關，對重大立法專業的認真負責。

楊兆龍根據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立法情況，責備中央在立法工作上因循拖延。

首先我要駁斥楊兆龍的，是各國發展的情況不一。人家幾年之內頒布了什麼法典，我們沒有亦步亦趨，依樣葫蘆的必要。

其次他強調“社會主義國家間很大程度的共同性和類似性”，又強調要“考慮到兄弟國家的立法經驗”。字里行間，無非要我們根據兄弟國家的立法，東抄西襲，拼湊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典。

楊兆龍又責怪國家沒有“發揮老的法學專家的力量來推動立法工作”。所謂老的法學專家，當然包括楊兆龍本人在內。我們看一看楊兆龍過去做過怎麼樣的立法工作。據說他曾參加國民黨時代的五五憲草的初步起草工作。這一反動的“五五憲草”，就是把世界上最反動憲法的條文，七拼八湊而成。他現在就要推薦這種照抄的辦法。

楊兆龍討厭我們強調中國的特殊性。我想強調一下中國的特殊性沒有什麼壞處。毛主席不早說過嗎：“中國共產主義者……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的適當的統一起來。”我們現在正是在這一思想指導之下，進行立法工作的。

楊兆龍據說是最反對教條主義的。他自詡“本人寫文章，有些創造性”（其實是最要不得的修正主義）。那末為什麼他不容許國家立法機關在立法專業上真正有些創造性呢？他為什麼要譏笑國家立法機關“過分相信自己的創造能力”呢？

他这样做，不是有意和党过不去，有意找党的岔子嗎？

第二点他在同一篇文章里，列述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沿用反动时代旧法的情况。虽然他沒有明目張胆地主張我們也應該沿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旧法，但是从他在指导学年論文时对学生所說“旧法只要加上‘人民’二字即可用”，就可以明白他的真实心意了。沿用旧法是他一貫的主張，在解放初期，他在南京大学的时候，便为了主張沿用旧法和人爭論过。

我想在这里又有必要強調一下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在国民党反动政权还没有被彻底打垮之前，人民民主政权早已建立起来了。并且在革命的各个不同阶段，公布了一些重要法规。这是和兄弟国家的革命过程，完全不同的一点。随后革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如果反而把人民民主政权原有的法规廢止，而沿用国民党旧法，那才真正豈有此理。老解放区公布的法规，虽不够用，但可以修正、补充、發展，至少它的立法原則是完全正确的，它对人民民主政权和新的經濟基础，可以起巩固和發展的作用。至于国民党的旧法根本是旧經濟基础的上層建筑，是为反动統治階級服务的。楊兆龙在解放前曾經用过旧法鎮压人民。現仍一貫主張沿用旧法，并且說只要加上“人民”二字即可用，他不是明明想在“人民”兩字的掩护之下，来从事资本主义复辟的勾当嗎？

就拿兄弟国家沿用旧法的情况來說，被沿用的旧法中的规范，已經脫胎換骨，具有完全新的階級內容。实际上这等于一次新的立法。我們現在重起爐灶，重新立法，不利用旧法中的规范，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但是楊兆龙始終認為兄弟国家沿用旧法的事例可取，也要我們这样做，这可使他偷

天換日，散布資產階級學說的毒素和復辟資本主義，得到莫大的便利。

第三點，僅僅因為重要法典尚未頒布，他就得出這樣的結論，說“無論在刑事或在民事方面，都難免使壞人感到無所顧忌，好人感到缺乏保障”。把這句話的皮剝開，就可揭露出他的真心話，就是說，我國沒有法制。

讓我們正視事實。壞人現在是否的確感到無所顧忌了呢？拿最壞的壞人反革命份子來說，剛相反。毛主席說“還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反革命分子之所以不多了，首要的原因正是過去幾年來進行了鎮反運動和肅反運動。但是楊兆龍還喊着要檢查歷次運動尤其肅反運動的合法性呢！再拿其他的壞人來說，流氓幾乎絕跡，盜竊詐騙、殺人放火等犯罪行為，日益減少。1956年刑事案件下降的情況更為顯著（張鼎丞同志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的報告）。今日的情形，正可以說是道不拾遺夜不閉戶。可是楊兆龍終究根據那一點說“壞人感到無所顧忌，好人感到缺乏保障”呢？這兩句話描述反動統治時代的情形，倒是滿對頭的。當時楊兆龍是反動統治集團的一份子，尤其是推行法治負極大責任的大官。從舊社會過來的人，那個不曉得在國民黨時代，罪大惡極的壞人，有財有勢，都可逍遙法外。刑事案件層出不窮，貪污風氣尤盛。儘管國民黨的六法很完備”（引楊兆龍的話），好人那里有絲毫的法律保障。解放前的事實，有目共睹。憑良心說話，反動時代的法治（或法制），怎能和今天的法制相比。而楊兆龍硬要顛倒是非，說現在沒有法治，這不說明他堅決站在反動立場，敵視人民民主專政嗎？

我們七年的建設，超過以往百年的成就。1956年的經濟

發展，我國的成就占全世界第一位，這一點連聯合國組織也不得不承認。假使國家各部門的生產活動，不得到立法部門和司法機構的有效配合，假使我們的社會，果真像楊兆龍所說的“壞人無所顧忌，好人缺乏保障”，在短短的七年中我們能做出這麼許多好事來嗎？

楊兆龍應當相信，他在各方面的反社會主義，反黨反人民的言行，瞞不過羣眾雪亮的眼睛。逞狡辯，耍花招，這對於他本身是絕對不利的。今天應當好好的作一番深刻的檢查，老老實實的作出交代，向真理投降，向人民請罪。

駁斥王造時的“美國民主是虛偽的， 但法治是認真的”謬論

丘日慶

右派分子王造時5月21日在新聞口報召开的座談會上作了“進一步建立民主法治秩序”的發言；5月25日在上海市政协作了“進一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秩序”的發言，向我們人民民主法制開刀，說我們的憲法“頒布以後好像逐漸被人漠視”，我們“還有不少人治主义的封建殘余”，對於我們的“社会主义法治基本上是不滿意的”。因此他極其荒謬地說：“美國民主是虛偽的，但法治是認真的，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要我們向美國“法制”看齐。作為法律工作者的我，想在这里駁斥王造時這點極其荒唐的謬論。

一、我們認為民主和法制有着辯證的關係。我們認為一個國家的民主如果是虛偽的，它的法制也是虛偽的，因為法制是為政治服務的，它是階級專政的方法之一，而抽象的法制是沒有的。法制的虛偽或者真實取決於民主本身。王造時說“美國民主是虛偽的，法治是認真的”，這完全是形而上學地把民主和法制割裂開來看的想法。因而王造時甚至認為法西斯國家也有法制。他說：“講法治不一定講民主，因為以前德意志的法西斯統治也有一套法律”，這豈不是說德國在希特勒統治期間也有法制，國民黨反動派也有法制嗎？殊不知法制有一個最基本的條件，這就是一個國家制定的法律不能違反該國憲法。希特勒登台以後（當然他本身的登台首先

已是違反当时的章瑪宪法)，他所頒布的法律，無論从形式和內容上看，都是違背上述宪法的。甚至1946年国际軍事法庭审判德国首要战犯判決書也不得不承認，希特勒向德国国会提出的“授权法”是采取血腥強制的非法手段而通过的，他所取得的立法权力，是“違背宪法規定的权力的”。这样，我們难道不能說希特勒德国也有法制嗎？

至于伪国民党的宪法，則是強奸民意的非法宪法，为任何中国人民所不承認的，而其所有法律則是鎮压人民、奴役人民的工具，在这种情形之下，絕不能說国民党也有法制。

二、我們認為縱使美国是在資本主义上升时期，它的法制也是虛偽的、狹窄的、殘缺不全的。例如1791年批准的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說：“人民……非依照法律的正当手續不得剝夺其生命、自由或財產。”但以上規定，对于黑人就不适用。当时的奴隶主对于黑人奴隶操了生杀予夺之权，將黑人处死，并不算犯罪。直至1865年美国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才規定廢止奴隶制度，但之后对于黑人还可施行体刑。如密士失比州的法律規定，凡未滿十八岁的黑人，必須交給白人以“从事自由生活的准备”，在此期間，該白人不但有权使用他的劳动力，而且对他有权施行体刑。更慘無人道的是，美国宪法虽有以上規定，即非依照法律的正当手續不得剝夺人民生命、自由等等。联邦刑法和各州刑法也規定杀人的要抵罪。可是美国直至今天，对于“不滿意”的黑人，白人暴徒伙同將其私刑处死，不算犯罪，在法律上毫無責任可言。美国国会中某些比較有良心的議員，曾希望通过“反暴徒私刑杀人法”，以禁止上述慘無人道的罪行，但数十年来，都無法通过。

又如1868年的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4条虽然规定，对于任何人均应享受法律上的同等保护。然而富人和贫民在法律上就不平等。“治安法官是这样，警察也是这样。资产者无论做什么，警察对他总是客客气气，并且严格地依法办事，但是对无产者，却粗暴而又残酷。”以上的話，虽是恩格斯于1845年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用以描绘英国富人与贫民在法律上不平等的情况，但对美国说来，也同样是如此的。最近美国有一位名叫柯柏遜的律师在美国众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上說：穷苦人家的孩子若是犯了罪就被記載在法院的记录里，而富人的孩子犯了罪，在很多的情况之下，都免受追究。这是由于富人有机会將罪名穩瞒过去。他最后又說：“我非常不願意說，我們美国有兩套法律。但我們都知道，的的确确是有兩套的。”

此外，美国宪法上规定的“法律上同等保护的原则”的虛伪性，还赤裸裸的表现在有关黑白种人之间的立法上。在美国有30多州的法律认为黑白种人間的結婚是非法的，有的州甚至要办罪。对于黑种人的选举权利的取得則规定要有較白人更为严格的条件。他們的法律禁止黑白种人同在公立学校念書，火車上黑白种人不得混坐，不一而足。然而美国最高法院却說以上法律，并不違背“法律上同等保护的原则”。这种自欺欺人之談，更充分地說明了美国资产阶级法制的虛伪。

三、我們认为今天美国资产阶级的法制，已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美国资产阶级法制已經不是“認真不認真”的問題，而是破坏到什么程度的問題。美国現在已走向警察国家和法西斯專政的道路，警察制度和行政專橫已几乎完全代替了美

國資產階級法制。原來到了帝國主義時代，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資產階級法制，對於美國統治集團已經起着不利的作用，已經成為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維持其血腥統治的“絆腳石”了。這是由於美國共產黨和其他進步人士，曾經利用美國憲法上所規定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殘余和虛偽的法制，反對過美國妄圖稱霸全世界的戰爭政策和加強國內的反動政策，起了不少的作用。因此，美國資產階級法制不但不能再利用來維持它的統治，而且對它日益不利，所以它不得不拋棄舊日本來已是虛偽、狹窄、可憐有限的法制，而企圖以行政專橫和警察制度作為它統治的唯一法寶。它特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更多地通過了一系列違背美國憲法的法律。這就將美國法制破壞無遺，將美國公民的基本權利剝奪殆盡。這些違憲法案就是眾所周知的1947年8月的塔夫脫——哈特萊法，1950年9月的麥卡倫法，1954年8月的“共產黨管制法”，此外，它並利用原來作為對付納粹、法西斯分子而在1940年通過的史密斯法將美國共產黨的十一位領袖，包括總書記丹尼斯，及其他許多進步人士以莫須有的罪名投入監獄。對於這個違憲的措施（判決），1949年英國作家蕭伯納曾以“十二使徒的受害”（按美國共產黨主席福斯特因病未被傳訊，但已被控告）為題，寫了一篇文章抗議“密蘇里雜貨商”（即杜魯門）：說他繼承了古羅馬暴君的罪行。

但是美國反動統治集團，對於用以鎮壓勞動人民的上述違憲法律並不感到滿足，就此為止。他們一心一意的要企圖將美國共產黨完全打入地下而後“快”。1957年7月美國眾議院議員艾倫·史密斯提出一項議案，對於自願參加共產黨或繼續留在共產黨內的人，要處以高至一萬美元的罰款或十年

徒刑，就是很好的例証。

除了上面一系列的違宪法律外，美国特务組織，特别是三K党，公开暴行，更是罄竹难書。美国政府又以“不忠誠”，“安全上的危險分子”为名：随时將机关工作人員和学校教員开除解雇，造成無法無天的恐怖世界。

从上面看来，美国資產階級法制还有什么認真可言呢！但右派分子王造时却說美国法治是認真的，要我們向它學習，这就是想从思想上企圖蒙蔽我們，要我們走資產階級法制的道路，妄圖資產階級專政的复辟。

四、最后我們在这里特別还要指出的是，只有我們人民民主法制才是認真严肃的，而且具有無比的优越性，这是由于我們的真正民主制度所决定，我們的經濟制度所决定。这里我們只要举出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錯必糾”的肃反原則，就可概見其余了。它体现了我們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法制的認真严肃。“有反必肃”反映了我們严格遵守宪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衛人民民主制度，鎮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懲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的規定。“有錯必糾”反映了我們严格遵守宪法关于国家机关“保障公民权利”的規定。

此外我們的法律，为了使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員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保障公民权利，及改进工作上的缺点等等，还規定了远远超过資本主义国家的最周密的监督，以保証法制的遵行。这些监督就是各級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人民檢察院的監察，国家监察机关的监督，国家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人民羣众的监督等等。

張鼎丞檢察長在1957年7月第一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四次會議上，并對我們社會主義法制，在實踐中指出它的偉大成就和無比的優越性。他說：“在黨和國家的領導下，司法各部門之間分工負責，互相制約的制度已經建立起來了，司法幹部遵守革命法制依法辦事的作風加強了。我國的社會主義法制不僅在革命實踐中起了鞏固專政和保護人民民主的巨大作用，而且從實踐中證明了它較之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制具有無比的優越性。”對於以上成就我們表示非常滿意和歡欣鼓舞，右派分子王造時卻說，對於“我們社會主義法制基本上是不滿意的”，我們除了說他是“項莊舞劍，志在沛公”之外，還能有什麼其他的解釋呢？

右派分子王造時楊兆龍誣蔑 人民法治

向哲浚

右派分子王造時、楊兆龍兩人都是自命不凡、以杰出的法學家自居。在這次黨的整風鳴放中，在法治問題上分工合作，向党領導下的人民司法工作猖狂進攻，極盡詆毀誣蔑之能事。

把他們一切歪曲事實、夸大缺點和富有煽動性的言論加以分析，可以得出兩個結論。第一個結論是否定新中國法治方面的偉大成績；第二個結論是要使資本主義法治在新中國復辟。

在否定法治成績方面，這兩個右派分子的做法是這樣的：他們忽視建國以來一系列的法律如憲法、法院組織法、選舉法、婚姻法、懲治反革命條例以及許許多多其他關於內政、外交的法律先後公布的事實，他們漠視在司法工作上有種種政策、方針、決議和指示做辦事的准繩的事實。僅因許多重要法典如刑法、民法等尙付闕如，他們就硬說我國司法工作是處於“無法可依”的狀態中，這是極盡誣蔑能事的說法。

王造時說我國向來“重人治、輕法治”，又說我國的民主集中“有集中而不够民主”。楊兆龍常常找到一個似是而非的缺點加以夸大，例如把一個在火葬場做領導干部的舊司法人員說成是做雜務的，把偶然事例說成一般現象，例如說法科畢業生在法院“以書記員定終身”。把這類似是而非或絕無僅

有的事例加以夸大，加以宣揚，对党进攻，使羣众得到一个錯誤的印象，以为新中国沒有法律，沒有法治，是一团糟的。

王造时違反党中央的明白規定，主張整風一开始就要把鳴放放到基層去，从基層放火，使天下大乱。楊兆龙不断在青年老年教师之間、在新老法学人員之間、在工农出身和大学出身的司法干部之間挑撥离間，并用語言文字来丑化司法干部和誣蔑担负着鎮压敌人、保护人民、巩固人民民主專政、保障社会主义建設秩序的严重的任务的司法机关，这一切說明他們的目的是陰險的，是惡毒的。

他們这样做很显然是要在新中国建立他們的所謂“法治”，那就是最反动的美国式的“法治”。他們兩人都是美国崇拜者，王造时说“美国的民主是虛伪的，但法治是認真的”。楊兆龙多少年来一貫替美国法治宣傳，他追隨他的美国老师、实用法学家龐德。解放后楊兆龙做的文章都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来批評社会主义法治，他用“法律超階級”的荒謬論点来否定法律的階級性，来攻击社会主义的法治。

王造时、楊兆龙对于人民民主專政制度也是痛心疾首的，他們都認为我国有專政而無民主，他們一心向往的民主是什么呢？他們所謂“民主”很显然就是华尔街少数壟断資本家用来剝削劳动人民和迫害黑人以及进步人士的“民主”。他們显然是要使資本主义司法在新中国复辟。

他們对肃反运动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也一概漠視。楊兆龙提出“肃反合法性”問題，这就說明他們不贊成对人民的敌人專政，也就証明他們对于人民民主專政制度是深惡痛絕的。总而言之，他們对人民法治的誣蔑是他們反党、

反社会主义的陰謀計劃的一部分，在六亿人民的面前，他們的罪行已無法掩飾，他們应当徹底承認錯誤，革面洗心，向人民請罪。

從法律的階級性的角度來看右派分子楊兆龍向黨進攻的陰謀

張滙文講

1. 在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黨和社會主義猖狂進攻的戰綫上，復旦大學法律系教授楊兆龍可說是一員大將，他所擔當的任務是從法律方面向黨進攻，向人民的法制開刀，向社會主義的法律思想挑戰。

2. 我們都曉得，法律是階級統治的主要工具，它體現着統治階級的意志，它的主要任務就是鞏固和保護統治階級的政權，貫徹其政策，維護鞏固和發展對其階級統治有利的社會關係和秩序。因此，在一切上層建築當中，法律所具有的階級性是最為強烈。由於法律具有強烈的階級性，而它最關切着統治階級的利益，因此在階級鬥爭的戰場上，它的作用也就特別重大，特別突出。

3. 我們的階級敵人對於這一點看得是非常清楚的。他們對於法律和階級的關係，以及法律在階級鬥爭中的重大作用，從來就沒有忽視過。在他們內心裡，雖然都明白法律是直接體現政治，體現階級鬥爭，階級性特別強，但是，在戰略上和策略上，他們卻不公開承認，而用種種方法，種種飾詞去掩蓋法律的階級性。換句話說，他們的策略就是用否認法律的階級性為手段以達到其利用法律為其本階級而服務的目的。剝削階級為着要實現其階級統治和專政的目的，故意的製造出種種虛偽的說法，把法律說成是“超階級的”，說成是

“全民意志的表現”，以掩蔽法律的階級性，以便欺騙被他們統治着的勞動大眾，以圖削減他們的反抗情緒和鬥爭意志。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中，他們所採取的策略是一樣，也就是以否定法律的階級性為手段，以求達到他們瓦解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的目的。

● 因為，在他們看來，假使法律的階級性在理論上被攻破，如果“超階級”的理論能夠被大多數的人所接收，則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和共產黨的領導也都要失去憑借，人們的鬥爭意志也就自然而然的會削弱下來，那樣，資產階級復辟的機會也就必然的要大起來。這種“釜底抽薪”的策略實在可說是陰險極啦！

4. 很顯然，右派分子在這次向黨和社會主義進攻中，所採取的策略，也是沿着這一個總的路線進行的，楊兆龍在向我們的人民法制開刀所砍出來的第一刀，就是對着“法律的階級性”砍上來的。他在去年十二月間在華東政法學報第三期上曾經發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法律的階級性和繼承性”在那篇文章里，他主張法律有繼承性，為着要支持這一主張，他費了文章大半的篇幅把法律的階級性加以曲解，從表面上看來，他好象是在闡述法律的階級性，但實質上則是把法律的階級性給根本否定了。

他首先把法律規範本身根據其表面的性質分成四大類即他所謂(1)正義的，(2)不正義的，(3)有反抗性的，(4)不一定表現出具體的階級性的四大類。他認為，在這四類當中只有第一類，它的階級性表現得比較具體，其餘的三類，階級性的表現，則是有條件的，不具體的，甚而反映着不同階級的意志的。他一再說“法律也有反映不同階級的立場的”，有

的“却反映着被統治階級的階級性”。

在另一方面，他又把法律分为主导性的法律规范，和輔佐性的规范两种，他认为，“主导性规范的階級性是和当时統治階級的具体階級性一致的”这种规范往往只能用于某一特定階級社会；而輔佐性规范則往往可以用于各种不同性質的階級社会。

根据他的論点，很自然地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結論：

- (1) 法律的階級性是不統一的，它可以反映着不同階級的意志和立場；
- (2) 既然如此，則在新法与旧法之間，在剝削階級的法和無产階級的法之間，就沒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那末旧法就很可能移用到新社会里来了。

同志們！讓我們問一問，楊兆龙發出这种論調，其用心是在那里呢？难道楊兆龙是真正不懂得法律是統治階級的意志表現么？难道他真不懂得法律是階級專政的工具么？我看，他不是不懂，而是太懂了。由于他太懂得這道理，太懂得法律在階級斗争中的重要性，从而就認識到在新中国，在無产階級專政的制度之下，強調法律的階級性，对于他和他所代表的階級都是不利的。

大家都知道，右派分子有一个共同之点，那就是，他們对于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制度都表示極端的仇視，他們之所以仇視，簡單說，就是由于人民民主專政是無产階級專政的一种具体形式、这种專政的形式，則是与法律的階級性分不开的。同时，他們認識到这样一种形式的政权又是民主基础最广，統治力量最强的一种政权，而这样一种最民主和最強的政权，对于階級敌人和一切反动分子实行專政和鎮压是最严

格，最澈底和最有效的。一切階級敵人和反動分子對於這樣一種政權當然要害怕，當然要痛恨。但是，在強大的人民民主政權之前，楊兆龍同其他右派分子一樣，却不敢向人民民主專政制度正面地展開攻擊，他不得不採取釜底抽薪和側面進攻的策略。前面已經講過，從理論方面否定法律的階級性，是他企圖釜底抽薪的陰謀，在這之外，他又從側面放出了三枝毒箭。(1) 這三枝毒箭的第一支是在本校黨委召開的教授座談會上放出的，他對於历次的偉大運動特別是肅反運動的“合法性”提出了質問。(2) 第二枝毒箭是他在新聞日報發表的“我國主要法典何以遲遲還未頒布”文章中放出的，他說：“至於法治，那就是對於階級敵人，也是不應該有例外的”。(3) 第三枝毒箭也是他在本校黨委召開的教授座談會上放出的，他對於馬列主義關於法律的定義即“法律為階級鎮壓的工具”的定義提出了疑問。他說：現在階級關係變化了，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了，這個定義須要重新加以考慮才是。

這三點，都不值得一駁的。關於前兩點，他的意思等於是說，我們用法律去鎮壓階級敵人是應該的，在他看來，不但不應該，而且是不合法的。進一步，他主張我們還要用法律去保障敵人的“合法權利”，這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難道反革命分子的活動還有“合法”的一面么？如果說不予反革命分子以法律保障，就是不合法，那末，我們整個的革命事業，豈非也都是不合法么？何況，就是退一萬步從法律的观点來看，我們的肅反，是有充分法律根據的，在总的方面，我們有憲法為根據，就個別的法律條例來說，我們除了有極完備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等單行法之外，我們更有懲治反革命的條例和勞動改造條例等等。是的，這一切都是不合乎蔣

介石的法。至于他說階級关系变化了，法律的定义應該重新审訂，那更是胡說八道，別有用心。事实上，階級斗爭是否完全結束了呢？如果是結束了的話，那怎么会有今天的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呢？当然右派分子为着要向党进攻而希望把法律定义改一改，这也是很可以理解的。在这里，我們也可以看出，楊兆龙尽管不承認法律的階級性，他虽然否認法律是階級斗爭的工具，但他却站在反人民的立場，处处想利用法律来作他向人民政权和人民法制进攻的武器。

5. 总的來說，“釜底抽薪”也罷，放毒箭也罷，一切都是楊兆龙的“如意算盤”是枉費心机的。人民偉大和堅強的政权是不会受到絲毫損伤的。

相反的，这一切却把右派分子楊兆龙的毒辣野心，陰謀詭計在六亿人民面前赤裸裸地都暴露出来了。不但如此，这一切都充分說明了楊兆龙的反动本質。使我們又联想到楊兆龙的醜惡历史，和数十年来反党反人民的种种罪行。

回想二十年前，他就用法西斯的法律理論和制度向蔣介石的反动政府納計獻策；二十年前，他就为反动的国民党鼓吹党化司法。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二十年前，他主張国民党实行“党化司法”，以维护反动統治者的利益，而今天他却反对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对司法工作的領導。这說明，楊兆龙的法西斯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他的反动立場是数十年如一日坚定不移的。这也就說明了他尽管在文章里不承認法律的階級性，可是他自己却是一个階級性最強烈的人，反动性最強烈的人。

最后，讓我們不要忘記，右派分子在这次向党和社会主义

又猖狂进攻中，他們的一个主要陰謀，就是企圖从学术思想方面，在科学領域方面，进行其隱蔽埋伏的襲击，他們企圖以資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学术观点来歪曲和代替馬列主义对科学發展的思想指导。楊兆龙的荒謬言論和他的陰謀，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具体的例証。

我們在学术科学崗位上工作的人，在这方面應該特別提高警惕，堅守我們的崗位，对右派分子必須予以迎头痛击，粉碎他們的陰險鬼計。

以保衛我們的馬列主义；保衛馬列主义的科学！

再駁王造時所提倡的歐美式的 民主與法治

楊 羣 祚

為了要駁斥王造時一向所標榜的歐美式的民主與法治，我們首先來談談像美國這樣的一個國家，到底有沒有真正的民主，是不是能夠貫徹法治精神。

美國的政府是資產階級專政的，是保護資產階級利益的。資產階級在美國的全國人民中，和其他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樣，人數是很少的。他們的政府為了要保護這些少數人的利益，必然會不擇手段來壓迫和剝削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王造時認為美國沒有經濟民主，却有高度的政治民主，把美國的政治和經濟分開來看問題，而不從美國的統治者所代表的階級利益和美國政府的反動本質方面來看問題，因此我們可以說王造時的反動立場是非常堅定的。他很讚美歐美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的制度，認為這是最高度的民主與法治精神的表現。其實英美的立法司法行政都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表面上是三權分立，實際上是三位一體。所以要這樣分一分，無非是混淆視聽，迷惑人民。王造時對美國的情況自認為很了解，而從來沒有看見他發表過文章報道一些美國國內種族歧視的事實。如果他是真進步的，自然會很有力地來批判這些事實，從而揭穿美國的所謂民主。

美國的不民主和沒有法治精神，我們看見得很多，而王造時却視若無睹。譬如在美國男女實際上很不平等，有許多

工作女子明明可以胜任的，就不許她們去担任；同一性質的工作，男女的工資相差很大；其他在政治上的待遇，也很不平等。美国政府近几年来对社会上进步人士以及共产党员变本加厉的迫害，并且用錢收买一切动摇分子，以助長其反动声势，巩固其资产阶级的專政。同时国内真正进步的言論是不受欢迎的；結社集会也沒有自由，这些都說明美帝国主义越来越不民主，越来越暴露其阶级反动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社会秩序每况愈下，犯罪案件的增加，尤其是在大都市里每年兇杀案件的增加，真是大得惊人。美国的军队的紀律也是坏到極点。在美国的佔領区内，美国兵到处胡作非为，杀人擄掠。一个民主的和有法治精神的国家訓練出来的军队，不可能这样地無法無天。

最后，艾森豪威尔所奉行的战争政策，妄想以原子威力来征服全世界，是美国人民所坚决反对的。国家的一个主要政策，不是由人民来决定而是由一小撮代表壟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客决定的，当然是違反民主，絕對不能代表人民的意志。

我們的国家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一切的政策完全根据宪法，是为了工人阶级和全民的利益。政策的决定代表了人民的总的意志，因此我們的民主才是真正的，徹底的。

我們的党是领导国家领导人民的党。在党执行一切政策的时候，体现着党的已飢已溺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党员如犯了严重的錯誤，不論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都要受到处分。在苏共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我們批判了“強調个人因素”和“对个人的崇拜”，加强了党的领导。因此我們的

党是大公無私最重法治的党。

我們的政府在七年以来所以能够有这样偉大的成就，主要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發揮民主的力量。在資本主义国家里面，絕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期内有这样偉大的成就。資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既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自然也就不能發揮人民的積極性和当家作主的精神。

我們的军队，不論是那一位軍官帶領的，都是世界上最优良，紀律最严明的军队。这几年来，人民普遍对于解放军的敬爱与解放军的爱护人民这两方面可以看出我們军队的品質。如果与美国军队比較一下，那一个是爱护人民的？那一个是危害人民的？那一个是真能貫徹法治精神的？不言可喻了。

以上所述的这些事实，王造时是不会不知道的。可是他又为什么颠倒是非，拚命地在标榜欧美式的民主呢？他为什么認為我国沒有法治而只有人治呢？这是因为他坚持反动立場，一貫地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人民。上次本校工会召开斗争右派分子的时候，王造时的檢討是很不老实的。他在答复我們提出的質問时，避重就輕，东拉西扯，引起了与会者極度的不滿与憤慨。这是我第一次听他發言，深深感觉到他是个老奸巨滑的政客，十足的右派分子，我殷切希望他这次能够幡然悔改。徹底地，坚决地，干淨地交代自己过去的反动言行。只有这样，才是他真的向人民低头認罪，才是他唯一的出路。

斥右派分子在法治問題上的謬論

陳華庚

这次右派分子在对党的猖狂进攻中，也提出了新中国的法治問題。他們要問解放以来历次运动的合法性，尤其是肃反运动，并且还狂妄地說：“美国的法治是認真的，中国向来重人治輕法治”，似乎現在我們是該向美帝学习似的。我对法学是門外汉，但是我要以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看法来駁斥右派分子在法治問題上的謬論。很坦白地說，过去我对这个問題亦有些不正确的想法。我亦曾無知地站在反动階級的立場看問題，因此就不能了解人民法治是絕不同于資产階級的法治。这一点亦是我在反右斗争的学习中所获得的一个教訓。关于法学理論上的專題，我們已見到法学專家在这方面駁斥右派的文章（如“斥楊兆龙抹煞法律的階級性的陰謀”，見解放日报8月2日第六版；复旦校刊上亦曾發表过一些文章）。我要談的是中国新旧社会中的法治情况，以及美国的法治。

右派分子楊兆龙說在我們国家里，“許多事情長期沒有法規可以遵循，因而造成某些混乱現象……使坏人感到無所顧忌，好人感到缺乏保障……”。他用这种話来描写我們新社会，真是混淆是非荒謬透頂。其实他所說的“坏人感到無所顧忌，好人感到缺乏保障”，真是他当国民党反动政权最高法院总檢察長时代的社會情况。我不久以前曾在刊物上看到上海一位医院院長的談話，他說：“在这样好的社会里，我是过着無憂無慮的生活。当我过着这么快乐的生活时，我也常想起解放以前的情况：那真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常常有人到医

院或者到我家里来敲詐，使我終日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耽心着可能發生吃手槍的危險。但是这一切都已經成为过去了。”最近我在報紙上看到一位演員的發言：“解放前淮剧艺人过的是牛馬生活，一天演出兩場，还不得温飽，就是这样，流氓、地痞还不放过，他們想出各种名目敲詐勒索，弄得不好就要动刀砍，艺人的生命毫無保障，因为起碼的生活都成問題，更談不上什么艺术的創造了。解放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政权掌握在人民手里，流氓坏蛋鎮压了，艺术專業也有了地位。”中国新旧社会里这种鮮明的对照，除掉別有用心的右派分子外，是沒有人会不感觉到的。

照我外行的看法，我們新社会的法治是离不开走羣众路綫这个重要原則的。譬如我們公安机关人員在进行鎮压流氓、犯罪分子的过程中，也是根据各方面羣众反映的材料而后深入調查偵察以期核定罪行。至于我們的各种偉大运动，如肃反斗争等，大都是用羣众运动的形式来开展的。“我們的肃反斗争是依靠了国家机关由上而下的正确领导，和公安机关的專門工作，与广大人民羣众的積極参加，防奸反特斗争，形成了由下而上的支持相結合来完成的。”我們的国家是真正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因此依靠广大人民，用羣众运动的形式来展开各种斗争，是为我們国家的本質所决定的。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場来看我們新社会的秩序和法治，一定認為是好得很，是天下第一；看我們国家各种轟轟烈烈的偉大运动，也一定認為是天經地义的好事，既合理又合法。当然咧！右派分子是不会同意的，因为他們是站在反动階級立場，以国民党伪六法的观点来看問題的。

关于美国的法治，王造时說：“美国的法治是認真的”。言

为心声他的话正好表示他的心之所好。他是向往资产阶级社会的，所以他称赞美国的法治，因为美国的法律确是十二分认真地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换言之美国的所谓法律就是一种迫害广大穷苦劳动人民的工具。近代美国进步作家 J. 倫敦曾經在一篇题为“被捕”的文章里，写出他个人亲身的经历。他年轻时过着穷困的生活，某次夜间路过纽约州一小城，因为没有钱住旅店，只得露宿街头，但是一到清早他就被警察抓去了，并以夜间流浪街头的罪名被判拘留三十天。在这纽约州就有所谓街头露宿的禁令。这个例子充分说明美国的所谓法律不过是迫害穷人的工具。同时我们知道在美国的社会里，律师们有重要地位，人数亦相当多。表面上看来好像美国是个尊重法治的国家，所以要有许多律师为社会服务。但是事实上在美国法庭上仍是金元决定了一切。所谓“有条(金条)才有理”。作家 J. 倫敦的小说里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某厂一工人手臂折断了，因为厂里的机器发生了障碍。他于是向法院对资本家提出诉讼，他是有理无条(金条)，结果他败诉了。因为在美国的法庭上，律师们可以大玩手法，操纵一切，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来达到他们唯利是图的，而置正义于不顾。他们无视劳动人民的痛苦，全心全意为资本家服务，亦即为金钱服务。这是美国生活的要素。所谓法治，亦不例外。至于美国南部的“三K”党暴徒的横行霸道，胡作非为，随意杀害黑人，甚至闖入监狱，把无理被拘禁的黑人拖出来私刑处死(常是活活烧死)，这种丧心病狂的残暴行动，真配得上右派分子的“无法无天”“暗无天日”了。

不許開倒車

斥右派販賣資產階級民主的勾當

胡其安

資產階級在反封建鬥爭的時候，曾經提出民主自由的口號，為的是動員勞動羣眾向封建制度進軍，為發展資本主義開辟道路。但是，一旦資產階級取得了政權，就轉而對工農大眾實行鎮壓，把民主自由變成資產階級的專利品；並且在自由的名義下，維護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政治上的統治地位。杜勒斯最喜歡把資本主義陣營說成什麼“自由世界”。這是怎樣的一個“自由世界”呢？資產階級控制了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迫使工人在苛刻的條件下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工人如果不願意接受這種條件，那麼等待着他的就是失業、飢餓。而這，據說叫做企業自由。資產階級壟斷了出版工具，在報紙上登載大量歪曲事實，或者是挑撥人民之間的仇恨，製造戰爭歇斯底里的新聞，這，反而被稱為“新聞自由”。資產階級在維護社會安寧與秩序的名義下剝奪工人階級遊行示威的權利，一面又通過資產階級的立法機關制定一系列限制公民選舉權的規定，保證資產階級的代表全部選入資產階級的国家權力機關。

這些事實告訴我們，在階級社會中，第一，民主自由只不過是實現階級專政的一種手段，不是目的；第二，沒有抽象的民主、絕對的民主，只有具體的民主、階級的民主，階級地位不同，對民主的看法也就各異了。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猖狂向党進攻的惡毒手法之一，就是

用幫助黨整風的名義，販賣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的私貨，企圖按照資產階級的面貌來改變我們國家的根本制度。右派說我國沒有“新聞自由”；說憲法上規定公民有示威游行的自由只是具文，因為國家並不鼓勵人民游行示威；說我國的選舉制度沒有資產階級選舉制度那樣民主。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散播的這些誣蔑性的論點，是對我們國家制度的猖狂進攻，必須加以批駁。

前已論及，民主自由不是抽象的、絕對的。我們的世界存在着兩種民主自由，社會主義的民主自由和資本主義的民主自由。衡量這兩種民主自由的真偽、優劣、進步與反動的標準有二：（一）是哪一個階級的民主自由？屬於少數人的還是多數人的？（二）這種民主自由是促進人類社會發展，還是阻撓社會發展？很显然，社會主義民主是無產階級的民主，而無產階級的利益符合於全體人民的利益，因而是絕大多數人的民主；相反，資本主義民主只是一小撮資產階級的民主。從第二個標準來看，社會主義民主是為了團結最大多數的人來反對帝國主義的奴役壓迫、鎮壓被推翻階級的反抗、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和發展人類進步事業，而資本主義民主只是維護資本主義腐朽的社會制度，它阻撓了人類社會的發展。因此，我們認為社會主義民主是真正的、供大多數人享受的民主，它比資本主義民主具有無比的優越性；而資本主義民主則是假仁假義的、供少數人享受的民主，它的本質是反動的，是阻撓社會發展的。

報紙是階級鬥爭的工具，因此，“新聞自由”也不能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在我們國家里，利用報紙來煽動人民之間的仇恨，製造戰爭歇斯底里，或者通過報紙來傳播資產階級思

想，甚至作为向党和社会主義事業进攻的这种“新聞自由”是沒有的，它只存在于太平洋的彼岸——美国和其他資本主义国家。我們对新聞自由的理解是，自由地运用报纸正确地报道消息，帮助人民了解国内外情况；宣傳党的政策，教育和組織人民羣众去进行社会主义建設，反对战争，保衛和平；反对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进攻，保衛社会主义。我們的“新聞自由”的鮮明的階級性和党性就在于此。我們不去迴避它，因为我們的新聞自由的方針是符合于絕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游行示威的自由只是具文嗎？为了回答这个問題，首先要弄清楚我們国家的性質。我国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会。我們国家的性質，决定政府和人民之間不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因而，在正常的情况下，一般不会發生人民向政府示威游行的情况。但我們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又是一个年青的国家，在个别的地方，或者由于管理国家的經驗还不够完备，或者由于个别工作人員犯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錯誤，或者由于部分羣众認識上有片面，也可能造成政府和人民的矛盾，也会發生示威游行事件，这种情况当然是不正常的。但我們对于这种示威游行也不采取压制的办法，因为它是屬於人民内部矛盾的範圍，可以通过批評、自我批評的方式来解决。当然，我們也不鼓勵这种性質的示威游行。因为示威游行这种搞大民主的方法，归根結蒂是對待敌人的办法。从另外一面来看，宪法的規定有很大的意义：我們的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因而，当人民起来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战

爭而进行示威游行的时候（就像抗美援朝、反对細菌战、反对英法侵埃战争时所發生的那样），他們才是真正行使宪法上的示威游行的权利（在旧中国人民是享受不到这种权利的），能够說宪法的规定只是具文嗎？

选举制度是保証公民通过合法程序来推选自己的代表，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法。资产阶级的选举制度貌似民主，其实它是巩固资产阶级專政的手段。例如英国的选举制度规定了候选人要繳納一百五十英鎊押金，并对工人阶级政党竞选活动歧視与限制。这就保証了资产阶级代表的当选。

我国选举制度比較资产阶级选举制度的無比优越性，首先在于选举权的普遍性和平等性。凡年滿十八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別、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年限，都平等地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精神病的人和依法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除外）。这样就保証了劳动人民的代表能够当选。

在进行选举的时候，由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协商提出候选人名單，事实証明也是适当的。因为这样产生的代表就能具有更广泛、全面的代表性。我們的选举制度不像资产阶级那样，只是用虛伪的形式欺騙人民羣众，相反，它是为了真正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并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团結一切可以团結的力量，共同为社会主义事業服务。

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与資本主义的民主自由有着本質的不同。那些販賣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右派先生們宣傳什么“美国的經濟不民主，政治是民主的”，什么“兩院制”、“兩党輪流执政”，“美国法治認真”等理論，實質上是要改变我們

的国家制度，把中国拖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是开倒车的作法，历史不允许，工农群众和爱国的知识分子也不允许。人民的眼睛已经擦亮了，在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中，看来右派分子贩卖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私货是找不到市场的！

駁斥王造時宣揚“美國法治精神” 的謬論

劉 家 驥

右派份子王造時說，美國“法治”是“認真”的，有好些地方可以采取。他并举一件美国捉賭案來說明，不当場看見进行賭博就不捉。王造時有沒有調查研究过当时聚賭的是些什么人呢？据我所曉得在旧中国、达官貴人們聚賭也是不捉的。王造時既然举例來証明美国“法治”的“認真”，我也想举几个例子來說明美国的所謂“法治”。

第一、美国的所謂“法治”，对国内的劳动人民以及进步人士來說，就是殘酷的鎮压。美国的反动法律如史密斯法、麦卡倫法等，在报章雜誌已經談了許多，我不想多說。現在仅举一例：曾在上海編輯过“密勒氏評倫报”的美国人鲍惠尔夫妇，由于在該雜誌上忠实地报道了美国侵略朝鮮期間进行了細菌战的情况，而被美国政府控为犯有所謂“煽动叛乱罪”。他們的律師想到中国來搜集辯护証据，竟被美国联邦法院所拒絕。

第二、美国的所謂“法治”对国内少数民族，也尽其虐待的能事。黑人約佔美国人口十分之一，美国宪法也沒有說黑人不是美国公民，但是他們無論在政治方面、經濟方面，以至于法律方面，都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当我在美国學習国际法的时候，就遇到一位黑人在法律学校畢業后，想参加华盛顿律師公会，結果因为他是黑人而被拒絕。他气憤極了，买了

一支手槍，先將律師公會的看門人打死，然后把公會的秘書打死，最后自杀。我曾在美國南部旅行，發現無論旅館戏院舟車都是黑人与白人分开，連堂堂首都的華盛頓也不例外，甚至提倡基督博愛的教堂，也分为黑白兩種。有一位黑人沉痛地說，恐怕在天堂上，除掉一位白上帝外，還有一位黑上帝。我当时旅行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我曾經問過一位黑人，應該怎样處罰希特勒。他說最好是將希特勒全身漆黑，放在美國南部，那就使他够受了。

第三、美國的所謂“法治”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資本主義弱國來說，就是無情的蹂躪。美國对待菲列濱人民以及拉丁美洲各國人民的殘酷不必說，即以其侵佔我台灣后，对待我台灣同胞为例，也是不維持其法律上的形式民主。不久以前發生的台北刘自然案，美國竟以所謂“自衛”的借口，將殺人犯雷諾宣告無罪。而事實上刘自然身上中了多槍，而且槍彈是从背后打进去。可見刘自然正轉过身来急于要逃命，但該美國兵一槍不够，連放數槍，非要打死他不可，这那里談得上什么“自衛”。

美國近年来的法西斯化，將其宪法上形式地規定所謂人身自由基本权利一概拋諸腦后。我在美國就遇到一位中國留學生被他們逼到發瘋的事實。有一天我正在游泳，忽然听說：“某某同学發瘋了”。我不禁惊奇起来。他一向精神正常，怎样會發生神經病，原来事情經過是这样的：他是學原子物理的。最初美國教授老勸他學理論物理，他不願意，美國教授在“學術自由”的幌子下，不得已就給他在原子分裂器實驗室里專門作機械的計算工作。他还是心甘情願地堅持下去。學了一年光景，大概在耳濡目染之下，也學了一点。有一天

他回到住所，忽然發現所有箱子抽斗被褥都給人翻到亂七八糟。問房東才曉得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密探已來光顧過，但搜不出任何偷盜原子能祕密的證據來。從此以後，他每天出門都發現有人跟着，無論颶風下雨，都有人形影不離地在做着義務的“保鏢”。晚上掀開窗簾一看，馬路對過，電綫桿下，就站着一個歪戴帽子，口含卷煙的人。這樣狀況繼續了好幾個月，弄到不但美國同學不敢找他，連中國同學也不敢找他。他每天就在這樣“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神經戰下過活，結果就逼到他發瘋。等他到醫院的時候，他還指着醫生說：“你何必老是跟着我，我立刻回國就是了”。

從上面的一些例子看來，美國的所謂“法治”、在鎮壓勞動人民、進步人士，虐待少數民族，壓迫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資本主義弱國的人民，的確是認真的，在保護資產階級利益上，也的確是無微不至的。但是對於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來說，有什麼地方可以採取的呢？右派份子宣揚“美國法治精神”，不外想使中國再度淪為美國的殖民地而已。

駁右派分子王造時

趙人龍

王造時說：“我們中國經過几千年的封建專制統治，向來重人治而輕法治。解放雖已經八年，但是在我們大家的思想上和生活習慣上，還有不少的人治主義的封建殘余。因此我們要特別注重民主法治的宣傳和教育”。

這是王造時借“建立民主法制”之名，向社會主義，向共產黨放出的毒箭之一。

我們且不論這位歷史系教授在這段話里表現出他對歷史是如何無知，因為他的目的根本不在說明歷史。王造時之所以說我們中國如何，那是他和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比較的結果。他要如此說的目的是：第一，誣蔑我們新中國；第二，歌頌資本主義社會。不是嗎？王造時一面說中國人重人治輕法治，另一面說美國的法治是認真的！王造時有什麼根據竟敢如此誣蔑中國，歌頌美國？千萬條事實都能證明王造時的論斷是謊言，但是這謊言卻證明了一件事實：王造時是站在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立場，向黨和社會主義猖狂進攻！

王造時惡毒地攻擊我們社會主義政治，說我們漠視憲法；說我們許多重要法典沒有制定，因而幹部無法可依，人民無法可守；說我們已經制定的法規，有的該廢棄了，有的該修改了。……

要制定法規，修改法規，這重任由誰來擔負呢？王造時說：要依靠那些“冬蟄已久的老法學家”。此外還要培養法學人才，但要培養人才，目前的政法學院、法律學校是不行

的，必須“改進”！至于共產黨呢？王造時沒有提，大約王造時認為是“外行”，不能和“冬蟄已久的老法學家”相提并論了。

王造時說：“今天的官僚主義，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普遍存在着；不是剛剛萌芽，而是發展到相當惡劣的程度；一般說來，越往下層越是專橫，違法亂紀的事情越多”。又說：“今天我們可以摸出這麼一個放鳴情況的規律；越是到下面越不敢放鳴，越不知道如何放鳴，越到農村，越不敢放鳴，越不知道如何放鳴”。

這是王造時借“鳴放”之名，向社會主義，向共產黨放出的毒箭之二。

王造時有沒有調查過，有沒有根據做出這樣的結論？我們當面質問過，但他卻拿不出證據。那麼他何以胆敢如此狂妄地誣蔑我們千千萬萬辛勤工作的基層幹部，大叫要向基層幹部“開刀”？解釋只能是：王造時放火燒基層的目的是企圖讓地主惡霸、流氓把頭這些被鎮壓的反革命復辟，重新騎在人民頭上。不是嗎？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哪一次勝利，哪一件功績，不是共產黨領導下千千萬萬基層幹部完成的？在推翻三大敵人，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鬥爭中，王造時和王造時的右派搭檔們做了哪些貢獻？可是王造時卻聲言要糾集一批他心目中的“黨外有代表性的人士”，“組織若干審查團”，加上“新聞界的工作者”當“開路先鋒”，來“審核”黨在整風運動中“各方面所提的資料”，加以“解決”！

最後，王造時唱道：“許多問題不是憑常識，更不是憑教條能夠解決的”（這裡王造時夾帶了咒罵老干部，咒罵馬列主義的私貨）；“相信專家——特別是本國專家”。（這裡

王造时夾帶反蘇的私貨)；可是王造时所說的是什么样的“本國專家”？王造时说：“尤其是社会科学方面，例如政治学、包括行政管理学、法律学、经济学、社会学”方面的專家！誰都知道所有王造时所指的这些“社会科学”，無一不是資產階級的貨色，王造时要这些“專家”替人民“解决”什么問題，一望可知。王造时列举一系列資產階級的什么“学”，却單單沒有馬列主义，問題也很明白，在王造时看来，馬列主义是屬於不解決問題的教条主义哩。

王造时说：“复旦大学是否办好了？我看很惭愧。旁的大学也差不多。学校办成这个样子，学生早就該罢課鬧事。”又說：“从北京到上海到內地，办大学都是在混。現在有所謂“吃党飯的”，中国共产党先烈們投下大量“資本”，但靠吃党的历史的飯，吃下去，是会吃光的”。

这是王造时借“改进学校工作”之名，向社会主义向共产党放出的毒箭之三。

我們且不論这位曾办过誠明文学院、前进中学的“教育家”如何挖空心思向他所办的学校勒索、揩油弄錢化的惡劣行为，因为这一点王造时心中早有数目。王造时之所以閉着眼睛造謠誣蔑我們的大学教育，其目的是在于破坏我們人民教育事業，达到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企圖。

王造时豈不知道解放八年来，我們高等學校的發展，不論就質量或數量都不是解放前所能比擬？王造时豈不知道即以复旦大学來說，解放前各系畢業生人數少者只有兩三人，多者不過幾十人，而解放后复旦大学每年給国家培养了多少干部？而且更重要的是解放后我們的学生，是在党直接关心和教育下培养的，和解放前不同，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这一些，

王造时不能不知道，但是王造时何以竟敢說从北京到上海办大学的都在混？何以竟敢杜撰出一个“吃党飯的”惡毒辞句，咒罵共产党？沒有别的解釋，唯一的原因就是王造时站在反动的資產階級右派的立場，来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不是嗎？王造时在攻击人民教育專業的同时，他不仅要煽动学生罢課，而且还要挑撥“內行的”党外人士起来“使用权力”，不能“尸位素餐”。簡而言之，王造时的最終目的是要篡夺高等教育的領導权。

王造时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远不止以上所說的三点，但是就以上三点来看，他和其他右派分子所唱的完全一个調子，而且就其性質說，比一些大喊大叫的右派分子还惡劣得多。我們不可能在这篇簡單的分析里，全面駁斥王造时的反动言行，仅仅就以上三点，来做这样一个論断：王造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資產階級右派骨干分子。

駁斥王造時的“以黨代政，以黨代法” 的荒謬言論

李 風

老奸巨猾的右派分子王造時藉鳴放時期，不斷地向黨進行了猖狂的進攻，恣意地污蔑黨，詆毀基層幹部。其中最惡毒的言論之一，就是造謠污蔑解放八年以來，沒有建立起一個像他所說的資本主義式的社會主義法制。在生活習慣和處事作風上，始終沒有完全擺脫掉一向重人治而輕法治的殘余封建傳統。並且更露骨地說，黨是“以黨代政、以黨代法”。因而，人民失去保障，“人民在享受自由之中，仍有不夠安全之感”。因此，黨在人民之中的威信也將沒有保障，要垮台！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王造時所說黨“以黨代政，以黨代法”，是不是真像他所說的那樣，甚至像被他所描寫的那樣可怕。

王造時在這裡所謂以黨代政、以黨代法，如果是指黨不經行政部門，或司法機構而直接處理日常行政工作和司法案件。試問：王造時在什麼地方看到過這種事情？有多少這樣的事情發生？黨中央或各級地方組織在什麼時候發佈過指示或命令，說黨可以代政、代法？顯然，王造時在這裡是造謠污蔑，妖言惑眾。而相反的事實倒是聽到不少，那就是黨經常不斷地強調，黨不可以、也不應該直接去指揮國家機關的活動，包攬各種純粹行政性的工作，堅決反對包辦代替，混淆黨的工作和國家機關的工作的界限，而陷入事務主義的泥

坑。这点，王造时比我们知道得更多。

或者王造时在这里所谓：“以党代政、以党代法”，是指党向人民發佈政治任务的号召，發佈关于政府工作中的方針、政策的指示。如果是这样，那有甚么不可以呢？而且这完全是必要的。历史經驗也証明了：在历次革命运动中，正是党及时地向人民羣众發佈了各种号召和指示，告訴他們怎样行动，这才使我們的革命事業获得了偉大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出現了空前未有的团結和統一。社会主义各項建設事業，正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向前發展，这完全是与党所領導制定的国家政府方針、政策的正确分不开的；是与党保証它們正确的、切合实际情况的貫徹执行分不开的；是与党教育和号召羣众实际行动起来分不开的。因此，周总理在全国人代会就指出了：“党对于人民羣众直接發出政治上的号召和政策性的決定，对于政府工作不但沒有妨碍，而且有很大的帮助”。由此可見，党向人民發佈政治任务的号召，發佈政府工作中的方針、政策性的指示，过去是必要的，現在是必要的，將來也还是必要的。大概这点王造时也是十分清楚的。

或者王造时在这里所谓：“以党代政、以党代法”，是指党对国家机关各个部門进行監督。如果是这样，那又有什么不应该呢？宪法规定我們的国家是一个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工人階級对国家的領導是通过它的政党——共产党来实现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階級中最优秀的份子組成起来的，它是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因此，党認為有必要認真地、系統地研究国家机关的情况和存在的問題，以便对国家工作提出正确的、切合实际的政策、方針，或在根据实践及时地修正这些政策、方針，并

且对于国家工作进行經常的監督。党对国家工作的这种監督，是符合于工人階級、劳动大众的利益的。事实也証明了这一点：在我們国家机关中，什么地方党的领导和監督越堅強，什么地方就出現了一翻新的气象，工作就会少犯錯誤，官僚主义的現象也就越少，社会主义事業就获得偉大的成就；什么地方党的领导和对国家机关工作的監督薄弱，什么地方就会变得死气沉沉，工作混乱，官僚主义严重，因而，也就会給社会主义事業帶來損失。我想这一点，王造时也是很明白的。

既然如此，王造时为什么还要造謠污蔑呢？事情很明显，王造时之所以發出如此猖狂叫囂，只不过是像所有右派分子一样，妄想藉此达到取消党的领导、企圖使資本主义复辟而已，尽管他口口声声在口头上講：我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的，而在心头，却是打倒共产党，拥护資本主义。关于这一点，我們得警告王造时，如果还不悔悟的話，不是他自己下車不下車的問題，而是人民將把他从車內拋出去，將在社会主义的車輪下輾得粉碎！

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兩院制” 的反動論調

黃榮劍

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基本制度是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集中制。國家類型（即國體）是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形式（即政體）是民主集中制。我們的國家基本制度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關係的上層建築。正是因為有了這種國家制度才保證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今後還必須依靠這種國家制度，才能保證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因此，對我們國家基本制度的任何動搖都是不容許的。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惡毒地反對我們國家基本制度。企圖動搖我們國家的基本制度。它一方面從國家類型（國體）來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企圖否認我們國家的內容、性質是無產階級專政；反對共產黨的領導，提出所謂“黨天下”、“各政黨輪流執政”、“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會”和“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根源是無產階級專政”等等反動論調，來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另一方面，它們又從國家形式（政體）來反對我國的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會制。

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就是民主集中制的具體的表現。我國的最高權力機關是一院制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提出資產階級“兩院制”來反對我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一院制，這是關於我們國家形式的問題，也可以說是我們國家政權結構的形式問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企圖在我國搞資

产阶级“兩院制”是極端反动的言論和行动。

其目的其反动性在于：它企圖建立資產階級專政；要表現資產階級民主，妄想达到資本主义复辟的陰謀。右派分子为了配合反对我們国家性質同时反对国家形式，代之以資本主义国家形式。因为，国家的內容决定国家的形式，国家形式是表現国家內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表現無产階級專政的国家形式，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不滿意我們的制度，提出要搞資產階級“兩院制”、搞“上議院”。右派分子章伯鈞說：“我帶頭，主張中国搞兩院制，把政协变成參議院，把人大变成众議院，政协有監督权和不同意权（否決权），人大有选举权和立法权”（由吳晗揭露，見 1957.7.7 人民日報）他聲明要搞“上議院”，企圖把政协變質成为凌駕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上的“上議院”，这就充分暴露他自己的資產階級“兩院制”的反动本質。

社会主义国家有实行一院制也有实行（社会主义国家的）兩院制。例如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是实行社会主义国家的兩院制。苏联最高苏維埃，由联盟苏維埃与民族苏維埃兩院構成。南斯拉夫的联邦人民議會由联邦院和生产者院兩院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波蘭人民共和国（議會）、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民議會）、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国民議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議會）、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国（国民議會）、阿尔巴尼亞人民共和国（人民議會）、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国（国民議會）、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議會）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民大会），这些国家都是实行一院制，其中有許多国家过去

存在过资产阶级兩院制，在革命的过程中变革了资产阶级的兩院制，取消了“上議院”，实行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院制。以上十三个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中，有两个国家是实行社会主义国家的兩院制，十一个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院制。关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一院或兩院制是同这些因素有关：历史原因；民族情况和特点；无产阶级專政的特点等等，对这个問題需要具体地历史地加以考查。

虽然，有资本主义国家兩院制，也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兩院制，但是，我們必須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兩院制和资本主义国家兩院制有本質区别。主要的：(1)它們表现的專政和民主的性質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兩院制表现无产阶级專政和无产阶级的民主，而资产阶级兩院制表现资产阶级專政和资产阶级民主。(2)它們的兩院之間的关系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兩院制之間的权利平等和具有同等的創制法律。例如苏联宪法中规定：苏联最高苏維埃兩院，即联盟苏維埃与民族苏維埃，权利平等。联盟苏維埃与民族苏維埃同等創制法律。资产阶级兩院制的兩院之間的权利是不平等的，也不是同等創制法律。尽管它們兩院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机关。在美国是参議院和众議院，在英国是上議院和下議院，在法国是国民議會和共和国参議會。尽管它們的名目很多，實質上是分为“上議院”和“下議院”，“上議院”有至高無上的权力，“下院”通过的決議、法案要由“上院”批准。“上院”有否决权。即使资产阶级的兩院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机关，在压迫和剝削劳动人民的基本問題上，它們都是一致的，但是资产阶级兩院之間的权利是不平等。一个权力大一个权力小，一个在上一个在下。为什么资产阶级国家要实行资产阶级兩院制呢？这是资产阶

級專政和資產階級民主的要求它們這樣做。資產階級民主是少數剝削者的民主，它是少數剝削者對多數的勞動人民的專政。資產階級民主本身是虛偽的、假民主。為得是欺騙人民，所以搞什麼資產階級多黨制，一黨在朝一黨在野，互相對“罵”唱對台戲，資產階級兩院制也就是虛偽的，它們實質上是表現資產階級的專政和資產階級民主的形式。因此我們必須注意到：社會主義國家的兩院制和資產階級的兩院制的本質不同。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企圖在中國搞“兩院制”是搞資產階級“兩院制”，右派分子章伯鈞就聲言要搞“兩院制”搞“上議院”，“……資本主義國家是實行這種制度的，這種制度過去發生過作用，現在也還在發生作用。我國實行這種制度已經有現存的架子……”他提出資產階級“兩院制”的參議院和眾議院的关系時說，“這在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如此”。他說“我看中國也可以來個參議院，就讓民主黨派發揮參議院的作用。（胡一禾：進一步認清章伯鈞的真面目，見1957.6.28光明日報）毫無疑問，右派分子提出的“兩院制”是企圖建立資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民主。這就是它的反動本質，很明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提出的“兩院制”是資產階級“兩院制”而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兩院制。

我國實行人民代表大會的一院制，而不是實行社會主義國家的兩院制。根本就不需要實行資本主義國家的“兩院制”。我國實行人民代表大會一院制是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對我國來說是較好的制度。為什麼我國實行人民代表大會一院制呢？首先，歷史的原因，我國是多民族統一的国家，也就是單一性的国家。其次，它是革命的創造。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

在共产党领导的整个革命运动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創造出来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在紅色政权中是人民代表大会制的萌芽阶段，并且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發展而發展，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工农兵苏維埃代表大会，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主政权的形式是参議会（人民代表會議），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政权的形式是人民代表會議。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从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逐漸形成和完善化。成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我国这种制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形成的。

在我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的社会主义国家一院制是較好的制度。它是有高度工作效率的制度；它解决了我們多民族統一国家的的問題，密切地团結各民族；它使国家权力高度地統一。它对資本主义国家“兩院制”來說具有無比的优胜的制度。

右派分子企圖搞資產階級“兩院制”的手法是要把政协變質为上議院（参議院），使民主党派發揮参議院的作用，實質上就是要取消共产党的領導，代之以資產階級的領導，改变国家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我們堅決反对把政协变成“上議院”。

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的性質和它們之間的关系怎样呢？

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政权机关，而政协不是政权机关，它是人民民主統一战綫的組織。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选出来的，而政协不是人民选举的。因此我国政协不是政权組織。

从政协的發展过程来着，它在1949年成立以來，都是人民民主統一战綫的組織，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未召开以前，它曾

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这个期间它仍然發揮統一戰綫的作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在我国历史条件下，政协可以不必解散和廢除，它可以仍然保存和繼續發揮作用。因为，人民民主統一戰綫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胜利而团結全国人民的统战組織。对社会主义事業有利而且能繼續發揮作用，自然应讓它存在和發揮作用。政协存在是有好处的，可以充分發揚广泛的民主，团結一切可团結的人，高度集中全国人民的意志和願望，为建設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政协虽然不是政权机关，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政协仍然起着參謀和协商作用。就是說，它对政权机关（人大）起參謀作用。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得到政协协助进行工作的。比如，在一定情况下，有关于某些政治問題，人大和政协共同联合發布決議或宣言。共同联合組織視察工作。这些都是我国的良好經驗。事实說明了政协是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权起參謀和协助作用。政协不是政权机关，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是我国的唯一政权机关。

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社会主义一院制是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右派分子提出要在中国实行資產階級“兩院制”是一种反动的陰謀。我們坚决反对右派分子企圖在我国实行資產階級“兩院制”的反动論調。

駁楊兆龍的“舊法可用論”

夏鎮江

我還清楚地記得，一九五六年的下半年度楊兆龍曾經在科學研究的幌子下、利用做報告的機會進行了他的反黨活動。關於這一點我想只要聽過他的報告的人，回憶一下當時的情形，看一下當時的記錄就可以得出肯定的答復。楊兆龍首先曾經在第一次報告中再三強調舊法的可用性，公開為舊法辯護，想為舊法在現存的社会条件下开辟廣闊的作用場所，並且惡毒地利用和引証了波、捷等人民民主國家沿用舊法的情形來証明他的論點，歪曲地片面地引用列寧、斯大林同志的話來論証自己的反動觀點，楊兆龍在報告中在對舊法的評價問題上是這樣說的：“根據人民民主國家法學家討論有適用舊法的必要性：第一、事實必要，否則就要發生法制的混亂”。“第二、適用舊法並不違背馬列主義原則”。其理由是說列寧這樣說的：“從國際共產主義發展來看，我們現在工作內容是努力鞏固和強有力，它可以用任何形式——新的舊的把這種任務表達出來，它可以應該產生新的東西，這樣做不是為了調和妥協。”楊兆龍利用列寧同志根據當時歷史條件所說的一段話並從而得出列寧也主張沿用舊法”的荒謬結論來散佈反社會主義的毒素，並為自己打掩護，豈不是顯而易見的嗎？

楊兆龍利用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某些論點企圖修正和歪曲馬列主義並不是思想認識問題，也決不是偶然的，這些問題我們已經從他的歷史上得到解答。楊兆龍向黨進攻的戰術也是極其高明的，即在於他貫于利用“馬列主義”來向馬列主義

开刀，这是他一贯施用的陰險手段。接着楊兆龙以同样的手法进一步論証他的以上論点，他說：“第三、运用旧法是苏联的先进經驗，早在十月革命初期就运用旧法，如苏俄人民委员会頒布的关于法院的第一号法令第五条”。讓我們看一看这一条文的原文是这样規定的：“各地方法院用俄罗斯共和国名义判决案件，但其民刑判决如已使用被推翻各政府的法律，只能以未經革命所廢止的及与革命信念和革命的法律意識不相抵触者为限。”从条文規定可以看出苏俄在当时并没有直接規定和認可旧法是可用的这是非常明确的表明了年青的苏維埃国家对待旧法的原则态度，为什么楊兆龙竟然断章取义地抓住这一条的某些含义进行修正解釋而大肆宣揚旧法的可用性呢？并从而得出不运用旧法就沒有法制的反动結論呢？可惜的是：右派先生你們想錯了，請看吧：苏俄人民委员会在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日頒布的关于法院第三号法令已經对运用旧法作了廢止，而楊兆龙却熟視無覩又是为了什么呢？在这一法令中規定苏維埃法院受工农政府的法令和社会主义信念所指导而实行革命的法制。根据这一法令，在法律上已經沒有可能援用旧法，即使是有限度的援用。这一点集中地表明了苏維埃立法者对待旧法的原则态度，但却被楊兆龙一笔抹杀了，在他的报告中一字未提，是他不知道嗎？或是沒有看到过嗎？不，决不是。而是楊先生人为的將他置之高閣。

不仅如此：在苏俄司法人民委员会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关于苏俄刑法指导原则決議的导言中又再一次地重申了苏維埃国家和人民对待旧法的态度。在导言中这样写道：“在十月革命取得政权的無产階級，打碎了資产階級以压迫工人羣众为目的的国家机器及其一切机关、軍隊、警察、法院和

教會。很明顯的，一切資產階級的法典，以及迎合統治階級（資產階級和地主）胃口的、以組織力量的方法來維持社會各階級利益均衡的規範（規則、定則）體系的全部資產階級的法，也都遭受到同一命運。……也不應當為自己的目的而去利用過了時的資產階級法典，而應該把它們送到歷史的檔案庫中去。武裝的人民不用特別規章，不用法典，就把自己的壓迫者制服了，而且現在仍然在制服着他們。”

這一切是說明什麼呢？我們的人民是能夠理解的，而對于右派先生們却再一次揭去了他們一層皮。